作家系列

Bei Xiaolu de Lunmu

[illegible] 著

# 被藐视的鲁迅

COAY Books

# 目录
# Content


- 序 一（1）
- 序 一（2）
- 序 二（1）
- 序 二（2）
- 序 三（1）
- 序 三（2）
- 序 三（3）
- 序 三（4）
- 序 三（5）
- 序 三（6）
- 序 三（7）
- 序 三（8）
- 序 三（9）
- 序 三（10）
- 序 四（1）
- 序 四（2）
- 序 四（3）
- 序 四（4）
- 序 四（5）
- 序 四（6）
- 序 四（7）
- 序 四（8）
- 序 五（1）
- 序 五（2）
- 目录
-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1）
-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2）
-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3）
- 走到出版界（1）
- 走到出版界（2）

- 走到出版界（3）
- 走到出版界（4）
- 走到出版界（5）
- 走到出版界（6）
- 走到出版界（7）
- 走到出版界（8）
- 走到出版界（9）
- 走到出版界（10）
- 走到出版界（11）
- 走到出版界（12）
-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1）
-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2）
-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3）
-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4）
- 艺术与社会生活（1）
- 艺术与社会生活（2）
- 艺术与社会生活（3）
- 艺术与社会生活（4）
- 艺术与社会生活（5）
- 艺术与社会生活（6）
- 死去了的阿Q时代（1）
- 死去了的阿Q时代（2）
- 死去了的阿Q时代（3）
- 死去了的阿Q时代（4）
- 死去了的阿Q时代（5）
- 死去了的阿Q时代（6）
- 死去了的阿Q时代（7）
- 死去了的阿Q时代（8）
- 死去了的鲁迅（1）
- 死去了的鲁迅（2）
- 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1）
- 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2）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1）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2）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3）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4）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5）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6）
- “除掉”鲁迅的“除掉”!（1）
- “除掉”鲁迅的“除掉”!（2）
- “除掉”鲁迅的“除掉”!（3）
- “除掉”鲁迅的“除掉”!（4）
- “除掉”鲁迅的“除掉”!（5）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1）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2）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3）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4）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5）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6）
-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1）
-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2）
-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3）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2）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3）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4）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5）
-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1）
-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2）
- 答鲁迅先生?（1）
- 答鲁迅先生?（2）
- 答鲁迅先生?（3）
- 答鲁迅先生?（4）
- “无产阶级文学”
- “资本家的走狗”
- 鲁迅与牛（1）
- 鲁迅与牛（2）
- 鲁迅卖狗皮膏药
- 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
- 鲁迅大开汤饼会(节录)
- 答鲁迅（1）
- 答鲁迅（2）

- 作家素描
- “最通的”文艺
- 对鲁迅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1）
- 对鲁迅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2）
- 鲁迅的狂吠
- 推荐者的立场
- 致黎烈文先生书
- 聪明之道
- 给鲁迅的公开信
- 骂人与自供
- 鲁迅与托派
- 内山完造底秘密
- 鲁迅愿作汉奸
- 给鲁迅的信（1）
- 给鲁迅的信（2）
- 还答鲁迅先生（1）
- 还答鲁迅先生（2）
- 还答鲁迅先生（3）
- 还答鲁迅先生（4）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1）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2）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3）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4）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5）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6）
-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1）
-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2）
-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3）
-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4）
- 阿Q的旧帐
- 《蛙》的教训
- 老人的胡闹（1）
- 老人的胡闹（2）
- 论骂人文章（1）
- 论骂人文章（2）

## 序一（1）

鲁迅先生被围攻和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他的见解的深刻超出了常人的视野，这必然引起许多人的异议。其二，由于鲁迅论辩的方式方法超越了中国人传统的温情主义和瞒与骗的虚伪主义，这也必然使卫道者和中庸之众感到难堪。鲁迅的奇特的精神气质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环境里，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他同情被压迫的人们，仇视所有的以各种方式有意或无意与旧的势力进行合作的人们。他的不近人情的毫不留面子的战术，不仅使政府当局感到头痛，而且也使左翼作家队伍里的一些同志深为不解。加上同营垒内部的宗派情绪和教条主义的滋长，他们与鲁迅的冲突就越来越显得尖锐了。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鲁迅与共产党内的文艺领导者之间思维方式与认识形式的一次重大的冲突，这也是带有强烈个性意识的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决裂的开始。在这场冲突里，鲁迅的政治意识和个人情感表现得十分强烈，以至使左联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一九三六年初。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根据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自动地解散了左联，并且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等人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文艺界人士，一齐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他们认为，左联的旗帜太明显，应当打出新的旗帜，使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日斗争。由于解散左联一事没有和鲁迅很好地商量，加之左联内部宗派情绪和认识的不统一，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开始激化了。

周扬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出版的《光明》杂志上，发表了《现阶段的文学》，系统地阐述了“国防文学”的内在含义。他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帝反汉奸的总流。”应当承认，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难关

头，周扬等人提出的这一文学口号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它至少把共产党内左派作家的队伍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推进了，它使全国各界人士都纷纷走到这个旗帜之下。不久，“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也相继问世，“中国文艺家协会”也随之诞生，许多作家都自觉地成为“国防文学”的支持者。文学艺术界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左联的仓促解散，以及对于“国防文学”口号中某些含糊的解释，鲁迅是有意见的。他没有立即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持保留的态度。但不久就有人批判鲁迅破坏统一战线和文艺家协会，对鲁迅进行攻击。批判鲁迅的人主要是针对鲁迅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们认为提出这个口号，无异是分裂中国的文坛。

## 序一（2）

鲁迅的一生曲折复杂。他早年丧父，后又多受内外部厄运的刺激，是深味生命之苦的。一九二四年，由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谗言，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反目分手。这件事，对先生是个不小的刺激。虽然后来二人均缄口不语，但兄弟间的结怨，在鲁迅内心是一道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鲁迅常常以真心待人，但有时得来的却是相反的报答。高长虹事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曾帮他走向文坛，为编校高长虹《心的探险》一书，夜间竟吐了血。但后来有个时期，高长虹个性变得极端不近人情。一九二六年，鲁迅赴厦门后，《莽原》半月刊杂志社内部出现磨擦，高长虹逼迫远在南国的鲁迅表态，由于鲁迅不明底细，一直沉默着。结果招致高氏的狂轰滥炸。他先后写出《走到出版界》、《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等文，大肆攻击鲁迅。后又在文中暗示，鲁迅夺了他的爱，并以诗喻之。高长虹的单相思而惹出的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大多为病态之语，其文没有什么文化价值。在这里，倒是可见出鲁迅的大度。鲁迅后来在作品中，多次指出那些忘恩负义者的可鄙。在小说和杂感中，偶尔以笔还击，《故事新编》中的某起细节，留下了那时的心绪，上述两件事，算是个人间的恩怨。我们不妨说，这里有气质和人格上的差异，文化上的磨擦，虽然并不是直接导因，但此种亵渎所造成的内伤，是很重的。我在读他对叛徒的愤慨的文字时，就时常为先生的苦衷所震动。爱而得仇、善而获怨，这是人生的不幸，对此，先生的体悟，大概比常人都要深厚的。

但最使先生不快的，或者说占去了他一生许多精力的，是他与自己的敌人或不同路者的论战。先生的一生，一直未能摆脱此种纠缠。他的杂文，与别人争鸣而发的，数量很多。其中有赤膊上阵与他正面较量者，亦有躲在林中施放冷箭的。我觉得这里大致可分成三类，一是针锋相对的攻战，如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冲突；二是纯属文化

论战方面的，如与创造社诸人，以及梁实秋、林语堂、施蛰存等人的不快事件；三是政治上的，如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以及“左联”内部的抨击或批评。在与上述诸人诸集团的论战中，双方都有失度的地方。但，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甚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围剿来了，当然要反抗，于是结仇，于是沸沸扬扬。对先生恶意损之者有之，造谣中伤者有之，有的干脆讲理不行，骂语相讥，很失儒生的雅态。而翻看鲁迅的文章，是很少有辱骂之句的，先生在愤怒之极时，亦不过狠命挖苦对方一下，但绝不说里巷俗语。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嫉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抗者是一面镜子，在这镜子里，黑脸白脸，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

本书搜集的文章，大多数是很有火药味的，绝不像名士化散文悠闲自得，那是动荡转型时代的骚动留下的痕迹，其中可见某些外来理论移植过程中的偏颇，亦可见旧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惰性。鲁迅在文坛笔耕的几十年间，被围剿之事多而且杂。本书重点介绍了“现代评论”派、创造社、自由主义文人、国民党右翼学者的围剿文章。我以为这些文章，是有社会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的重要知识层次和社会团体，与鲁迅都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对立隐含着什么呢？是文化的交锋还是气质上的抵牾？我想，当代青年人看了这些文学，稍有头脑，当会反省。批评家们大概也可以在此得出教训：武断是批评的大忌。从鲁迅时代到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所进步了呢？一部围剿鲁迅的集子，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侧影，它多少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化人中，建立一种科学的批评精神，是多么重要的任务。

## 序二（1）

最初与鲁迅发生冲突的，是陈西滢、章士钊等人。一九二四年底，北京女子师大爆发了学生运动。事情是因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起的。次年五月，学校风潮又起，女师大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造成多人受伤。鲁迅和马裕藻等人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七人宣言发表后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认为鲁迅等人站在学生一边，是对当局的一种不负责的表现，并且让章士钊等人“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陈西滢在文章中，似乎以“公允”的口吻为当局辩护，这种态度当然引起了鲁迅的反感。以此为导火线，鲁迅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也许是鲁迅的笔锋刺中了陈氏的要害，于是他不惜用大量笔墨，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他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人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就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这样是下流。”

接着陈西滢诬陷鲁迅抄袭别人的著作成果，他说：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

陈西滢加给鲁迅的这顶罪名，不久就被别人澄清，胡适等人后来就指出陈西滢的错处。由于陈西滢在论战中被对方所激，因此行文中

多讽刺之意。在另一篇文章，他提到了鲁迅作品的成就：“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陈西滢貌似公允，其实夹带了极不友好的态度，他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实际上露出了他狭隘的世俗意识。

## 序二（2）

鲁迅与陈西滢的恩怨，是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的个性主义意识，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陈氏的许多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在中国知识阶层，是有代表性的。鲁迅在这类人的举止言谈中，看到了上层知识界的要害的东西。他觉得，在“正人君子”那里，蕴含着可怕的劣根性；绅士阶级的人生态度，以及维护“公理”的精神意志，是中国腐败政府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他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对方，《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的许多幽默、冷酷甚至不尽人情的文字，显示了鲁迅先生孤傲伟岸的性格。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绪，对当代研究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女师大风潮之中，鲁迅不仅受到知识界某些人的攻击，而且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当得知鲁迅同情学生，并且通过舆论等方式声援学潮后，被激怒了。章士钊认为，作为教育部的官员，直接参与学运，是有悖于政府官员身份的。我们现在读章士钊免鲁迅职务的文字，其感慨定会不小吧！鲁迅为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后来到平政院起诉章士钊的举措，是很有气魄的。他与官僚者的周旋所表现的智慧和胆识，是同代人所难以做到的。这或许也是他屡遭厄运的一个原因。因此，当有人抱怨他缺少“费尔泼赖”精神的时候，鲁迅觉得，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空洞地喊公允的口号，是可笑的。人们如果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除了反抗还有什么呢？在《我还不能“带住”》中，他写道：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已，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

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这种异于常规的反抗情绪，看似离经叛道的，但仔细品味，你会发现，在鲁迅的深层意识中，爱的情感是深的。惟其懂得爱，恨的时候才不留情面。鲁迅的冷酷深刻，要么是使对手服服贴贴，要么使耍赖而恶态相报。这大概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

## 序三（1）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京南下，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这一年起，他不断卷入各种文化风潮和某些个人的争辩中。先是高长虹发难，后与顾颉刚有隙，在厦门和广州，不快之事未曾间断。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清党”，对鲁迅的刺激是深重的，他曾形容自己被血的现实“吓得目瞪口呆”。他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和工作，想从此结束“自我流放”的生活，并专心致志地从事译著工作。

事情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顺利。在后来定居上海的十年生活中，他一直未能摆脱被围剿与谩骂的环境。即使在他心境最佳的时期，也依然没有躲开各种势力的干扰。

刚到上海时，鲁迅的确有一种寂寞之感，他渴望尽快找些新的朋友，与他们在文坛上认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创造社的朋友郑伯奇、段可情来访时，他的高兴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曾想与创造社联合起来，先生觉得，创造社、未名社、沉钟社，在文艺方面是用力的。鲁迅内心深处，隐隐地对创造社有一种期待。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恰恰是创造社一些左倾青年，最早向他发起了讨伐。在与鲁迅进行周旋的所有集团之中，创造社的声势最大，对鲁迅晚年心态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创造社是一个青年文艺团体，早期主张浪漫主义，注重对人的生命意志和自我情绪的表现。其代表人物郭沫若等人的文学创作，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他们以自己的真诚的情感，震动过许多读者的心。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也曾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对这些人的印象总的来说还是好的。但是，当时创造社的一些成员还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气质，他们在受到苏联革命理论的影响后，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旧的作家队伍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尤其是在成仿吾等人的眼里，旧有的文化人士已衰老了，只有他们这些代

表先进观点的青年，才能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于是，从一九二七年起，成仿吾等人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开始对鲁迅等人进行批判。

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文中写道：

“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在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接着，李初梨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推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文，对鲁迅等人进行理论上的发难。他们的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文坛来说，的确吹进了一缕新风，新的概念、新的认知范畴、新的认识视角，使许多人感到既新鲜，又莫名其妙。成仿吾等人的理论的出现，大有除旧布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气势，似乎旧的文学意识与表现方式已经过时了。

## 序三（2）

鲁迅也被这些人的理论所“惊呆”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理念世界，这里的满溢着火药味的观念，使他感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已再也不那么单调了。可是，凭着直觉，他感到，这些气势逼人的理论似乎并没有射中中国社会的要害，除了朦朦胧胧的概念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他无法接受这些远离尘世的理论演义，何况这里充塞着过多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呢。

他觉得有必要回答这些狂妄的青年的挑战，他相信，自己并没有看错，这些轻浮的青年理论只是建在沙漠上。

在这一年三月出版的《语丝》周刊上，他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鲁迅指出，成仿吾等人的理论，其实还是远离现实的朦胧的东西，创造社过去还在“艺术之宫”里，现在突然转向革命。鲁迅认为，搞文艺的人是敏感的，而且生怕自己的没落，于是不得不向四处拼命地抓攫。问题不在于他所抓到的理论是否系统、准确，而在于应用这种理论时是否切合对象的自身情况。倘若急功近利，那么，这种理论未免有些教条。这时候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较陌生的，但他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认为“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实之门。

《“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以后，创造社的诸位大为恼火，成仿吾立即回文，在《毕竟“醉眼陶然”罢了》中，成仿吾挖苦道：

“听说堂鲁迅近来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它注意到时下的报纸杂志，是因为要知道什么人怎样礼赞而什么人怎样失礼；而且一次触了他的眼膜，‘竟像一板斧劈着了’他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再也不会忘记，而且一有时机，那便真的睚眦必报了。

……

对于我们的堂鲁迅，我希望他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于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他的悔改，

同DonQuixote一样，是可能的。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回到这‘醉眼中的朦胧’，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起劲，但是。他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出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成仿吾把鲁迅指为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他认为鲁迅不仅思想是陈腐的，而且人格也是卑污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像鲁迅这种人，已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成仿吾觉得，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推翻鲁迅式的思想模式，用苏联式的革命武器去建设新的文化天地。一切必须重新开始，旧的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了。

攻击鲁迅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叶灵凤还在杂志上画了一幅讽刺鲁迅的漫画，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对这些人身攻击的文章，鲁迅已不觉得新奇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和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反驳和回击。

## 序三（3）

在攻击鲁迅的文章里，郭沫若是最锋芒毕露的。他在这一年《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上，以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篇文风极不友好、笔触相当刻薄的文章，对鲁迅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且试图以此宣判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死刑”。

郭沫若在这篇文章里，把鲁迅看成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曾把握的封建遗老，他认为鲁迅对现代世界是隔膜的，鲁迅的思想、爱好、审美情趣无不与封建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了解的鲁迅，当然也不会了解无产阶级的观点。鲁迅对“革命文学”提供者的回击，证明了他已完全成为中国文坛的落伍者。于是，郭沫若总结说：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郭沫若以诗人的浪漫情绪代替了政治意识，他对鲁迅的著作所看甚少，仅凭一点印象，就信口开河，这完全是一种非科学的武断的批评态度。在政治生活中，支撑郭沫若的有时是某些非理性的情绪和直觉，他的缺少理性的草率之作，客观的说，对后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

在重重的围击中，鲁迅的心境确实是不好的。他一方面抓紧学习对他来说还是新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击来自文坛上的冷枪暗箭。

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理论上的纠纷日益明显，鲁迅陷入了更深的包围之中。

在尖锐的对立中，对方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有人对鲁迅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打起主意，批判者说鲁迅态度苛刻、心胸狭窄，缺少大将风度，甚至拿他的籍贯、家族当作奚落的资料。鲁迅被这种卑劣的手段所激愤，一连在《文坛的掌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里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对方。他的文章也夹杂着逼人的讽刺意味，对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的思想、文艺观进行了反批评。

鲁迅认为成仿吾等人的文风是个问题，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理论也难以立得住脚。例如，成仿吾大谈革命文学时，把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无边的夸大了，这种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在鲁迅看来，尚不配具有文学的资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 序三（4）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的结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鲁迅的文章是带有辩证因素的，他在声势浩大的新文艺思潮的袭击中，没有被新奇的事物所吓倒，反而以自己的机警、聪慧，道破了对手的矛盾。的确，在回击对手时，鲁迅也时常无情地嘲弄过这些盛气凌人的青年人，他那冷酷地解剖别人和解剖自己的个性，在这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不留面子的笔锋是招惹是非的因由，但他始终认为，在现实面前，在真理面前，没有丝毫让步的可能，哪怕暂时受到更多的委屈。

这一年，钱杏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长篇评论，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这是这一年双方争论之中，左翼青年最有分量的一篇论文。

《死去了的阿Q时代》从鲁迅小说的时代背景、创作动因、个人气质以及当代意识几个方面，对鲁迅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鲁迅的小说除了《狂人日记》表现了一点对礼教的怀疑，除了《幸福的家庭》表现了一点青年的活性，除了《孤独者》、《风波》表现了一点时间背景而外，大多数的创作没有一点现代意味。鲁迅属于遥远的过去，属于无光无爱无幸福的世界，而不属于激荡变化的现在。鲁迅所展示给人的，是绝望与痛苦、哀伤与苦闷，是麻木的、灰色的人生，而不是光明与希望。因此，尽管鲁迅创造了许多动人的艺术形象，但由于人物的悲观主义思想，使他的作品没给人们留下一丝

的快乐。鲁迅的这种看不见人生出路的思想情绪，一定程度制约了他的发展。在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地前进的情况下，鲁迅只能被新的时代所抛弃。

这位青年学者甚至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时代，已永远的死去了。

“《阿Q正传》虽有这么多的好处，在表现与意义两方面虽值得我们称赞，然而究竟不能说是代表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坛的时代的力作；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所以根据文艺思潮的变迁的形式去看，阿Q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说到这里，我们是很明白的可以看到现在的农民不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了！

## 序 三（5）

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放在眼前，我们能不能说阿Q的时代是万古常新呢？我们愿意很坚决的说，《阿Q正传》着实有它的好处，有它本身的地位，然而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我们如果没有忘却时代，我们早就应该把阿Q埋葬起来！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我们是永不需要阿Q时代了！……”

钱杏在文章中还认为，鲁迅没有一丝政治思想，他与政治不发生关系，闭着双眼是不会感受到革命形势的。作者把鲁迅反驳成仿吾等人的文章，看成是鲁迅否认革命文学的必然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实在是富于保守性的，不然，为什么一年以上的刊物就不能转变方向，而必须维持以前的态度呢？这可以说，鲁迅是主张文艺守节论的。无聊的思想，刻毒的谩骂，此外，我们在鲁迅的著作里，究竟还能找到些什么？似乎还有一点，那就是鲁迅作文时固然忘却政治，看其他作家的文章时，却并没有忘却，甚至努力的有意的硬把他们推到政治上去，想借着他自己所谓指挥刀，来泄泄他的愤。”

在作者看来，鲁迅不仅没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充满了敌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因而，他最后说道：

“现在的时代，已不是这样的武士的时代了。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果能接受批评，翻然悔悟，这个时候我们依然相信还不迟。错误的改正不是一种羞辱，任性没落，却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请再看鲁迅以后。我们是诚恳的最后希望他抛弃了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来参加革命文艺的战线，我们对他依旧表示热烈的欢迎。”

《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围剿鲁迅的文章中最有理论性的论文，对鲁迅的思想的复杂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这比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

观点更系统。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人们就会发现，钱杏在写此文时，完全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演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而没有切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之中。他仅仅从政治上热情地讴歌了农民革命的行动，而没有仔细分析农民心理的内在结构；仅仅从苏联的理论中套用几句公式，而忽略或抹杀中国的现实形态的实质内容。钱氏在文中输入的只是苏联革命的概念，而不是对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心理结构的关注。如果说，在当时这种观点能够起到使人们超越自我的鼓动作用，还不失一篇富有激情的文化上的宣言的话，那么，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心理的状态来看，这种理论一开始就失去了其科学性的价值。因为它是青年文人被异国的新的理论吸引后的一种情感冲动的产物。它既缺乏现实性的根据，又不具有深沉的情感体验后的理性总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所面临的，是一群操持新鲜的理论而又不谙熟中国国情的偏激青年，他们在理论上对鲁迅的狂轰滥炸，除了在客观上促使鲁迅去探索新的理论模式外，几乎没有给中国文坛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 序 三（6）

在被围剿的日子里，鲁迅抽暇购买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他想认真读读这些有影响的著作，以便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获得普遍注意的原因所在。鲁迅还挤出了时间阅读来自苏联的理论著作，对过去争论中尚存在模糊的地方，有了新的认识。他后来说：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薄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鲁迅对这些新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接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确信，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青年们，并没认清中国现实的实质问题，他们只不过把这些舶来品生硬地套过来而已。这场持续多日的争辩使鲁迅进一步相信任何外来的东西，倘不针对中国的现实特点，就不会给中国的改变带来丝毫益处。他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具体地分析了左倾主义文学观失之偏颇的根源，这些观点成为鲁迅实践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思路一贯是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来阐释问题的，实践性与现实性在他思想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他相信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远远超过相信来自先验理性的各种信条，他的思维方法在许多地方呈现出辩证的因素来，因而在他的观念中，所有的远离现实的超时代的认识论，都不具有现实的价值。但是鲁迅并不因此而摈弃这些带有生气的外来思想体系，他总是认真思考这些理论与现实相联系的交汇点，并不断从中获得新的思路。

鲁迅思想的变化，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九三○年的五月七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文中说：

“鲁迅先生在共产党诅骂到怕之后，一拉拢就屈服了，光华书局所出版之《萌芽》，名为鲁迅主编，实则是共党操纵而且更同流合污的署名于巴尔底山（Por，itan）之共产党代的刊物，其自甘为傀儡有如此者，现据热于文艺界消息表的朋友说，张资平也不堪其骂，近已输诚投降了。据说，他俩为了要维持文坛上和社会上的地位，不能不要和他们要好，共同一致，于是共产文艺政策宣告成功，而文艺前途不知黯淡无光于何时了，啊！为什么不淫不移不屈之士，这么难见于今世？我在鲁迅先生没有醒觉时，深深为之惋惜，不能不痛心地写了一篇鲁迅被共产党屈服。”

“男儿”认为鲁迅的转向是他的人格的悲剧，他的这种观点，在文坛中有一定的代表性。鲁迅思想的变化使许多中间人物和右派文人感到惊异。如果说鲁迅早期的偏激思想他们还能接受的话，那么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使许多人认为这是投降的表现。他们觉得鲁迅误入了歧途，其思想与审美意识都出现了偏差。新月社的一起人，都不同程度对鲁迅持这种观点。还是在一九二九年，梁实秋针对鲁迅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品以及这些理论所表述的观点提出异议，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批评了鲁迅等人的观点和表现，一场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问题的争论随之而出现了。

## 序三（7）

梁实秋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拥护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一种温和的古典的人道主义，它提倡人性的均衡，提倡个人克制及道德准则，对偏激的非理性情绪甚为不满，主张回到古典文艺的怀抱中去。梁实秋的审美思想属于这一思想体系，因而他主张纯粹的人性的东西，而全力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梁实秋的批评尺度完全来自于西方，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具有浓郁的书斋性，这些纯粹的理性的东西仅仅是一些温和的理想主义的幻像，它一旦与血的现实相结合，就显得格外苍白了。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中，回答并批驳了梁实秋的人性论的观点。鲁迅不但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认为在中国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时代，高唱人道主义的调子，其实质是充当了反动当局的走狗。鲁迅不相信纯粹的人道主义神话会给中国带来希望，对于在长夜里久经磨难的鲁迅来说，一切空泛的、超时间的精神价值都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影而已。从个性主义的反抗意识，到以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鲁迅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些接近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其一贯的战斗精神，开始蒙上共产主义的色彩。

鲁迅在各种文化势力的围剿中，最后选择了与左派队伍联合起来的道路。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不管人们怎样猜疑他的动机，有一点人们是不能不承认的，孤独的鲁迅需要一种团体的力量，一支庞大的反抗旧势力的队伍。他不再计较以往的得失，与许多热血青年们组成了联盟。一九三○年，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诸人团结起来。一九三

○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鲁迅被推选为主要的领导人。从这时起，他组织并领导了左联的反抗政府当局的文化运动。

这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期，谣言、通缉令、暗杀充塞着上海滩。二十世纪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三十年代那样空前的政治黑暗与思想上的活跃。革命的与反革命的，维持现状的与反抗现实的，各种对立的局面在交织着、对峙着，到处布满了仇恨与反抗的气氛。一切有良知的热血知识分子，几乎都自觉地加入了与国民党政府当局斗争的行列。鲁迅在当时，自觉不自觉地成了青年作家和知识层的领袖。只要我们翻开《鲁迅全集》，就会看到，在上海的十年中，他一直是在围剿与反围剿中生活的。在严峻的形势中，他始终毫不妥协地与当局者战，与右倾分子战，与极“左”的青年人战。他的神经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以至来不及从容地进行纯艺术创作。他太神经质了，在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中，他的确显示了非凡的气魄和胆识，但有时也过分敏感与多疑，不免与周围的许多人发生误解和冲突。他在许多方面对人是毫不留情面的，意识深层中带有浓烈的怀疑性特征。他对社会、对人生越认识得深刻，其个性就越表现出不妥协的、有时甚至令人无法接受的特点来。

## 序三（8）

但是，如果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者和气量狭小的怀疑主义者，那显然是错了。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与许多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与反动当局周旋的同时，他还把大量心血倾注在扶植青年作者的劳动上。

他与瞿秋白、冯雪峰、曹靖华、萧军、萧红等人的友谊，至今仍在文坛上被广为传诵着，他与老友许寿裳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去世。鲁迅为朋友和同志所付出的，远远地超过了别人的给予。

当然，反对鲁迅的人不会看到这位文学家思想的另一面，他被文坛许多人看成个人主义欲念较强的、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于是有人造谣说鲁迅的转向是因为拿了苏联政府的卢布，有人说鲁迅与日本特务勾勾搭搭，是汉奸文人……一直到死，鲁迅一直遭到各种谣言的攻击。他在致李秉中的信中感叹道："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于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鲁迅的这种心境，正是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的产物。可见当时文坛的情况是何等的复杂。

有一种观点在反对鲁迅的人那里是带有普遍性的，即他们把鲁迅看成仅仅会骂人的作家，鲁迅除了会用笔痛击对方外，没有什么永存的价值。如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新时代》上发表的《鲁迅的狂吠》，就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你看他战了许多将——成仿吾、梁实秋……等等；虽则他每战不一定是胜仗。然而他至少是有'战术'的。

在他每次笔战的时候，他一定埋伏了许多小将，——他手下的喽罗——等到对方有了答复，他手下的小卒便狂叫起来帮骂起来。他们

的谩骂是不顾理论的，他们似乎在多次的谩骂里已感到一种满足，如他们的‘老将’一样。

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

当鲁迅先生有兴趣谩骂人家的时候，他最喜欢派人家算是××主义——虽则人家绝对不是××主义——而加以重大的攻击，甚至把艺术家的‘宣传品’当做‘艺术品’，派人做××主义之后，再加以攻击，于是鲁迅先生自以为是胜利了。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露出黄牙的笑的影子。

但是，鲁迅先生的谩骂是有什么意识呢？读者们仅能感到一些滑稽罢！

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

## 序三（9）

鲁迅先生被围攻和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他的见解的深刻超出了常人的视野，这必然引起许多人的异议。其二，由于鲁迅论辩的方式方法超越了中国人传统的温情主义和瞒与骗的虚伪主义，这也必然使卫道者和中庸之众感到难堪。鲁迅的奇特的精神气质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环境里，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他同情被压迫的人们，仇视所有的以各种方式有意或无意与旧的势力进行合作的人们。他的不近人情的毫不留面子的战术，不仅使政府当局感到头痛，而且也使左翼作家队伍里的一些同志深为不解。加上同营垒内部的宗派情绪和教条主义的滋长，他们与鲁迅的冲突就越来越显得尖锐了。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鲁迅与共产党内的文艺领导者之间思维方式与认识形式的一次重大的冲突，这也是带有强烈个性意识的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决裂的开始。在这场冲突里，鲁迅的政治意识和个人情感表现得十分强烈，以至使左联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一九三六年初。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根据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自动地解散了左联，并且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等人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文艺界人士，一齐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他们认为，左联的旗帜太明显，应当打出新的旗帜，使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日斗争。由于解散左联一事没有和鲁迅很好地商量，加之左联内部宗派情绪和认识的不统一，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开始激化了。

周扬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出版的《光明》杂志上，发表了《现阶段的文学》，系统地阐述了“国防文学”的内在含义。他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帝反汉奸的总流。”应当承认，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难关

头，周扬等人提出的这一文学口号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它至少把共产党内左派作家的队伍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推进了，它使全国各界人士都纷纷走到这个旗帜之下。不久，“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也相继问世，“中国文艺家协会”也随之诞生，许多作家都自觉地成为“国防文学”的支持者。文学艺术界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左联的仓促解散，以及对于“国防文学”口号中某些含糊的解释，鲁迅是有意见的。他没有立即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持保留的态度。但不久就有人批判鲁迅破坏统一战线和文艺家协会，对鲁迅进行攻击。批判鲁迅的人主要是针对鲁迅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们认为提出这个口号，无异是分裂中国的文坛。

## 序 三（10）

实际上，鲁迅所以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个名词在思想意义上的不明确性，即在争取团结大多数作家的同时，不要忽略了自己的思想的独立性。鲁迅的这个口号，最早由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公布出去，不久，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针对左翼作家提出来的，它体现了鲜明的党派特征。围绕着两个口号，文艺界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各大报刊纷纷载文介绍争论的内容，各种小道消息迭起。鲁迅当时正在病中，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文，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文中流露出对当时文坛上许多青年人的不满。一九三六年的中国文坛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不同思想和个性的文人汇聚在一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作家队伍中的宗派情绪，使彼此成见加深，一些简单应办的事情有时要经过许多纠纷才能办到。作家队伍中一些人排斥异己的现象十分严重。例如，当周扬等人告诉鲁迅，说胡风是内奸时，鲁迅就十分反感，认为证据薄弱，不足为凭。鲁迅怀疑这些人的目的，在文章中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他觉得，在左翼作家队伍中，许多人没有改变旧时代的精神痼疾，其劣根性依然蒙在骨子里，这种人似乎更危险。显然，鲁迅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以致在争论中彼此都留下了不小的创伤。它的余波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成为文坛政治风云中久久不散的阴影。

两个口号之争，不仅仅是文坛内部思想上的冲突，而且也是宗派主义情绪在作家队伍中的一种反射。它是复杂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环境下特殊的产物，也是中国一些文人旧的积习的表现，鲁迅无论怎样超尘脱俗，也依然没有摆脱这种情感的困惑。不管双方如何固持己见，

实际上，这里夹杂了许多私人成见，鲁迅在这场争论中也或多或少有一种武断的情绪，虽然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不无道理。

和平时代的青年也许无法理解鲁迅当时的这种情绪，人们大概难以接受他的过于偏激的语言和火气十足的文章。但是，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当时斗争的严峻性和社会的复杂性，鲁迅的这种情感方式就不难理解了。在这种环境里，鲁迅只能也只会采取这样方式对待现实的存在。他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文学家，而不会成为出色的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具体实际的领导者。他与左联的文艺工作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表明，他是一个不肯被专断者所摆布的人，不愿意违心地迎合别人的理论。一旦认准了道路，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向的。人们对他的误解、诽谤乃至围剿，一方面是两种思想的必然冲突的反映，另一方面与他的鲜明个性的超常性不易被人理解有着重要关系。这正是中国人最缺少的、最难以达到的精神品格。在专制制度还长久地窒息着中国人的命运的时候，在个体的人还没有获得最基本的人的价值的时候，鲁迅的这种反抗意识就变得十分难能可贵了。也许人们认为他不免过于冷傲、偏激，但在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进程里，他的这种思想，这种个性，这种既深刻得片面又冷静得逼人的精神状态，正是中国现代人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在前工业社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度，当社会尚没有民主与法律保障人的生存权利的时候，鲁迅的情感方式的确代表了中国现代先觉者寻找自我，寻找民族新生的进步的精神品质。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反围剿、反压迫的精神个性，是具有诱人的精神价值的。

## 序四（1）

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会像鲁迅那样，在生前遭到如此之多的亵渎，而在死后，依然招惹到无休止的谩骂。对鲁迅毁誉参半的议论，多年来一直充塞在海峡两岸。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差不多在鲁迅研究中体现出最典型的特征来。

随着鲁迅地位在中国文化界的确立，保守主义、温和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人、学者们意识到了鲁迅在中国社会的破坏性作用，他们感到传统的理性秩序在鲁迅那里已经被无情地践踏了。因而沦丧感和怨恨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这其间，右翼分子当然没有放弃对鲁迅的挖苦乃至诋毁，反对鲁迅的文化风潮不时在文坛上刮起。

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后，声势浩大的纪念鲁迅的活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给鲁迅的崇高的荣誉，使这些右翼分子感到空前的恐惧。他们看到，鲁迅的被普遍认可，乃是社会的非理性情绪的蔓延的象征。鲁迅的地位的确立，无疑将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处于更为尴尬的地位。

苏雪林，就是右翼学者中的反对鲁迅最为坚决而持久的一位。

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苏雪林通过致胡适的信，就曾大骂过鲁迅：

“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但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看看里面是怎样一包粪土，免得他们再受欺骗。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但几个我素所投稿的刊物的编辑人，一听我要反对鲁迅，人人摇手失色，好

像鲁迅的灵魂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吃了他们似的。一连接洽三四处都遭婉谢。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

在其《与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苏雪林重弹其老调：

“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已身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苏雪林的信件一问世，就受到了文坛进步文人的强烈抨击。上海、南京、北京、天津、西安、洛阳等地报刊，纷纷登出反驳文章，苏雪林一时成为文坛上的新闻人物。

## 序四（2）

这是苏雪林向鲁迅发难的开始，从此，她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用她自己的话说：“‘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六十年代，她从海外到台湾定居后，曾写成了《鲁迅传论》，此文曾在台湾《传记文学丛书》中连载后，收入了《我论鲁迅》一书之中。《我论鲁迅》一书由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汇集了她三十余年以来反对鲁迅的文章，这在反对鲁迅的众多文章里，是最充满敌意的。

青年时代的苏雪林是崇拜鲁迅的。1919年她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她的同学冯沅君、庐隐当时都是颇有名气的作家，这些青年作家们对鲁迅都有极深刻的印象，这些对苏雪林，都是很有影响的。

北京女子师大的学潮发生之后，苏雪林对鲁迅的兴味开始寡然了。后来，她对鲁迅与陈源、徐志摩等人的磨擦、冲突表示出不满之情，认为鲁迅失去了理智，是个心地狭小的人。三十年代后，文坛上左翼力量的崛起，更引起了她的不安，她对鲁迅的恶意日益增多起来。苏雪林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一文中说：

“我是受过五四时代理性主义熏陶的人，凡事都要讲个理性。现在看见新文坛忽然大变，一派蛮不讲理、气焰逼人的行帮作风，当然深感痛苦，尤其对于鲁迅那种一口咬上了人至死不放的□狗行为，更为不平。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对鲁迅攻击，但也曾屡次表现我的不满。鲁迅心胸何等仄狭，对我岂肯轻饶。有一回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先生为联欢起见，宴请曾在他书店出书的文人，鲁迅与林语堂先生齐出席，我亦敬陪末座。我对鲁迅固极冷淡，他对我也昂头天外，不屑理睬……听说鲁迅在他所办的某定期刊物上又曾用什么‘黄棘’笔名，对我放过几枝‘暗箭’，后来我作文追悼旧同学庐隐女士之死，鲁迅也亲自曾骂过我……”

苏雪林对鲁迅的仇视，现在看来完全是两种世界观与两种人格冲突的反映。苏雪林是一位颇具绅士气的女性，她从骨子里就讨厌非理性的冲动，即使身遭不幸，也不愿陷入绝望的困境中。比如她在北京上学的第二年，就曾与易君左、罗效伟两人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报刊上整日刊登“呜呼苏梅”事件，她只好逃避“精神上的压迫”，跑到了法国。到了晚年，她在台湾也不是都愉快的。她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中说：“因为有一点名气，使一般‘啖名’之士，都想打我的主意，所求不遂，则变欢为怒，化友为仇，反令我招致无穷麻烦。……我只希望文艺界以后不随便恭维我，也不随便毁谤我，让我无荣无辱，超然物外，尽此余年，那便是我所馨香祝祷以求的了。”可见，苏雪林是一位知难而退的人，但她偏偏和鲁迅过不去。尽管她主张理性主义，但批判起别人来，却大有非理性的一面。从苏雪林的人生态度里，人们多少可以看到她的某种贵族气和保守主义的精神特性。

在武汉大学教书时，她对鲁迅小说的分析还算有些学者的态度。她的文学讲义上，对鲁迅的许多作品还是称道的。但是一谈到鲁迅的人格，她却表现出异常的暴怒的情绪。从一九三六年起，她骂了鲁迅几十年，连篇累牍的文章中，并没有翻出什么新花样。充斥她作品中的，大多是嘲骂与挖苦。向来以中庸公正为荣的苏女士，在此陷入了“骂”的泥泽中。她在数落鲁迅是无情无义的恶魔的同时，自己也沦落到恶魔的精神自扰中。

## 序四（3）

在许多文章里，苏雪林一直表示出对尼采、叔本华、妥思陀耶夫斯基的不满。她把共产主义理论与这些非理性的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加以否定。从这个角度上看，她又是一个古典化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安于现实而又不敢正视现实的高雅的封建贵族精神的膜拜者。在她看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政治结构已经确立，无需再加以变革了。文人墨客应与党国保持绝对的一致与统一。所谓左翼文学与反抗文学，完全是造成社会毁灭的祸根。苏雪林的精神哲学的核心就在这里。她认为现实就是合理的，国民党是正宗，不能打倒，中国无需经历新的风雨。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附和于当权者的旧习的重演。她与国民党政府的亲近，不能不说是她这一传统思想的必然结果。

因此，对苏雪林来说，她所面对的左翼作家队伍以及鲁迅这位文化斗士，便不难说是完全陌生和不可思议的了。

她永远无法理解鲁迅的精神个性与时代性的内在联系。她不懂得鲁迅作品和人格所表现出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特殊的地位。她对鲁迅的认识是来自一种主观的情绪，因而缺少清醒的客观的分析。她的批评堕入了谩骂的嚷叫之中，令人难以卒读。苏雪林的治学态度即使是在大陆极“左”的时代里，也是罕见的。

苏雪林把新文化的许多现象，看成是文坛的病态，并把这些病态现象划分为“色情文化”、“刀笔文化”、“屠户文化”。在她看来，“色情文化”以郁达夫等人为代表，并说“这些满含花柳病菌的书籍，灌输到青年脑海里去，其害之大，真个胜于洪水猛兽。”所谓“刀笔文化”，以鲁迅为代表，她说鲁迅“不幸自女师大风潮之后，他幼年时代困厄环境所造成的迫害狂，与地理环境所养成的绍兴师爷气质融合一处，心理失其常态，掉转他那抨击旧社会的笔锋，专以攻讦之数私人为事了。他的杂感文字，自华盖到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内容百分之九十

九，在痛骂他所怨恨的‘正人君子’。散布流言、捏造事实、放冷箭、用软刀、深文罗织，任意周纳，一时也说不了许多。”苏雪林认为，与“刀笔文化”相互利用的是“屠户文化”，所谓“屠户文化”乃是左派文人提倡兴起的左翼文化，这使中国文坛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这三种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病态现象。她觉得，不清算这些文化现象，国无宁日，党无宁日。其忧患之心，昭然纸上。

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在《鲁迅传论》中得到了最为系统、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这在鲁迅研究史中，不能不说是最充满火药味的一页。她的批评方法是粗暴而非科学的，很难说有什么学术价值。苏女士的偏颇情绪，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文化界少数右翼分子病态的学术心理，因为在这些人眼中，鲁迅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现象。所以，在洋洋几十万字的《鲁迅传论》中，苏雪林变得极为焦躁和神经质，以至于形成一种骂术的文体。

《鲁迅传论》主要有五部分。一、鲁迅的传记；二、鲁迅的性格与思想；三、鲁迅的品行与作为；四、左派对鲁迅的招降；五、鲁迅盘踞文坛十年所积之罪恶。苏雪林在《引言》中公开说，写《鲁迅传论》的目的是“藉以发鲁迅之‘潜德’，扬鲁迅之‘幽光’，与共党‘隔海唱和’一番”。苏氏对鲁迅的身世和作品，并不完全熟悉，所写《鲁迅的传记》一章，个别地方也不太准确。但更重要的是，她对鲁迅的许多地方的批判，往往望文生义，歪曲的地方多于事实。

## 序四（4）

比如，她论述鲁迅的性格时说：“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偏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接着列举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谈到少年“我”听到二十四孝里郭巨埋儿的故事的心理活动。苏雪林认为少年鲁迅对二十四孝中的故事的反感是一种怪想，在她看来，这些故事一般孩子不过听听而已，而鲁迅竟然对自己的先辈产生疑虑，这是大逆不道的。苏雪林以此来论证鲁迅的多疑善妒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她没有看到，正是鲁迅的这种以生命的直觉来参与生活，以及用它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判，才使他的批判意识本身获得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苏雪林不会懂得，鲁迅对生活的认识超越了常人的平庸的视觉，正是他的敏感和深沉的思想，才使他达到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把鲁迅的敏感与认识方式的奇特看成变态的表现，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虚无主义”是苏雪林冠在鲁迅头上的一顶帽子。她声称鲁迅是“一切希望都没有，围绕他周围的既没有一个好人，对中国民族更认为病入膏肓，无从救药”。她认为《阿Q正传》传遍世界乃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她在文章中写道：

“他不但对中华民族鄙视，并且还有点仇视。正如他一辈子所仇视的封建余孽的士大夫。这在鲁迅著作里很容易得到证明。不过我们即以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而论，正经人还是多得紧，难道个个都是未庄的赵太爷、钱举人，把无罪小民抓去枪毙的把总？又都是一听宣统要坐龙庭，便将盘在头顶上的辫子放下，用话威吓乡愚的赵七爷？想买块肥皂把一个她认为孝女的女丐遍身咯支咯支洗一遍的四铭先生？”

这种反驳是令人奇怪的，作者连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的内在联系都不懂，怎么能使人信服呢？而且，她对鲁迅批判旧时代的精神表示反感，甚至恼火不已，可见国粹意识与正统观念在她那里是根深蒂固的。在苏氏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生气盎然的，仿佛田园般的

幽静典雅，中国传统文人与统治者大都是充满善良意志的好人。按苏氏的逻辑，历史的进化就是反动，于是不需要什么民国革命，更不需要思想革命；恪守传统与中庸行事，才是中国赖以稳定、和谐的基础。

因此，当鲁迅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成“吃人”的历史的时候，她感到惶惶不安，鲁迅对旧文化的反思与对人的个体的存在的反省时所表现出的野性的力量，在她看来是异端邪说的表演。她叹道：“一个人的思想阴暗虚无到这种地步，也可谓叹观止矣。”这里不仅表现出她对鲁迅思想逻辑与认识结构的一窍不通，而且也表现出她批评方式的平庸和情感上的变态。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像这样以骂取荣的批评方式，大概仅仅为苏氏所独有吧?

在对鲁迅加入左联一事的评价中，苏氏是颇费心计的。她认为这是共产党对鲁迅的招降。苏氏一直认为，鲁迅具有强烈的领袖欲。加之他的思想偏激恰恰适合了社会上的不满现实的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由于苏氏对共产党充满敌意，她把鲁迅的转向看成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也是鲁迅个性特征所决定的必然归宿。这成为她鞭笞鲁迅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鲁迅传论》中很少分析鲁迅思想的内涵以及美学观点，而只从政治态度入手，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以一种先验的政治观念来罗织鲁迅的罪名。她把鲁迅对旧的社会思潮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文艺观的介绍，完全视为个人的私欲，并从各个角度来加以讨伐。苏氏笔下的鲁迅，简直成了恶贯满盈、霸气十足的小丑。鲁迅在上海文坛的十年生活，被描绘成一种堕落的历史：

## 序四（5）

“共党霸占整个文坛及整个思想界，仅是六七年间之事，所以能如此，果然不得不归功于鲁迅，他是靠着强劫硬抢、蛮打狠杀的手段来干的。我们喊鲁迅做‘流氓’、做‘土匪’丝毫没有冤屈他吧？”

到八十年代，苏雪林对鲁迅的谩骂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988年第十一期的《香港月刊》上，发表了她的长文《大陆刮起反鲁风》，文章重弹过去的老调，把那些陈腐的骂语当成名言加以渲染，文中大多攻击鲁迅的个人生活琐事，有的道听途说，望文生义。文风与过去没有什么区别。

严格的说，苏雪林的鲁迅观是缺少学术性和科学性的大杂烩。这里除了人身攻击和扣政治帽子，没有多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她既不能从社会思潮与文化渊源上来考察鲁迅现象的特异性，也不会从艺术上和心理学等角度上分析产生鲁迅的时代原因和个人原因。她甚至无法解释鲁迅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精神力量。缺乏学者固有的素养和严肃的治学作风，这是苏氏评价鲁迅时所表露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态度。

除苏雪林外，对鲁迅抱有敌意的还有梅子、郑学稼等。一九四二年，梅子编辑了一本论述鲁迅的论文集《关于鲁迅》，郑学稼在这一年出版了《鲁迅正传》。这两本小册子是最早的系统反对鲁迅的书。特别是郑学稼的《鲁迅正传》，完全是苏雪林式的挖苦，用曹聚仁先生的话说。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

梅子所编的《关于鲁迅》，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入梁实秋的《鲁迅与我》，鲁觉悟的《关于鲁迅》，郑学稼的《鲁迅与民族主义文学》、《鲁迅与阿Q》、《评鲁迅的〈呐喊〉》，秋水的《鲁迅与王实味》，梅子的《鲁迅再评价》七篇文章。梁实秋、鲁觉悟的文章虽对鲁迅有微辞，但有的地方并不偏激。而郑学稼与梅子的文章，则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不切实际的推理。

例如郑学稼的《鲁迅与阿Q》一文，把阿Q看成鲁迅自我化身，并否认鲁迅是革命家、思想家。梅子的《鲁迅的再评价》则对鲁迅的政治观、特别是晚年思想大加否定。郑学稼与梅子在对鲁迅的总体评价上，有着相似的观点，他们都竭力抹杀鲁迅思想的社会意义。

梅子在文章中写道：

“鲁迅死了已五年，鲁迅的评价却发生了二个绝对相反的结果，有的人把鲁迅神化了，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至于‘鲁迅大师’、‘青年导师’……等肉麻称谓，更不必说，盖起大洋楼开办什么‘鲁迅艺术学院’，也已历有年所。这种政治性的捧死人，谁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不懂得内幕的人觉得鲁迅交了死运，懂得这套把戏的感觉到太肉麻。如果站在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那就感到这只是侮辱了死者，歪曲了真理。”

## 序四（6）

梅子对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的高度赞扬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作者认为左派力量无端地拔高鲁迅是一种对死者的亵渎。梅子即反对毛泽东的观点，也对全盘否定鲁迅表示不满。作者试图站在公正的角度上描绘鲁迅，例如，对前期鲁迅的创作是首肯的，但同时认为加入左联前的鲁迅也不配做“旗手、主将、导师”之衔，前期的鲁迅不过是文人而已。这样，梅子就把鲁迅早期反封建、反帝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这种仅从艺术上来品评鲁迅的观点，至少忽略了鲁迅作品的内在形态所包含的深邃的历史内容和社会价值。在梅子看来，鲁迅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阵营，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最偏袒鲁迅的说法，应该是鲁迅对政治本来没有多大兴趣和认识，十四年来鲁迅的小官僚生活，可以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但鲁迅到了上海以后，竟担任了左联盟主，真实的原因，是为了稳定他那文坛上的地位……”看来，作者对鲁迅的把握依然没有摆脱世俗的观点，把鲁迅加入左联看成是个人欲念所使然。这是无法透视事件的全貌的，梅子甚至为鲁迅“误入政治之网”而叹息，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如果文学是应该和政治结婚的，那么一位天才的文学家应该与正确的政治主张发生恋爱。如果一朵花插在粪土里，那么纵然是国色天香，也不会引人注意了。”在这里，作者表示了对鲁迅的惋惜。在梅子看来，鲁迅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倘他不和政治接触，则可能成为更有成就的作家。总之，《鲁迅的再评价》一文的核心，尽力否认鲁迅的后期思想，作者试图把鲁迅从“神化”中还原到原有的地位上去，但是梅子并没有真正理解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间的联系，没有理解现代中国文人的艺术劳动与政治意识之间的渊源，仅从一个方面来总结和概括鲁迅的一生似乎欠妥的，何况在论述过程中有过多的政治偏见呢。

一九四二年三月，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了郑学稼的专著《鲁迅正传》。郑学稼原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教书，因为对共产党充满敌意，

曾引起周围人的不满，所以一直郁悒不得志。全国解放后，郑学稼去台湾，曾在台湾大学教书。到七十年代末，他撰写、翻译出版了五十部书，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书中销路最好的是《鲁迅正传》。《鲁迅正传》一九四二年在重庆出版后，一九五三年香港亚洲出版社再版过，一九七八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郑氏的增订版本。四十年代初版的《鲁迅正传》多有对鲁迅讽刺挖苦之处，许多地方颠倒黑白，不能使人足信。新版本尽管删了许多刻薄之言，但全书的反鲁精神，一直充塞其间。这在反鲁的言论中，是一部较有代表的专著。

郑学稼认为，“鲁迅先生除了他的文学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如果说他是‘革命者’，他却躲在战阵的后面；如果说他是‘思想家’，他的脑子却没有思想的筋纹。”本着这个原则，他在专著中对鲁迅大加鞭挞。在谈到鲁迅的身世时，郑氏认为，鲁迅在北京十四年中，一直做着小官吏，在袁世凯政府和黎元洪、段祺瑞政府部门做佥事，“如果不是抱着‘同流合污’的决心，在那龌龊的世界中，神圣的革命者，是无法一日安居其位的”。接着，郑氏指出，鲁迅在北京十四年生活中，只是一个宦途不利的“佥事”只是一个具有成功条件的文学家。他既未曾为任何青年的“导师”他也不是曾“革”了任何反动者的“命”的革命者。他的官僚生活，更不像流浪的高尔基。就是他的著作，也不是对什么无产阶级表同情或表现煽动的作用。目前若干人们，对他的过大恭维，和他的生命史有重大的偏差。只掀露着一个弱点，用死人吓活者。或且换句话说：利用死者达到自己政治上的阴谋。看来郑学稼与梅子在这一点上是持同一种观念的。他们无非是把鲁迅看成政治家手下的玩偶。郑氏尤其感到，鲁迅的人格并不伟大，不过是被左派捧出名来而已。

## 序四（7）

不过，郑氏对《呐喊》的许多篇章是推崇的，他在许多论述中不得不承认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他认为鲁迅笔下的许多人物，带有一定的典型性。鲁迅先生的天才郑氏是赏识的，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鲁镇，还是水乡的静谧的夜色，在郑氏看来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情境。

尽管郑氏一方面沉浸在品尝艺术情境的氛围里，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认识却时常自相抵牾。他既承认鲁迅的作品再现了过去的黑暗生活，又否认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认为这不过是作者记忆中的掠影而已，决不是三十年代生活固有的现状。例如对阿Q形象的评价，郑氏就是充满了这种矛盾的批评心理的。

郑氏认为，“一大批鲁迅的崇拜者说，阿Q并未‘断子绝孙’，他还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我对于这一武断提出抗议。因为这是对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中国青年——不，全体国民的侮辱。谁敢说，正用血和肉记录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未有的伟大行动的我们，灵魂里尚有阿Q主义的成分？”郑学稼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与苏雪林巧合了。他愿意看到鲁迅笔下对过去生活的描绘，而不愿看到这种艺术形象成为超时间的精神价值。他只希望鲁迅成为世纪末的批判者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审视者。郑氏与阿英早期的观点一样，认为鲁迅属于过去而不属于现在与未来。也就是说，当人们看到鲁迅勇猛地批判旧时代的生活时，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当人们试图把鲁迅批判的形式位移到现实生活时，这便成了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郑氏是一个缺少清醒的自我意识的人，抑或是一个对现实抱有好感的卫道者。他对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识的评估，完全陷入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偏见之中。

如同普通的评论者一样，郑学稼也看到了鲁迅思想的矛盾性，但他对这种矛盾性的认识不是从思想的自身脉络出发，也不是从精神的深层领域出发来考察鲁迅政治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内在联系，而是以平

庸的政治偏见，来论证鲁迅的矛盾性。他认为鲁迅有两重人格，“当他被创造社们拒于‘革命’大门之外时，他的态度，就是那两重人格的表现。周树人的幽灵，告诫鲁迅：‘你不要乱动，你要稳健。’鲁迅却为他指出，由于革命‘祖国’的存在等等，我不能不左倾。周树人当然看到鲁迅所指的事实，但却告诫对方：你忘却被北廷通缉的危险吗？鲁迅又为他指出，这险值得冒，因为他的报酬是非常之大，而且他已备了三窟。周树人满足鲁迅的估计，鲁迅也接受周树人的劝告。于是，两位一体地，走上‘革命’的鲁迅。”郑氏对鲁迅精神世界的矛盾性，完全加以省略化，将鲁迅思想众多的不确切性，简单地归结为私欲所致，这种论断完全是对鲁迅的嘲讽，同时证明，他根本就没有读懂鲁迅著作。如果说在文学研究中不同的审美尺度所产生的歧意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没有大量史实和没有细读鲁迅全集的情况下，凭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地品评对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文风的轻浮。

## 序四（8）

除了上述观点外，郑氏还对鲁迅与国民党、日本政府的关系发表了“新论”：

“的确，鲁迅先生的晚年，‘抗日’的意识更加激烈，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之要求租界当局逮捕他，恰恰相反，反暗中保护他。为什么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说是侵略。而说是‘膺惩’中国的‘军阀’，而鲁迅先生除‘苏联’不能放松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所指的‘军阀’，却也是他脑子里的仇人。因此，尽管鲁迅先生为着‘军阀的奴隶’——‘中国民众’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在反对‘中国军阀’的前提下，彼此却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因此，上海的‘大日本帝国武官’，谅解鲁迅先生的‘反日’，鲁迅先生在他们的保护下。也谅解于他们‘膺惩’中国‘军阀’。……”

这种对鲁迅政治意识随心所欲的解释，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在这里，鲁迅完全成了一个投机的、具有极端私欲的人，而且这种结论是来自作者想当然的臆造，丝毫没有半点事实的根据。和苏雪林相比，郑学稼的主观随意性显得并不逊色。

在《鲁迅正传》的后面，附录着《两个高尔基不愉快的会见》一文。文中对鲁迅竭尽挖苦之能事。这让人想起了林纾当年写《荆生》、《妖梦》时的笔法，除了近于疯狂的人身攻击，没有一丝的价值。

总之，郑学稼的结论是：

“所谓鲁迅的真正价值，就是他以文学家身份，指摘中国旧社会的残渣。他是这工作的优秀者，他又是这工作在文艺上的惟一完成者。我有这种感觉：如果没有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混乱情况误了他，他会在写实文学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也许他会成为我们的福楼拜。至于今日人们用‘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或‘青年导师’等尊称他，这是一点也不相称。……”

从郑学稼出版的《鲁迅正传》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确存在着一股反鲁的文化势力，鲁迅成了中国社会不同政治力量与不同文化势力争论的对象。亲国民党政府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文学创作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但都抹杀或反对鲁迅思想上的成就，试图把鲁迅从思想界分离出去，而只给一个作家的牌位。反对鲁迅的人几乎都没有摆脱政治上的偏见，许多文章没有一点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不论从批评本体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郑学稼等人还没有真正进入“批评”之门。

从苏雪林到郑学稼等人，我们可以大略感受到“反鲁”者的精神个性和政治态度。严格地说，他们的评论还不是“鲁迅研究”，而是“鲁迅观”，不是科学性的，而是随意性的。鲁迅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与不朽的人格价值完全被曲解了。“反鲁”者的态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态度。在中国社会处于最黑暗的时候，鲁迅作为一种伟大的破坏力量，不可能不受到落后势力的抨击，也不可能不受到传统力量拥护者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现象”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鲁迅生前与死后受到的亵渎，都与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有着重要的联系。它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人们，鲁迅的世界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实体，在那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真正理解鲁迅、懂得鲁迅，是十分困难的。

## 序五（1）

也许，对鲁迅的贬损，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是难以避免的。争论与商讨，属于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人身辱骂，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问题。大多数与鲁迅结下怨仇的人，他们的文章，流布很广。尤其是在港台，这种误导性文字，曾长时期左右着知识界。而在大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神化鲁迅，并且以他为棍子，极其虚无地否定历史与现实，使鲁迅形象，在当代青年那里一落千丈。记得一位前辈说过，鲁迅是一个不易被中国人接受的人物。我觉得此语甚对。许多中国人在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对鲁迅的拒绝心理。这些人大致为：贵族、绅士、市民，以及无特操的民众。鲁迅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一种“精英”文本。国民要么对他推崇备至，要么一脚踩倒的不同态度，恰恰证明了他的独特性。对于习惯于在中庸王国和封建思想中生存的国民来说，鲁迅的精神，是罕有的异端。而民众心理，是向来可以扑灭异端的。阮籍、嵇康一代叛逆之首，但魏晋以降，却少有人再将他们提起。明代的李贽，“其性褊急，其色矜高”，但晚年却未逃厄运。中国文化自身本未有滋生异端的土壤，倒是外来思想促进了个性主义的翻天覆地。魏晋文人的孤傲，得之于佛经真义；李贽的“好高而居傲不能下”，即得穆斯林之神，又受之于释氏之理。而鲁迅的“托尼文章、魏晋风骨”则集尼采主义与佛学于一身，凛凛然于世俗之上，可称得上中国历史上异端者流的第一人。既为异端，则生存空间就小得可怜。鲁迅的一生，备尝误解围攻之苦。北洋军阀不容他，国民党不容他，共产党左倾领导者不容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被文坛的是非所牵制。翻看先生的文章，常可见其心境之苦，在被无物之阵的包围之中，他孤然地挣扎着。尤其是晚年，那种“独战的悲哀”，更是长久地驱而不散。

从异端者的孤立无援的苦状，来理解鲁迅的世界，大概对研究者会提供理解鲁迅的新的思路。既为异端，其言其状，当然会招致众多

麻烦。独行者既有一往无前的大气魄，又有过于敏感的、甚至神经质性的东西在。不可讳言，鲁迅与众多敌人论战中，有时确实是带有偏激的因素在里面，例如对顾颉刚、胡适、梁实秋等人的讽刺，就有偏执的一面。深刻中的失当，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先生是个真性情的人。鲁迅早年曾有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把一个疯子误认为是个捣鬼者，后来真相大白，于是又撰文更正之。可见他是一个很坦然的人。对林语堂、施蛰存、梁实秋等人的微词，既是文化观念不同所致，又是人生观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先生在态度上迥于流俗的不可接受的辣味。看他与众多文化人的争辩，确实是常人难以接受的。然而，先生的深刻与真诚，亦表现在这里。倘以私情家语绳之于理，是不能见出先生的独特价值的。

## 序五（2）

我以为，鲁迅的价值，正是表现在这里。我们民族的历史，太古老了。愈古老，历史积习造成的负担则欲重。我时常想，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够出现一位像鲁迅这样的人，实在是民族的幸事。他让我们时时反省，时时思索，他使中国人摆脱了旧有文化的束缚，并且孕育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模式。而这个模式，对后世的中国人来说，肯定会像孔孟、老庄一样，长久地影响着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而实际上，在一切具有民族忧患感和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鲁迅的模式，已经在起着潜在的作用了。

一面是无休止的谩骂，一面是长久地震撼心灵的征服，这便是鲁迅生命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今天，看看有争议性的文字，让人思考的东西，肯定是不少的吧？历史是一部人的不同精神价值并汇的记忆，一切闪烁过思绪的文字，都会对后人有某种启示。而教训的暗示，是一种灰色的、不会生叶的枯树。它曾生长过，但不结硕果，不催新枝，枯木自有枯木的意义，倘无此，人们也许永远不会懂得生机盎然的意味。对那些终生诋毁鲁迅的人，亦可做如是观。

编完此书，夜已过半。微凉与奇静之中，心却无一点倦意。我很高兴，这鲁迅生前的遗愿，总算了却了。虽然有遗漏，有些作者考证得不全，但大致说来，反映了“围剿”鲁迅的面貌。我很感谢在编辑此书时友人们的帮助。陈漱渝、王世家、黄乔生等先生，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本书的编辑过程中，还要深深感谢张梦阳、刘国盈、王景山、李允经等先生。本书的资料主要是从张梦阳编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和刘国盈、王景山等人编的内部资料《“围剿”鲁迅资料选编》两书中筛选出来的。前者启示了我的思路，后者在体例上影响了我，并沿袭了刘国盈等先生的编书体例。我是在他们的成果基础上，进行再选编的，在此，对这些学术前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请注意这本书，它或许会成为你的学术研究中的朋友。

# 目录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陈源（1）
走到出版界——一九二五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长虹（6）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仿吾（20）
艺术与社会生活冯乃超（25）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33）
死去了的鲁迅钱杏（43）
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冯乃超（47）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李初梨（51）
“除掉”鲁迅的“除掉”!彭康（60）
鲁迅先生叶灵凤（66）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钱杏（67）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石厚生（76）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杜荃（81）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88）
答鲁迅先生实秋（91）
“无产阶级文学”实秋（96）
“资本家的走狗”实秋（98）
鲁迅与牛梁实秋（100）
鲁迅卖狗皮膏药甲辰生（103）
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男儿（105）
鲁迅大开汤饼会(节录)文坛小卒（108）
答鲁迅向培良（109）
作家素描美子（112）
“最通的”文艺王平陵（113）

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首甲等（115）
鲁迅的狂吠邵冠华（119）
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施蛰存（120）
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施蛰存（122）
聪明之道人（124）
给鲁迅的公开信杨人（127）
骂人与自供王平陵（129）
鲁迅与托派少离（130）
内山完造底秘密天一（132）
鲁迅愿作汉奸思（134）
给鲁迅的信徐懋庸（135）
还答鲁迅先生徐懋庸（137）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胡适苏雪林（142）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苏雪林（150）
阿Q的旧帐周作人（155）
《蛙》的教训周作人（157）
老人的胡闹周作人（159）
论骂人文章周作人（162）
鲁迅正传(节选)郑学稼（165）
鲁迅的再评价梅子（181）
出版后记（187）

##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1）

陈源①

志摩：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说了这两句话，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吧。好在他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要看的话。

远一些的一个例。他说我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实在呢，我同杨女士非但不是亲戚，简直就完全不认识。直到前年在女师大代课的时候，才在开会的时候见过她五六面。从去年二月起我就没有去代课。我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也就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杨女士。

近一些的一个例。我在《现代评论增刊》里泛论图书的重要。我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增刊六三页)。鲁迅先生在前一两星期的《语丝》里就轻轻的代我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你看见吗，那刀笔吏的笔尖?

再举一个与我无关的例吧。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好了，不举例了。不过你要知道，就是这位鲁迅先生，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首领”。

鲁迅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2）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念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里，说起不愿译《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说“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你看这才不愧为“青年叛徒的领袖”!他那种一见官僚便回头欲呕的神情，活现在纸上。可是啊，可是他现任教育部的佥事。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永彝”做总长，他

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么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了吧。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志摩，你看，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的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中国的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的“土匪”……我不得不也来庆祝中国的土匪!

志摩，不要以为我又生气了。我不过觉得鲁迅先生是我们中间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扯了一大段罢了。可惜我只见过他一次，不能代他画一幅文字的像——这也是一种无聊的妄想罢了，不要以为我自信能画得出这样心理繁复的人物来。

##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3）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么?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不写了，不写了。无聊的话也说够了。以上的二三千字已经够支持人家半年的攻击了。我现在也要说几句正经话了。

常常有人来问我，人家天天攻击我，他们不懂为什么。人家为什么攻击，我也不十分明了为什么。可是我为什么不回答，我是有理由的。

中国人私人相骂，谁的声音高就是谁的理由足。所以我宁可受些委屈，不愿意也不能与人相骂。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谁的理由大。所以我也宁可吃些亏，不愿意也不能与人家打官司。第一，我们不会捏造无中生有的事。第二，我们想不起那样的下流的字眼。第三，人家有的是闲功夫，好在衙门里没有别的事可做，我们不做事便没有饭吃。第四，人家能造种种的假名，看来好像人多势众，就是你所谓朋友也可用了假名来放两枝冷箭，我们却做不出这样的勾当。第五，他们的喽罗也实在多，我们虽然不是不认识人，可是他们既然对我们有几分信任，我们总不肯亦不忍鼓励他们去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第六，他们有的是欢迎谩骂的报纸，我们觉得自己办的一个报纸如能谩骂，还不如没有。

可是，志摩，还有一个顶大的原因。就是你所说的“漆黑一团”很容易把你围进去。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

左面是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泥潭里有的是已经陷下去的人，有的在浅处，有的已经没到了口鼻。他们在号着，叫着，笑着，骂着。你要是忍不住他们的诬辱，一停足，一回头，也许就会忘了你的目的地。你要是同他们一较量，你不能不失足，那时你再不设法拔你的脚出来，你也许会陷，陷，陷，直到没头没顶才完毕。这就是我一向不爱与人较量的理由。我觉得我们的才具虽小，我们的学问虽浅薄，究竟也有它们的适当的用处。爝火虽然没有多大的光，可是不能因为有了太阳便妄自菲薄，何况还没有太阳。所以我一向总想兢兢业业的向前走，总想不让暴戾之气占据我的心。可是，志摩，这次也危险得很了!这一次我想，我已经踏了两脚泥!我觉悟了。我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

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已经疲乏了。就打住吧。希望你恳切的指导我。

源十五年一月二八日

(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华盖集•不是信》。

注：

①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

## 走到出版界（1）

走到出版界——一九二五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长虹①

鲁迅为高长虹所作《心的挥险》

一书设计的封面我今应时代的需要来作此图，以述明北京出版界的实情。我想作此图，本始于去年暑假中居北京时，即我对北京出版界有较正确之了解时。初来也同一两个朋友略示此意，不料图尚未作，我个人之形势突然变异，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明白究竟。但我敢在这里特别声明的，即我为一游离者，中产阶级的利益我既不屑顾，无产阶级的战线我又未能至，故对于世人实不愿，也无其必要而行任何样式之斗争。我所说的话，其实只是看见什么便不愿意私有，以为说明真相，对于同时代的人们都不无用处。至于世间也不是没有人喜欢秘密，厌恶公开，然此只个人好恶不同，他喜欢秘密便秘密他的，我喜欢公开便公开我的，各行其是，本无抵触。闲言太多，画归正图。

这里所谓出版界者，此出版界一词，我在《走到出版界》中已屡用之。现在我也趁此加以一些说明。要知我们普通虽然也说什么文坛，什么思想界，实则仔细一考较时，才都是妄言妄听，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现在问你："文坛建立何处?思想界在三界的那一层?"则你必瞠目不能对答。因为这本来都是些错误的说法。即如你说文坛，实则说的只是这本诗集呀，那本小说呀，又一本杂感呀之类，你说思想界，其实也只说的几本书，或几种定期刊物，此外便什么没有。你说某人的思想如何，你并不看见他的思想，他也不能拿出他的思想给你看，这其间所说的只是书报，即出版物是也。出版物是什么?便是，有人写出，有人印出，有人去看。我今便混名此写，此印，此看，而称之以出版界。所以出版界的范围是很大的。

我何以此图单述北京的出版界呢?一、因为北京出版界比较发达，界限也比较显明。我们不妨大致这样说：广东重实行，上海多工厂，北京多言论。广东的出版物，我们常看不见什么。上海出版物虽然不少，然除商务派与非商务派外，我们看不见其他的色彩。北京则不但有专致于思想的工作者，即章士钊做一总长，也要来办一刊物，发挥他个人的主张。这是在别处所看不到的。二、本来都住在中国，北京并不是中国境外的一块地方，所以北京出版界的形势中也有中国出版界形势的缩影潜伏在里边，说北京则大致可知道全国。三、我个人对于北京出版界的状况知道得比较多些，而且是自己曾经参加过的，关系较亲，则言之较确。四、读者对于北京出版界的注意较多，而隔膜亦较多，所以有早于说明的必要。

## 走到出版界（2）

在三年以前，我对于出版界的情形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曾听人说过，鲁迅即周建人的别字，我便信以为真。亦如在今年暑假以前，培良尚以为章锡琛是一女士。那时狂飙社虽已成立，然潜声默影，初无表示。我个人为生活所苦，日惟解决出国问题，他无所顾。沐鸿尔时已有诗稿不少，我亟称之，而彼不信，要我就正于北京负时望之作者。我虽允许，然机缘既少，我又自信多而信人者少，所以终未成为事实。后来，不用说是些什么原因了吧，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办起一个小小的《狂飙》月刊，虽然只出了三期，然因此我们在出版界终于便成为“闯入者”了。

便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又因为出国问题，认识了晨副编辑孙伏园，也便送了他两份《狂飙》月刊。后来见了他时，他说他给周作人看了，但没有说什么。但我却得到郁达夫的两信。我早已便想中国的文艺界虽然分作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派——那时我以为鲁迅、周作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后来才知道不是的——但我们的刊物，两派大概都是会赞赏的。这时却又疑惑未必；一面我又觉得郁达夫倒很率真。还是说我的出国问题，伏园倒很好，说每年帮我二三百元的旅费是可以的，我给他留了一篇《离魂曲》，一面便想动手做《幻想与做梦》。不料，大概不到一月的光景吧，《离魂曲》还没有发表，《幻想与做梦》所以也还没有写，晨副却发生问题，伏园辞职了，这个问题，便是因为鲁迅的《我的失恋》而发生的。这个事件也影响到我：我的出国计划失败了！

于是，便到了双十节，北京政局起了剧变：即冯玉祥班师是也。应运而来的，一个老朋友所办的被曹政府封闭的日报复活了。我们在那里便又办起两个周刊：一，《世界语》周刊；一，即《狂飙》周刊也。《狂飙》因此也便再生，我同北京出版界的关系也便正式开始了。这一次的政变与北京出版界是很有关系的，政变以后，定期刊物

很出了几种，除五四时期外，怕没有再那样热闹过吧?我们居然在那种热闹中也凑了一个份子，却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再则，当《狂飙》周刊出版的时候，其实那时也还只一种也没有出版，《语丝》还是一两期以后才出的。我们对于这两个刊物，当时都觉得不好。《语丝》的文字我只看见第二期，《烽话》颇有意味。以后的《野草》，自然是又作别论了。我们对于当时出版界是不大注意的，我们只想做我们的工作。那时，还想办一个每周评论，批评实际生活，但没有成功。我同高歌向来不满意《新青年》时代的思想，但那时也并没有想开始批评，而我自己又还在妄想着出国。如我那时真的能够出国，现在想来，还是一件好事体，因为这样可以不看见无大关系的中国的出版界!

## 走到出版界（3）

在这里，我想夹叙一段似乎无大关系的事情；但我想，识者可以看出它不是无大关系的吧!我有一个朋友叫“君宇”的，曾做《向导》记者，在思想上我们可以说是互相反对的，但我却听说过他很希望我办一个刊物出来说话。也正在这年暑假中，我在一个地方遇见他了。谈话当然是没有结果的，所以他又说希望我出来办一刊物。但到我们办起刊物不久，他却死了。我虽然以为他思想浅薄，然而他的这种态度是我始终喜欢的。而他的死，也更减少了我从事某种批评的一个机缘。我在这里不得不又想念这一个朋友。

十一二月之间吧，京副出世，我又见了伏园，但不过随便谈谈，因我此时已无稿可卖了。我问起关于《狂飙》周刊的舆论。他说：“鲁迅曾问过长虹何人，那日请客，在座人很多，有麟也在。大家问《狂飙》如何，他说，据他看是好的。”我从此便证实我那一个推想，因鲁迅、郁达夫已都赞赏《狂飙》也。当时的《狂飙》是没有多少人看的，我们当时的无经验的心实私自欣慰，以为此两人必将给我们一些帮助，而《狂飙》亦从此可行得去也。而谁知乃有大谬不然者!

当我在《语丝》第三期看见《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时候，我既惊异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无从证实，置之不谈。自我从伏园处得到消息，于是鲁迅之对于《狂飙》，我已确知之矣。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我那时以为已走入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我与鲁迅，会面不止百次，然他所给与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新，彼此时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此以往，则递降

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

说到这里，我将转而一述郁达夫矣，一日下午，我同两个朋友——此中一友，今已不在人世，我哭之不及矣!——围炉坐谈，门外有叫长虹声者，我走出去。来者说："你是长虹!"我也说："你是达夫!"于是围炉者添一新友，而为四人矣!此时达夫出其雄谈，滔滔不绝，我等几无插言地。达夫去后，我谓此人态度率真，特言多宣传，隐含傲意，未能真正认识我等。在此以前，达夫曾给过我两次信，我则报以一诗，而无复信，但我却找过他两次，都没有遇见。

## 走到出版界（4）

我亦一骄傲人也，即我之友人，亦不乏斥我为骄傲者，他更无论。然我低头真理，面视坦白，蔑弃世故——然我亦非不识世故之童呆，我曾饱经世故，历受挫折，但我终不为彼所屈服——此则我敢于私心自信者。我当日晚上，便给达夫写了一率直而骄傲的信，我说，“明日下午想请你来大家喝一次酒；我觉得你身体很弱，但不知我能否帮助你些什么?”我何以请他来而不找他去呢?因为我曾问过他何时在家，他说，每天常在外面跑，改日他再来谈，并不像去今两月以前，达夫在北京遇见仲平，要他改日去谈谈，仲平未去，达夫便大生其气。不料到次日，我们等至晚上，达夫仍不来，我们才饿着肚子出去吃饭。而且连回信都没有。我犹疑惑或者信未接到，也说不定。又次日，我同高歌及另一两个朋友同去找他，入其凄凉之客厅，等候了好久，主人才拐着腿走来，谈话亦应酬多而真挚少矣。我现在再述一琐事，万一达夫贵眼见此贱文，以助其唤起当时的回忆。达夫指高歌问我曰：“此位?”我说：“高歌，我的弟弟。”达夫笑曰：“看见倒像你的哥哥。”我笑说：“舆论向来如此!”别有一事，则达夫谓张资平常发不平，说自己的小说比他的好，他也以为资平的话是对的。说着，把《东方杂志》上资平的一篇小说撕下来给我看。此文我回去只看一段，至今再未翻过。但从别处看了资平的几篇小说，则非小说也。我顺便报告给达夫我的意见。从这一次会面，我才知道了真相，因为达夫说信已收到，因他断酒，亦未复也。然而真相怕还不只于如此吧。我们从此以后便再没有见面，也便无从证实了。

那时，我对于我处的境地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因为我那时编辑《狂飙》的态度是认作品不认人，对朋友则认人不认其他。现在想来，才是错了。我那时已经是处于语丝社与创造社之间了。然而当达夫初次同我见面的时候，也说他在鲁迅那里他们也谈起《狂飙》，他还为《狂飙》发不平，说狂飙社人如是从外国回来的时候，则已成名

人了。在鲁迅处，我也问过他对创造社的意见，他说，还是达夫大胆一些。大家都正像朋友似的。

在那时我曾看见一个很好的时代的缩图，这可以使我想象到未来的那一个时代，我相信那一个时代是一定要到来，那决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但比过去的时代却好得多了。那时，我并没有多大的妄想，但我终没有料到它会那样恍惚的，它会像做了一个刹那的梦，那一个光明的缩图它才只做了现在这一个形势指掌图中的一个不重要的沙洲。那时，我在《幻想与做梦》中想写一篇——那是什么名字啊?我那时没有写得出来，我现在还是写不出来，我想，它将来是总可写得出来吧!

当《幻想与做梦》还没有写完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精神的宣言起来走了，到那篇文字发表出时，我早已离开北京了。这个宣言，我不久便证明是说谎。我不久便又回到北京，已经入了一九二五年的初间，于是我看见一切都变态了。于是我的《幻想与做梦》便写了第十六篇噩梦，于是便一切都完了，我知道我所希望的无论什么，都还是辽远的将来呢!

## 走到出版界（5）

“《狂飙》，你们弟兄两个包办了吧?”鲁迅向我同高歌说。

“成了兄弟周刊了!我们也正想办兄弟周刊呢!”我说。

这时，我开始来写《创伤》与《土仪》。这时，郁达夫也已走了。这时，鲁迅给与我的印象是一个平凡的人。这时，狂飙社内部发生问题。这时《狂飙》的销路逐期递降。这时，办日报的老朋友也走了，印刷方面也发生问题。终于，《狂飙》周刊到十七期受了报馆的压迫便停刊了。于是一切都完事大吉。一面，我还在写我的《创伤》与《土仪》，而且我的《创伤》还添了不少新的材料。

当我们的周刊办成兄弟周刊的时候，朋友们没有给我们表同情的，因为他们正在四处攻击我们，他们有的是在袖手旁观我们。但是，我把那个困难解决了，我质问一个攻击我们的朋友到他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们又变成原来的朋友了。我从此也便同培良开始了初次的长谈，我们开始做了形式上的同路人。但是，那个形式同形式以外的一切，对于我们都不大合适，所以还是到那个形式破灭之后，我们才渐渐入于实际的朋友。

郁达夫说过要给《狂飙》写的感想，当然没有写。鲁迅只给我的一个日本朋友译了两首诗。还是他好，他时常说想法给《狂飙》推广销路。但他说不能做批评，因为他向来不作批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我以为他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但是，如对于作批评的朋友，却要希望他党同伐异，便至少也是为人谋而不忠了!

当由兄弟周刊而变成朋友周刊的《狂飙》停刊之后，便是快入于《莽原》时期的时候了。但中间也还又有一点牵连，颇有一述的必要。当时有一个朋友愿意介绍《狂飙》到《京报》做一附属物，条件却是要他加入狂飙社。培良是偏于主张这样办的。听说那时鲁迅也赞成这样。我同高歌是反对这样办的。因为这个朋友，我们知道是不能合得来的，再则我们吃尽了附属的苦，而且连自己的朋友都隔膜太

多。《狂飙》遂不得再出。过了几天，我便听说鲁迅要编辑一个周刊了。最先提议的，大概是鲁迅、有麟、培良吧。我也被邀入伙，又加了衣萍，这便组成了那一次五人吃酒。这便是《莽原》的来历。《莽原》的倾向，是已从文艺而扩张到批评。培良是最好说话的人。我呢，虽已似老气横秋，然而只要得其当也并不是不好说话。我那时是想开始批评从《新青年》所沿袭下来的思想。培良是思想之外，又着重于文艺、戏剧。我那时以为，一个文艺家其实是一个孤独者，如中国人都能像冰心、郁达夫者，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了吗?批评作品，则当然可以，批评作者则不大必要。这是我们当时的态度所不同的地方。但这些在《莽原》上都可以说没有实现，因为《莽原》还没有出版时，培良已留下几篇《槟榔集》离京他去，我又陷入自己生活的迷雾中，无批评的余裕了。这时，高歌也已他去，所以现在的《莽原》半月刊倒无妨认他是一个外人。

## 走到出版界（6）

担任《莽原》稿件的人，当时是大家“举尔所知”，尚钺、燕生，是我举出的，沐鸿(即高成均，亦即劣者)的稿子也都是我带去的。别一方面，则是霁野、素园、丛芜几个人。《莽原》实只是大家的工作。至于外面人的观览呢，则那又只是鲁迅办的一个刊物，再不会认识其他。这不但是反对者如此，连赞成者也都是一鼻孔出气，所以我当时委实以为这两派人都差不多，所歧途者只是个人间利害关系不同而已。

大家想来知道当时引人注意的周刊可以说有四个，即：《莽原》、《语丝》、《猛进》、《现代评论》。《莽原》是最后出版的，暂且不说。最先，那三个周刊并没有显明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有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现代评论》有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一文，孙伏园又在京副说这三种刊物是姐妹周刊，都是例证。徐旭生给鲁迅的信说，思想革命也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虽然内部的同异是有的，然大体上却仍然是虚与委蛇。最先对于当时的刊物提出抗议的人却仍然是狂飙社的人物，我们攻击胡适，攻击周作人，而漠视《现代评论》与《猛进》。我们同鲁迅谈话时也时常说《语丝》不好，周作人无聊，钱玄同没有思想，非攻击不可。鲁迅是赞成我们的意见的。而鲁迅也在那时才提出思想革命的问题。但这个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因为并没有怎样实行。思想运动倒是从别一方面才表现出来，从实际的事件。至于思想上的战线，则始终没有分清，所以到霉江写《联合战线》一文时，终于碰了《语丝》的壁而撕碎了。而鲁迅则说，他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但大体上的界限却是很显明了：《莽原》、《语丝》、《猛进》对《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但孙伏园以后在京副以《语丝》、《猛进》、《现代评论》并举的时候也还有过。

我做关于实际的文字，是从《莽原》第八期弦上才开始的，正是当时的实际运动很急遽的时候。这文字的动机，一是因为《莽原》内部的问题，一是为想给与少数真正的反抗者以一些感兴。虽然人们从此便有以为我是专好骂人的，然而我的文字却并不是为骂人而作，倒是人们没有看懂。而且骂人的地方其实也很少。不过，人们既谓之曰谩骂，则我亦“谩骂”之而已!实则，我倒是反对谩骂的一人。但思想既与人们不同，这些处所当然也无从分辨，故当时也只好将错就错，听之而已!但要找当时骂人的口实时，则也怕还是从我开始的吧!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棉袍里的世界》才初次使用。但那是棉袍里的世界的声音，而不是骂某一个人，也不是泛常的骂，则怕明白的人还不多有呢!

## 走到出版界（7）

到实际运动起来的时候，思想革命的工作自然更无暇做起了。也许有人以为那已经做过且已完成了吗?否则，我们的现在又如何这样寂寞啊!当初的《语丝》并没有做这个工作的意思，《猛进》也没有的。只是《莽原》有其志而却未能做。而且《莽原》的内部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别有问题的。我是主张批评的，我以为如不批评，思想革命是没有结果的，而且连界限都分不清。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但是，骂的结果又怎么样呢?像做了一个噩梦，醒来时连主张过的思想革命都也像忘怀了!

我在这里顺便要批判几个人了。鲁迅是一个直觉力很好的人，但不能持论。如他对自己不主张批评，我不反对。但如因为自己不能批评，便根本反对批评，那便不应该了。我同他在初期的谈话里他倒并不反对批评，我以为还是那时的态度好些。以后的态度，我以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岂明是比较能够持论的了，但直觉力却不很好，这在事实上也便成为妥协。所以江绍原一面在晨副做文，一面又在《语丝》做文，而且使霉江撕毁了“联合战线”。我承认岂明的思想是在水平线上的，要奋发起来，还是好的。我去年也曾给过他一次信，希望他多做文字，自然我是不足道的。徐旭生是研究哲学的，当然能持论了，然直觉力实在不好，连人都认识不清。但他是一个最诚实的人，这一点我佩服。

如想再来一次思想革命，我以为非得由几个青年来做这件工作不可：他们的思想是新的，他们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他们是不妥协的，他们的小环境是单纯而没有什么纠葛的。已经成名的人，我想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便是最好的了。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的事实却不能证明他是这样态度。这事实只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同他反对的话都不要说，他想找一些人来替他说话，说他自己所想说的话，而他还不

以为他是受了人的帮助，有时倒反疑惑是别人在利用他呢!然而他却是得到了“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领袖”的荣誉!

在文字的战斗时期，鲁迅显然只知道有他自己，而忘记了同伴。我现在要举二件事实出来。当黎锦明屡次投稿不登的时候，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字攻击《莽原》，但不敢攻击鲁迅，却除开鲁迅去攻击其他的人。鲁迅是《莽原》的编辑，不登稿也是鲁迅不登，并不是其他的人，两者都应该他出来说话。而他不但不说话，到我写了那篇已经十分和平的《弦外余音》的时候，他反以为是无须乎的样子。他说过几次要攻击江绍原，但又说要等到暑假开学以后。我在《莽原》第十三期写了《弦上第八•我的命令》一文后，《语丝》第四十二期便有江绍原的一篇仿近人体骂章川岛，我很疑惑，后来知道那是仿民副上的一篇文字。

## 走到出版界（8）

我那时说应该说几句话了。但他却说，江绍原已托川岛来向他认错，所以无须说话。江绍原向鲁迅认错，便可以白骂了别人!但到了霉江的信来的时候，他又说他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了!若再述一件琐事，则鲁迅更不应该。当“他妈的”三字在《棉袍里的世界》初次使用的时候，鲁迅看了，惊异地说：“这三个字你也用了!”我说：“其实《工人绥惠略夫》上也有过，但只是用你的娘。”我们看鲁迅《论他妈的》一文，却居然有“予生也晚”云云了!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霉江的那封信，再看信中征引的岂明“而新的还没练好”那一句话，我们又当作何感呢?他使“新的”撕碎了“联合战线”而不自知，他却知道说“新的还没练好”!对于自己何其宽容，对于他人何其夸大!我们如再看了他关于国民文学的那两句话“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时，又当作何感想呢?我当时看了此文，便老大地不满意，真不知岂明何以自处，又何以处人!岂明年纪至多不过四十以上，以古例之，正在不惑的时候，以新例之，则托尔斯泰尚未著其《忏悔》也，乃自己不努力，而把责任推在青年身上，而独不自知，乃敢谓在训练新兵!试问岂明：不知科学，何以训练科学的新兵?不敢批评，无创作力，何以训练艺术的新兵?左顾孺人，右对稚子，身不履险，足不行远，茶余酒后，偶作一二率直短文，便以为功不再世，此何以能训练实行的新兵?若夫当时的所谓新兵者，亦大抵是二十以上的人，力量却是大得多，即鲁迅所谓富有生力者也。他们所缺乏的倒只是地位与声望，这倒正需要有人帮助，如蔡孑民昔日之帮助《新青年》者。我写到这里真不免有怀古之感而有如鲁迅之怕敢想下去者!不料当事诸人无蔡孑民之雅量，不重视青年思想之自觉，而视为若为彼等私人争气，而独不知感激，反妄以主帅自诩，我当时真叹中国民族之心死矣!至于反对刊物，则又谣诼繁兴，横加污蔑，而诸作者不特忽视他人之痛苦，而反故贻人以口实!对于私人方

面，则又某籍某系，盈篇累幅，层出不穷。如人心未死，请清夜自思，亦有一二可供自我谴责者否?

我今再转而一述徐旭生又何如者。徐旭生为人老实，我曾听河南朋友说过，鲁迅也曾说过，第一次是我同培良为《狂飙》事找他去的，我所见过的他也以这一次是为最坦白。他说，《猛进》文艺稿甚少，希望我们做点文字。我们是极愿意帮助他，只是当时做不出多少文字。然而我们也终于帮助他了。《猛进》第十五期发表欧阳兰诗，一时传为笑柄，我知再难坐视，遂先后送了他几篇稿子，即：第二十期我的《三段故事》，第二十三期劣者的《游惰的灵魂》，第二十六期尚钺的《一切都黑暗了》、《生活与希望》是也。谁知这个诚实的朋友也知道摆他们所攻击的臭架子，不但毫无谢意，且不久乃似以敌眼看我了。这都是伤心话，不免还要详细叙述一番。

## 走到出版界（9）

这便又该回头来说到《莽原》事件，而且得回头来说到《狂飙》事件。《莽原》内部的派别无可讳言，当初是鲁迅、有麟、尚钺同我算是一派，素园、霁野、丛芜又是一派。当暑假将到的时候，尚钺走了，有麟听说素园等不来稿了，因为我有稿费，他们没有。我因事既因我而起，遂同鲁迅商量也给他们一些稿费，鲁迅说，无须。我又说，那我便去找他们一次。鲁迅也说，无须。当时有麟是怕暑假中没有稿件，但鲁迅同我却不怕这层。我当时说，不但还有一两个朋友可以寄稿来，便只剩我们三人，也能维持下去。不料过了一两礼拜，素园等又寄稿了。实则我一月虽拿十元八元钱，然不是我亲自去代售处北新书局讨要，便是催迫有麟去讨要，并不是正当薪水，出纳分明。这其实是普通视为丢脸的事。鲁迅也同有麟、小峰说过，因为我穷，给点钱用，这一点我感激鲁迅。素园等坐在家里，不见编辑，不见发行，又不到代售处，而想有人送稿费去，如何能办到。素园今发行《莽原》，与北新书局不无往来，当已知北新的钱不是容易拿到了吧!素园今发行《莽原》之对于撰稿者与昔日有麟又如何者。不退稿已足，我们不愿有过外的要求也!请素园平心静气酌量前后事件而比较观之，此中亦究有公理存在否?

从稿费问题起后，我才听有麟说，某君在《莽原》初办时已在鲁迅前攻击过我同高歌。这类事我本早可想到，以其无关重要，不去理会。攻击我的人向来是多的，然都是口出耳入，不敢写在纸上，所谓流言，说者既不负责任，我又何苦多事计较?此事又涉及《狂飙》时期卖稿事件。然某报之穷，人所共知，我等又无买稿权，何必积怨成仇?我想素园、丛芜亦未必如某君之小器也。我向来看人，不愿以类视，一个人还他一个人，不特某君不同素园，即素园亦不同于丛芜。且此事说来，牵涉更多，不复细述。如素园提出异议，我必奉陪。

现在我再一说民副事件，此关系较大，也是我视为最痛心的一事。内情鲁迅知道，素园知道，不足为外人道。是我当时看见静农态度不好，然我不愿意说出。静农去后，鲁迅也说出同样怀疑，我于是也说出。鲁迅托我次日到徐旭生处打听一下。我次日没有打听去，却又到了鲁迅家里。鲁迅又提起此事，又托我去打听。我再次日去打听时，则诚如我等所怀疑者。鲁迅当下同我商量，说要给徐旭生去信说明真相。我说："为思想计，则多一刊物总比少一刊物好，为刊物则素园编辑总比孙伏园好，其他都可牺牲。"鲁迅说："只是态度太不好——但那样又近于破坏了!"于是鲁迅没有写信，而民副产生。这些本来与我无关，无须多管闲事。但不料此后我再见徐旭生时，则看我为贼人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也!不料不久以后则鲁迅亦以我为太好管闲事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矣!

当民副定议出版前，素园来找我要稿，此素园之无伏园编辑臭架子也!素园又谓听鲁彦说，衣萍对鲁迅说他们用手段，事出误会。不知果否传闻之误，然我当时则以为素园之不坦白也，故未致一辞。又素园要我做稿，态度大似"鲁迅做稿，周作人做稿，某某人做稿，所以你也可以做稿"，这又是使我很不满意的。我以为既是来要我做稿，则只说要我做稿好了。然而萍水相逢，我留他吃饭，我对于朋友，也并不怠慢!而且我也做稿，虽然他们把自己的稿子放在前面，拿我的稿子掉尾巴，然而我终还做稿，为所谓"联合战线"也!

## 走到出版界（10）

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也这样说，鲁迅也不是不这样说；然则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反对者说：青年是奴仆!自“训练”见于文字，于是思想界说：青年是奴仆!自此“权威”见于文字，于是青年自己来宣告说：我们是奴仆!我真不能不叹中国民族的心死了!

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岂明也大抵在四十上下，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思想呢，则个人只是个人的思想，用之于反抗，则都有余，用之于压迫，则都不足!如大家都不拿人当人，则一批倒下，一批起来；一批起来，一批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戏，没有了局。所以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有当年的胡适，也有今日的胡适；有当年的章士钊，也有今日的章士钊。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

说话太多，再来叙事。我又见了鲁迅，他问及民副投稿事。我说了我的不满意。他很奇怪地问：“为什么?”我便说了那个“某人……所以你……”的公式。鲁迅默然，停了一歇，他又说道：“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要是当年的鲁迅，我不等他说，便提出问题来了。即不然，要是当年的鲁迅，我这时便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了。但是，我那时也默然了!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我当晚到鲁迅家略谈片刻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此后，我们便再没有能谈坦白的话。

实际的运动虽然失败，然文字的运动总算是胜利了。这却是由于“联合战线”的好处。单凭一两个人是没多大用处的。《现代评论》

本来是由太平洋社同创造社合作的，但创造社却逐渐退出了。有不少青年学生因此都知道了《现代评论》的没有价值。虽然比陈源会说话的徐志摩编辑了晨副，然而也无所施其技。虽然用“话匣子”做题目似乎同我开过玩笑，然而我当时已无心做文，无心看报，所以始终不知其详。我本来对于文字方面是主张批评的。对《现代评论》，对《甲寅》，我都曾想批评过。便是在反陈空气最热的时候，我仍然同鲁迅这样说。而且我说：“便是陈源同我做朋友也好，但是批评仍然是批评。”这当然是他所不高兴的话。我当时没有能够实行我的主张。便是到徐志摩编辑晨副消息传出时，我仍想批评过。但不久，不但批评，我连什么文字都不想做了。在闹嚷嚷的这一个时期，只有张申府同周作人的辩论辟出另外的一个境地，却是张申府占优势的。我当时不赞成张申府的态度，但我也才知道他的见解好，能持论。到吴稚晖的文字出现后，则又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 走到出版界（11）

郁达夫去年也是回过一次北京的，但只做了一篇反《甲寅》的照例文字，一面又敷衍于陈、杨之间。所以他那时至少也是妥协派。郁达夫是时常唾骂大人先生的，曾发表过文字劝青年去偷，他也是青年，为什么反同压迫青年的大人先生们妥协呢?这便又涉及所谓文学共和国里的党派问题了。

我是不懂什么党派的，如有不认识的人攻击我的朋友，如其攻击得对，我也赞成。我自己呢，如其我今天的思想不攻击我昨天的思想，那我也便没有进步了。如有人攻击我，我倒是非常感激呢!岂明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态度，这是我最赞成他的一点。即如他不佩服鲁迅的小说，却佩服郁达夫的，这是他的一种最好的自由批评的精神。他如能把这一种精神尽量地表现出来，便是一个最好的批评家了。郁达夫是写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的人，然他所举的例却是新旧艺术的斗争。郁达夫是写实派呢，还是罗曼派呢?郁达夫同当时压迫青年的现代评论社妥协，是艺术上的罗曼运动呢，还是写实运动呢?或者阶级斗争可以解作此社与彼社的斗争吗?则成仿吾，《洪水》何以又攻击陈源，岂明何以又佩服郁达夫?然则郁达夫不过是受了因袭的党派思想的支配罢了，如何能拿阶级斗争来作护身符呢?中国的经济状况同外国是不一样的，如有人要主张阶级斗争，实际上的或艺术上的，须先把中国的经济状况说得明白，分出界线，才行。否则，那只是党同伐异而已!

一个人的作品和思想，都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个人不得据为私有。写的写出，印的印出，看的去看，批评的去批评。四者之中本无所谓“联合战线”。著作者虽然无妨用其作品卖钱，然作品并非为卖钱而产生，著作者虽然无妨以作品而得名，然作品不能作求名之工具。若著作者既已假此而得名，而又患得患失，得而又欲扩而充之，而著作者间乃至行其相互之仇恨，即退一步说，视之为亦无不可。然挟此

私恨以行于群众运动之中，不惜淆乱黑白，假公济私，则与章士钊之所为何异，有何颜面去反对章士钊呢?

我本来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是表同情的，正如前面所说艺术家都是孤独者。不但我在《莽原》第六期《中国与文学》一文曾以《呐喊》、《沉沦》、《超人》并举，而且我同鲁迅在谈话间也没有攻击过他。而且我对于创造社几个人都是同样态度。有一次谈起成仿吾批评《呐喊》，我只说，态度不好，但见解我以为有一部分还是对的。鲁迅则常说郭沫若骄傲，我则说他的态度才能倒都好，颇有类似歌德的样子。鲁迅说，他可没有歌德的伟大。我说，他正是学歌德学坏了，所以我将来想批评他，把他的错处指出，他大概可以变好。鲁迅则说，他不以为你说得对的。我说，只是我对于歌德没有研究，我想用歌德批评他最好。鲁迅说，那他要同你辩论。我说，辩论是可以的。只是，鲁迅说郭沫若骄傲不只一次，我时常疑惑他是借郭沫若说我的，所以我常不说什么话。他也说《女神》好，《星空》不好，却同我的意见一样。因为我对于创造社的态度如此，所以到后来我在鲁迅处听品青说郁达夫往来于杨、陈之间的时候，我真不能不为他痛惜的了!

## 走到出版界（12）

所谓党派者，在传说上好像是很热闹的，我对此实在是莫名其妙。有一次，听一个朋友说，从北新书局传出的消息，郭沫若醉后写了一副对联给周作人，意思是什么成文豪置房产之类吧，原句已记不起了。当时我以为沫若不至如此，但真相如何，却无从证实，我也没有调查，不久便忘掉了。但事实有无，且不管它，既然成了一种传说，则在某种意义上也便是一种事实了。我不知道外国有没有这类现象，我想，大概是不会有吧?这对于中国的艺术，总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想将来是可以不会有的吧?

但不久，好像我也陷入这样漩涡了。一次，鲁迅对我说，有一个叫李玄的，山西人住某路某号，给周作人去信，说他听说北京只有五个人，我想看一看这五个人究竟如何。他听说我从前在那里住过，所以要我调查一下。我当时觉得好像这信便是我写的似的。我确乎也有这样一个朋友，但我却没有知道他到了北京。我便转托了一个朋友去调查时，果然是那个朋友到了北京。以后事实如何，我没有再留心，我实在不高兴再留心这一类事实。其实，这些倒还是常有的事实呢!

传说这一类事，我是讨厌透了的，这不能证明事实，而只能淆乱事实。关于《莽原》的，有一些人都疑惑是我编辑，连徐旭生都有一次这样问过我。外面来稿不登的，也有人便积怨于我。事实则是，《莽原》通讯处是有麟住的地方，收到的稿，他再转给鲁迅看。例如焦菊隐，是我曾见过一次面的，他投稿几次都没有登，听说他初次投稿时曾提及我，但到我知道时，已是两三个月以后了。所以我连信都无从回复。又如黎锦明也曾给有麟同我去过一次信，有麟倒转给我了。但他的意思是想借我的笔骂锦明。所以我便索兴不说话。此类事实还很多，后来我因此在我的生活上还接受过一次报复，但那时不但主持正义的先生们，便是土匪派的先生们也没有注意，以为那只是我个人的私事。至于时常传说有某某人想办一刊物专攻击《莽原》，则

又知道在暗中似乎又有一所谓反莽原派了。我却是欢迎这样攻击的，形诸文字上的攻击，至少也可以表明各个的态度，这在中国是很需要的一种现象。然而偏始终没有出现，或者已无形消灭也未可知了。

当时虽然是打着思想革命的招牌，然而工作却已偏重到事实方面，而且大有被节外生枝的另一些琐碎事实所混乱了的趋势。到暑假中，我觉得《狂飙》月刊不可以不进行了。也已经同鲁迅、徐旭生担任稿件，但后来却都没有做。我又想暂且停止了这个工作，退出北京的出版界，到上海游逛一次。我开始写《生的跃动》，预备写六七万字来上海卖稿。但又有朋友提议先出一期不定期刊，于是我把《生的跃动》写了五分之一的样子便收缩住留给不定期刊用了。培良、高歌也正在这时回到北京。培良写了一篇批评《现代评论》前二十六期的小说的文字，我本来想写一篇文字批评《现代评论》的思想，但又没有做起。到《狂飙》不定期刊中经颠连困顿出现到北京出版界的时候，我已不在北京了。《狂飙》不定期刊此时便走了孤独的路，不像本来的《狂飙》周刊了。这已到了一年的未了的一月，《狂飙》月刊把着开始思想上的联合战线上的思想的批评工作，然而没有能够开始，而仅只出了一本不定期刊，且已像站在联合战线以外了。从《狂飙》周刊起，中经《莽原》周刊，而又到了《狂飙》不定期刊，这是我在北京出版界经历的一部分的实情。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

(1926年11月17日上海《狂飙》周刊第五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注：

①长虹，即高长虹(1898～1949)，山西盂县人，狂飙社成员。早期追随鲁迅，后反目。

##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1）

仿吾①

鲁迅两年前下了坚绝的决心，不问出版界情状的我，这两年来少受了许多无名的闷气，真是心身都很安泰，自己觉得这样再好没有了。这次重游岭南，因为创造社出版部的关系，却不得不常常与现在的出版界接触。这对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灾难。但是小心翼翼的我却也早已节节布防，非曾经别人看过证明了不妨看看的书，我是决不使灵魂去冒险，就是不妨看看的书，我也只看看一两行，便专去考察它们的外形的进步，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已经知道了它们的外形委实要比它们的内容充实。这一点是我们出版界的一大进步。而特放异彩的是志摩的古装复辟，他的忠肝义胆应可光耀日月。不过志摩这人有的是钱，有的是闲暇，论起他的高怀逸志来，就是恢复竹书与结绳也不足多怪。所以倒是刘半农博士的古装书功劳犹不可没。他的意思大约是不让志摩专美，这种竞进的精神犹为难能可贵。

据我的推测，外形既然进步，内容也应该长进，我以为内容充实的程度至少也应该有外形的十分之一。可是最近因为友人的恶作剧与自己的好奇心，看了几本书的结果，却真叫我后悔不及。内容的空虚，文字的丑恶，都不见得比从前好了几多，反而从前所幸有的努力于表现的一种纯洁的态度已经无处可寻，磅礴着在的，在创作上是时代错误的趣味的高调，在评论上是狂妄的瞎说的乱响。

本来我们的文艺界自从国语文学运动以来，仅在黎明时期有过纯粹努力于表现的一个时候；那时候的作品虽然不免幼稚，但是大家的努力，就好像许久被人把口封住了的一旦得了自由的一样，都是集中在自我的表现的。不过这个时期统共还不上一二年，大家的表现力就被一阵小诗的手淫消耗了一大部。自从经过了这小诗的手淫之后，我早就叹息那些时髦的作家太早把精力乱费了—个干净，早就预料他们

没有恢复表现力的可能，没有振作的希望。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早就堕落到趣味的一条绝路上去的。

这真是出人意想之外，实在太早了。年青的我们，我们应有热烈的感情，应有热爱真理的勇气；我们应努力于自我的表现，我们应当阐明真理。趣味是苟延残喘的老人或蹉跎岁月的资产阶级，是他们的玩意，我们年青的作家太早就堕落到这个地步，这真是出人意表的怪状。

最奇怪的是同样被趣味麻醉着的评坛的瞎说。新近看到的几种小刊物里头，时常有些奇怪的文字使你不得不哑然失笑。在他们的评论的字里行间，真理好像是过于微细，致被筛了出去。每个评论者是一个暴君，每篇评论是一部律令。谁能不服从他？谁胆敢加以反驳？然而他们的背后其实仍是趣味这怪物在捣鬼，就好像每个军阀后面必有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在捣鬼一样。

##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2）

趣味这东西含有对于某种事物有特别嗜好的意义。这是必然的，因为普遍的趣味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称，而趣味如果普遍化，也就不能成为趣味。

但是一个创作家，或一个读者，或一个批评家，他如果保有特别的嗜好，他是不能为适当的观察，或不能容真实的感受，或不能为正确的评论。

我想只要是能够反省的人，当他遇着趣味这种臭气，或则在趣味的氛围气中彷徨了一阵之后，一定要发出三个疑问来：

一、这是文艺的正轨吗?

二、这是在中国文学进化的过程上应该如是的吗?

三、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是这样的文学?

我想只要是能够反省而对于文艺有相当的理解，对于时代有真正的认识的人，我想他对于这三个疑问的解答一定是三个相同的“不是”。

文艺是生活基调的反映，我们由文艺可以知道产生这种文艺的生活基调，就如我们由工业制造品可以知道产生这种工业制造品的人民的人情风俗。我们由现在那些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可以知道这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换句话，就是必有一种有特别嗜好的作者，有同类嗜好的刊行者与读者，他们的同类的特别嗜好成为了一种共同的生活基调，才有了这样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而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事实上我们现在寻得着这文艺上的三宝，看得到他们所谓趣味的真相，而他们的福地我们访得着是那个讨赤的首都，一个白化的都会。那儿有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Cycle，那儿有我们的北新书局，那儿有我们的无数的，没有课上的大学堂里念书的，未来的文人学

士。景象萧条的白都，连学校的门都是紧闭着的，城外的战云是密布着，城内的居民是僵尸般的呆望着，这时候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带了他的Cyclc悠然而来，扬着十目所视的手儿高叫道：

“做小诗罢!俳句罢!

使心灵去冒险罢!

读古事记罢!徒然草罢!

……”

这时候刘半农博士不知道几时跑了回来，扬着鞭儿，敲着他的瓦釜，大叫了一声：

“读何典罢!”

##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3）

在这时候，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而我们的西滢先生却在说他那闲话。北新书局呢，老板不消说是在忙着编纂，排印工人不消说是在黑的铅字房里钻动。大学堂里念书的呢，他们是在耽读着，著述着，时时仍在仰着头等待什么人再给他们一点天启。这些光景我们都不难想象。

现在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是这样发源出来，是这样合流着，以至于有今日的泛滥。我们已经看见有许多不成话的小刊物钻了出来效颦，甚至一种刊物非以趣味为中心不能使读者满足。

至于评论一门，素来就多是瞎说的，但从前的瞎说多半是因为幼稚无知，很老实地信口胡说，而近来的瞎说却多在趣味这美名之下的胡说霸道。“我喜欢这种作品”，“我不喜欢他的作风”，这样的话便是评论的根据。本来批评家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种动物，对于一种东西自己喜欢不喜欢，他是没有自决的自由的。他是好像一个天秤，黄金要秤量，粪土也要秤量的。现在我们的批评的揭竿起来，高叫“还我自由”，这种革命比什么为自由解放的斗争的功劳还要伟大，我们的批评家的勇气真是可钦可爱。假如我将来要做一个批评家，我是要感恩戴德没齿不忘的。

但是我们站在文艺的立脚点，看清楚我们的时代，并且意识着文艺进化的过程，深自反省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荒淫后的荒淫究竟能不能予以肯定?

疲倦后一时的悠游，长途上一时的驻足，对于这些，趣味常有生理上更新的效力；然而假使是长期的晏安，这便是永远的堕落。我们知道鸦片与Cocaine有一时兴奋的效用，但是朝夕与它们接近的时候，可以使你成为一个烟鬼。凡所谓趣味都是这样的，它是路旁的一个迷魂阵。

我们的文学界几时紧张过来以至于要有一时的休息?在新文艺进化的过程上我们为什么要钻入迷魂阵中去自己骗自己?我们现在的时代许不许我们效颦于Bourgeois强自舞文弄墨呢?我们怎样能够问心无愧?专就文艺而论，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文艺的修行者所应走的正路?

北京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Cycle，北新书局及大学堂里念书的，他们的生活也许本来就奏着那样的Rhythm才有那样的文艺出现。对于他们的生活，我们是不宜过问。但是没有趣味的我们，而且不幸而吸不着北京那种空气的我们，我们是不能不有所反省。

但是我们只要一加反省，就一定对于那些趣味家的态度感着不满。第一，他们的态度是游玩的，不诚实的；这是由趣味那东西的本性可以明白的。第二，他们常把自己没入于琐碎的现象之中而以感着所谓趣味为目的，他们不能把一个个的现象就整个的全体观察，所以他们的态度是非艺术的。

##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4）

我们同着小朋友游行过的人，每每会感到一种偶然的不快，就是遇着街上有什么特别事故的时候；小朋友总要钻进里面去游玩半天，把你撇在街头不理，一定过些时候才欣欣然跑出来。小朋友是在寻找趣味，他是不知道观察的方法，他是忘记了一切，当然也忘记了他的老朋友。这种态度是享乐的而不是艺术的。

至于那些胡说霸道的批评，做那些文字的人根本是没有艺术的良心的。他们只是凭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凭自己劣等的感情，出出风头，报报恩怨的。这种行为毕竟是无益于己，无损于人，时间到临的时候，他们终须抱头鼠窜，隐迹吞声的。

综观数年来的新文学，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我们纷扰不宁的国事，因为二者都是不曾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不曾找着一个目标，天天总是在崎岖的荒郊中乱窜乱走。现在已经是我们应该起来革命的时候!

我们应该反省。我们不应该尽管在崎岖的荒郊中乱走乱窜。我们要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找着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明白我们以前把可惜的光阴在荒淫中虚掷了，我们不曾去求过目标，我们简直不曾努力过。我们现在是应当努力，努力本身便是有价值的，不努力便是堕落，便是死。

我们应该反省。我们不应当自己骗自己，也不应当受他人的骗。我们要拿出勇气来打倒这种不诚实的、非艺术的态度。这几年来在荒淫中把精力消耗了的我们，应当向着目标加倍的努力。我们应当恢复纯粹的表现的要求，我们应当仍努力于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之创造。

真诚的同志们!永远的同道者!我们起来，打倒一切不诚实的、非艺术的态度!我们要看清楚时代的要求，要不忘记文艺的本质!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

(附白)关于本文如有讨论，作者极愿领教，但讥谩讽骂之文字恕不答复。

(1927年1月16日《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注：

①仿吾，即成仿吾(1897～1984)，创造社成员，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

## 艺术与社会生活（1）

冯乃超①

一

这篇小论文或许不能给学校里的教授们以满足的意见，因为他们或许暗记着Plato，Aristoteles，Kant，Croce，Lipps等等，诸如此类的美学学说，然而，我们用不着拉他们来到这里装成严肃的学者的样子。

这篇小论文或许不见许于当代堂堂的大艺术家，因为MichelAngelo是怎么样的崇高，Raphael是怎么样的优美，这些骨董商人的知识，在这里完全用不着。

那么，我们不能不快点进本文去。

二

人类只能提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可以解决的物质的条件已经存在之故。我们不去勾引古人的名章大论来粉饰思想的幽玄，只因为我们的言论不能不给社会所提出的活生生的问题以切实的解答之故。

那么，我们的社会在艺术的分野提出什么问题呢?为究明问题之所在，我们不能不研究中国的文艺与社会二者目前的状态——这个研究又非从历史的过程上着手不成。

文学革命以来——白话文运动以来，封建思想的代言者——旧文学——确定地衰替了。然而，这个文化上的新运动获得了什么东西呢?白话文底确立!然而，不上两年，《红楼梦》的考证，《儒林外史》的标点，风靡天下了。这又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不把潜伏着的根本的社会的根据裸露出来，这却也是可能的吧。

自从中国各地的重要商港化为了殖民地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落后得很远，渐渐有了微弱的发生，加以受过自由思想的洗礼的知识阶级——东西洋留学生，对着窒息的封建制社会的拘束，发生如荼

如火的改革的热忱。在这个时候，胡适博士的《文学改良刍议》——新文学运动，正所谓对症施方的良药，适应社会的切实的要求。从这个观点，博士在历史上演了很重大的革命的任务，然而，白话运动的元勋——新文学运动的健将，我们的胡适之博士不久却又引导它没落到泥泞的湖沼里去了。考古!疑古!!动地般敲着退军的鼙鼓，博士革命的责任就此告终了，博士的历史的使命就此完结了，不太仓惶了么?

但是，从这个时候以来，在文艺的分野中，试炼这白话文的新武器的新作家的簇生，蓬蓬勃勃，大有春雷新笋一般的现象。何故呢?因为上海滩上有了商务印书馆(——注意!这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原不必指定四马路棋盘街那间商务印书馆)、泰东书局等等，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家的魔手伸到出版界来了，同时又说中国的社会生活渐向近代文明国家的社会生活接近了。

## 艺术与社会生活（2）

其次，我们有分析文学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坛的必要，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作详细的批判，只抽出几个代表作家并指出他们的倾向和社会的关系便足。

从主张提倡自然主义的一派——文学研究会的团体中，可以抽出叶圣陶。他是一个静观人生的作家，他只描写个人(——当然是很寂寞的有教养的一个知识阶级)和守旧的封建社会，他方面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隔膜”。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他反映着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别一方面他的倾向又证明文学研究会标榜着自然主义的口号的误谬，这是非革命的倾向!

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郁达夫的悲哀，令一般青年切实地同感的原因，因为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是他们所要申诉的，——他们都是《沉沦》中的主人公。但是，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

我们若要寻一个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就是郭沫若。《王昭君》、《聂》、《卓文君》里面的叛道的热情就是作者对于社会的反抗的翻译。创造社的Romanticism运动在当时确不失为进步的行为。

其次，我们可以举出一位通俗作家张资平。他自从写了一本暴露中国基督教信徒的内幕的小说《上帝的儿女们》以后，一向不见有会心的名作，只给一般人描写学生的平凡生活。小资产阶级的无聊的叹

息和虚伪的两性生活。他的任务在革命期中的中国社会当然会没落到反动的阵营里去。

以上举了五个作家，当然他们五个人可以代表五种类的有教养的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以敏感的感受性，圆滑的技巧，描写尽中国的悲哀，但是小资产阶级PtitBourgeois的特性是可以倾向保守也可以倾向革命的。时代忙快地流换，地球不绝地回转，他们没落的没落，革命的革命去了。

那么，当时的文坛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呢?

## 艺术与社会生活（3）

在似而非的共和制的中国社会上，把握政权的阶级就是封建遗制的军阀。他们肥私腹的榨取与外国的经济的掠夺，弄得中流以下的各阶级不聊生地感受生活的困苦。这样乌云密布的“中国的悲哀”，当然反映到文学的作品上。所以中国的艺术家多出自小资产阶级的层中，是当然的事实——中国还没有雄健的资产阶级，在此社会层中不会诞生伟大的艺术家，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Pierotte)。

我本来没有意思呶呶滔滔地讲谈历史的事实的，然而，理解当时的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关系，也可以作理解现在中国的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

三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的讨论已经达到本问题的核心了。

那么，现在中国的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换言之——在转换期中的中国的艺术的分野上，应该怎样建设我们的指导理论?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细心把中国社会的现状更作全面的分析，这却也是可能的。

这个问题的分析，不能不自资本主义底社会的经济的国际的过程说起。那么，我们可以想起一节很重要的文章，就是:

“资产者团，因一切的生产工具底急激的改良及无限地容易化的交通，把一切的国民——连极野蛮的——也牵入文明的队里了。

资产者团底价格低廉的商品，是——粉碎一切万里长城，征服蛮人底对于外国人的顽固的憎恶心的——重炮。

资产者团强逼一切的国民，假使他们不愿意灭亡，他们也不能不采用资产者团底生产样式。

资产者团强逼一切的国民，输入所谓文明这个东西而变成资产者。一言以蔽之，资产者团仿着自身的形象，创出一个世界。”

这个照心彻背的卓论，是否适当地，是否明确地把资产社会波及于后进国的真相裸露出来，谁人可以怀疑它?

对于这个资产者团的重炮，再有第二世的秦始皇么?没有!农村零落了，都市普罗列塔利亚特(Proletariat)发生了。谁人能说中国依然是(封建的)文明之邦，礼教之国?封建老人不常叹世风日下，人心浇薄么?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渐向市民的气习同化了的佐证。别的方面我们可以从大学教授们的“欧化”问题中寻活生生的铁证。然而，“欧化”——这个变革的意识断不能从人类自身的想象上求它的判断的，而它们底想象(意识)反要在物质生活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所发生的抵触上说明去。所以讨论“欧化”这个问题的适当与否的喧嚣，简直是群瞽的瞎闹。再进一步说，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的立脚点，希求建设近代的文明国家的欲念，不外暴露自家的阶级的本质罢了。

以上我们可以明白世界资本主义的正体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因此，中国的社会从根本上翻覆了旧形态，而变革的欲念亦酝酿其中。

## 艺术与社会生活（4）

四

自从北伐军进出扬子江以来，中国国民革命的一特征，就是大众的政治运动的炽烈化，然而，观察目前的情状，革命的势力在表面上似呈一种停顿的样子，而事实上，社会的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那么，生息在这窒息的重压之下的青年们受着怎样的影响呢?除了少数有觉悟的人们以外，他们只感着失望，无聊，悲观，厌世!他们晨昏视听着的，不是呶呶的封建残渣的什么智仁勇一类的“告青年”，就是君子啦，小人啦一类的“放屁”话。同时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跳梁，淫荡文学、性欲丛书的跋扈等等埋目障耳地监禁着青年们的视听。

但是，我分担的任务是在艺术的分野上讲话。那么，我们再把中核的命题大书一遍。我们在转换期的中国怎样建设革命艺术的理论呢?我们切实的问题不能不是这样，但是，具体的解答，当让次号李君的论文——《如何建设革命文学?》本文只就中国浑沌的艺术界的现象作全面的批判。

我们都知道，艺术史上的两种对立的争论，就是，艺术的艺术和人生的艺术的主张。这种争论的过程，没有我来说明的必要，但是，他们这种论争的社会的根据在哪里，我们不能不究明，这却也是可能的。

关于第一个见解，我们不妨借G．Plechanow的说明如下：“艺术家及对于艺术的创作有直接兴味的人们，他们底‘艺术的艺术’的倾向发生于他们和周遭社会的环境之间绝望地不调和的上面。”这是中肯的说明，然而，诸君，艺术家诸君，对于艺术有直接兴味的诸君，你们不感觉社会和你们之间，发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调和么，就是说，你们不感着生活的困苦，无聊，绝望么?你们不曾希望过回避了现实的社会投身在麻醉的安慰里么——就是说，你们不曾——或想象——埋头

在象牙的宝塔中，满足你一个人的幸福么?若果你们多少有这样的行为——不论你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这不外证明你们的怠慢与懦弱。何故呢?你们的不幸就是社会的缺陷，然而，你们底幸福不是回避现实的苦痛可以获取的，事实上你们的不幸只有根本的铲除社会的矛盾才可以获得的。

那么，我们把第二的见解批判吧。

在这里我们只把L．Tolstoy的艺术论的阶级的性质指摘出来便可以了事。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天才的大艺术家，又是挂着“世界最可鄙贱的宗教的说教人”的招牌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诸君都知道了。他排斥一切世纪末期的——颓废派、象征派、耽美派的——诸倾向，换上一个欺瞒大众的宗教代言者的艺术。

为何他不对呢?

我们晓得的，人类的思想是受着生活过程底规定和制约的，不论任何思想也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底制限，历史上怎样伟大的思想也不能脱离该当时代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一般人以为托尔斯泰的思想，给人类的将来以光明。其实不然!

## 艺术与社会生活（5）

“托尔斯泰一方面毫无忌惮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榨取，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与行政的喜剧的假面，暴露着国富的增大，文化的结果与贫困的增大，劳动大众的痛苦间的矛盾；他方面很愚蠢地劝人不要以暴力反抗罪恶。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的假面；他方面却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

然而，托尔斯泰的见解的矛盾并非偶然的，它表现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的生活所经验的矛盾。

“拒绝公共的教会，地主，政府，破坏土地所有的一切旧形式，除去阶级的警察的国家，做成自由的小农的共同体等等努力——这是一九○五年革命时代中贯通农民底历史地步的红线的努力。而托尔斯泰的著作的精神内容，在适应农民这个努力，形成抽象的‘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

这是托尔斯泰的思想的阶级的性质。他主张的农民那种独善态度是反动的，同时他自身的思想在社会进步的观点，在历史进行的观点上看来也是反动的。

在这里，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的误谬，大抵可以明白了。然而，托尔斯泰以外还不乏大同小异的见解，他们不是资产者社会的阿谀人，就是DonQuixote一类的人道主义者。

诸君，艺术家诸君，关于艺术有直接兴味的诸君!譬如你们关心到十字街头时，你们去宣传基督教么，宣传三爱主义么，宣传无政府主义么?把这一类的思想注入艺术的内容中，送给民众作鸦片吗？中国已经中了八十年的烟瘾，再不能受这样的麻醉剂了。

五

革命的艺术家是哪是一种类的人物?

我们知道，艺术家在社会上所享受的待遇不是最高的崇拜就是最大的侮辱。一般的人不是这样说：“他(艺术家)是我们的伟大的艺术

家，时代的预言者”，搜尽美丽的辞句，表示他们的景仰；就是这样说：“他是社会的寄生虫，不事生产的流氓”，穷极他们污秽的谩骂犹恐不足。为什么在同一艺术的田地工作的同一样的人，会受相反的舆论呢？我们晓得社会发展的现象是这样的，一社会的新兴就是一社会的没落。在历史的舞台上，有新兴社会出现之时，属于新兴阶级的哲学者与文学家负有批判旧社会制度与旧思想的任务。他们所以伟大的原因就是在他们这革命的任务上。然而，没落的社会也有他们的艺术家，他们的任务除了制造新兴的刺激与颓废的欢乐以外(亦有制造辩护自己阶级的作品的，这可以除外)，再没有可做的事情，这是他们所以受恶评的缘故。我们把十九世纪前后的法兰西的美术——即David等的古典主义运动和贵族阶级的Rococo的流行——比较看来，就明白了。

## 艺术与社会生活（6）

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所以伟大的缘故，并不在发明何种流派，而在他们代表同时代的一种社会的伟大的人格，就是说他们以热烈的革命精神，烙铸表现时代的Ternpo的作品。

六

以上我们大体明白新兴艺术的方向了。若果提出结论来就是这样：艺术是人类意识的发达，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但是，这个见解若没有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作基础，仍不过是一条空文的宪法，抽象的理论。

然而，现在中国文坛的情况，堕落到无聊与沉滞的深渊，虽是革命文学的议论嚣张，而无科学的理论的基础，及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建设，毕竟问题依然作问题存在，总不能给它一个解决。为什么呢?他们把问题拘束在艺术的分野内，不在文艺的根本的性质与川流不息地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分析起来，求他们的解答。

这篇文章，除论序散漫外，主要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作者深感不满。但是，里面多少已把真相暗示出来，细心的读者若有所参证是作者无上的希望。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注：

①冯乃超(1901～1983)，原籍广东南海，生于日本，创造社成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党团书记。

## 死去了的阿Q时代（1）

这一段话，确实是又有些在这里欺人。而且对于革命文学作家的话语也不曾了解得。当然不是有意的。革命文学作家他们何曾主张离开现实呢?他们没有谁个写了一篇《不周山》或其他象征未来的东西，他们在过去所表现的完全是不曾离开现实。超现实当然就是逃避，站在时代前面一语，难道不成就是超现实呢?鲁迅既能看到在运行的地火，何以竟看不到地火般的革命的怒潮在渐渐的爆发呢?表现这些的材料就是超现实吗?这是近视的鲁迅不曾看到现实。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

综以上所说，鲁迅究竟是不是如他自己所期许的呢?鲁迅不但理论错误或缺乏理论，而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鲁迅是革命的么?我们请再问一问鲁迅的迷恋者。真是令人奇怪，现在是怎样的时代，鲁迅都不肯考察一回，你听，他还在叫着：“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这究竟是鲁迅的盲目不是呢?他没有看现在的革命运动的进程。

四、朦胧以后的鲁迅

朦胧以后的鲁迅依旧是朦胧。虽然有了各方面对他忠告，他是不肯接受的。他总要保持着他已有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认错的面孔。我们考察最近几期的《语丝》，他不但不认错，仍旧像中古时代任性而为的一个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武士。

在《铲共大观》里有一句话说：“我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语丝》十八)这就是他所以成为武士的原因。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相信自己是没有错的，只一味的把全力注意到对手方去。所以他怕人疑心，怕人责罚，他永不肯追问人为什么要疑心他，又为什么要责罚他?

自然他是不去考察自己，看看所要发的议论，是不是真的错误。他的精神太外倾了，忽于考察自己。

现在的时代，已不是这样的武士的时代了。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果能接受批评，幡然悔悟，这个时候我们依然相信还不迟。错误的改正不是一种羞辱，任性没落，却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请再看鲁迅以后。我们是诚恳的最后希望他抛弃了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来参加革命文艺的战线，我们对他依旧表示热烈的欢迎。

(1928年5月20日《我们》创刊号)

## 死去了的阿Q时代（2）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中国的阶级地位又突然的起了一大变化，工农阶级的力量逐渐的表现出来，上海的工人对于惨案的奋斗，香港工人的十九个月的大罢工，湘鄂工人的响应革命军运动，上海工人驱逐奉鲁军的三次大暴动，以及前此的京汉路的二七惨案，以及革命军所到的地方的农民对于革命的帮助，以及革命军的以工农为革命的主力军，在在都给予青年以莫大的激刺，使他们对于第二期的思潮发现了不满，彻头彻底的站到工农一方面来向着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抗斗，激起了还没有终止奋斗的激烈的血潮，逃出了国的制度的束缚，思潮转向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的抗斗。所以在这个时候，酝酿了很久的第四阶级文艺运动的呼喊，又渐渐的高涨起来，造成了现在的革命文艺与劳动文艺交流的局面。

以上是把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变概略的叙述了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再回转来一检鲁迅的创作，究竟能代表新文艺运动的那一个时期的思想呢?除去在《狂人日记》里表现了一点对于礼教的怀疑，除去《幸福的家庭》表现了一点青年的活性，除去《孤独者》、《风波》表现了一点时间背景而外，大多数是没有现代的意味!不仅没有时代思想下所产生的小说，抑且没有能代表时代的人物!阿Q，陈士成，四铭，高尔础这一些人物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物呢？曾经读过《呐喊》与《彷徨》的人大概总能说得出来。《在酒楼上》篇里的吕纬甫说：“老年人记性真长久!”(《彷徨》四四页)我们觉得这句话真可以移赠鲁迅，老年人的记性真长久，科举时代的事件，辛亥革命时代的事件，他都能津津不倦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叙述出来，来装点“现代”文坛的局面，这真是难得！不过，“太阳下去时候出现的东西，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野草》三七页)这又变为他的恰切的批评了，他的创作在时代的意义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不过是如天宝宫

女，在追述着当年皇朝的盛事而已；站在时代的观点上，我们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

所以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他的创作的时代背景，时代地位，把他和李伯元、刘铁云并论倒是很相宜的，他的创作的时代决不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确确实实的只能代表《新民丛报》时代的思潮，确确实实的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潮，真能代表五四时代的创作实在不多；这一点，希望读者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说历史小说不能写，我们觉得写历史小说，站在文学负有社会的使命一点说，也是应该有些时代的意味的，而鲁迅，而鲁迅的创作里，大部分却找不到这种精神。

## 死去了的阿Q时代（3）

鲁迅在厦门无论从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惟一生命!然而，鲁迅的著作何如呢?自然，他没有超越时代；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中去了，鲁迅呢？在他创作中所显示的精神，是创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顾及时代，他没有法跟上时代，他创作的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里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一八七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下面写成的。在这样思想底下所写成的创作，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范例所写成的文学创作，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所以，关于鲁迅的创作的时代地位问题，根据《呐喊》、《彷徨》和《野草》说，我们觉得他的思想是走到清末就停滞了；因此，他的创作即能代表时代，他只能代表庚子暴动的前后一直到清末；再换句话说，就是除开他的创作的技巧，以及少数的几篇能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没有表现现代的!

二

鲁迅两部创作集的名称——《呐喊》与《彷徨》——实在说明了他自己。我们把他的这两部创作和《野草》合看的结果，觉得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出路，始终的在呐喊，始终的在彷徨，始终的如一束丛生的野草不能变成一棵乔木!实在的，我们从鲁迅的创作里所能够找到的，只有过去，只有过去，充其量亦不过说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将来的。他所看到的何如呢?在《野草》里也就很明白的说过，所谓将来就是坟墓！因为他感到的前途只有坟墓(《野草》四一页)，所以他觉到“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去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野草》九

三页）于是，他也就把希望扔在坟墓里去了，他不存一点什么希望了，他的意思是说希望也是同样的空虚，还不如没有希望的好，我们可以看他的自白：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野草》)

## 死去了的阿Q时代（4）

他把人生是看得这样的灰暗，他也就觉到人生的太无味道了，然而他并不想死，他还是要“我还得活几天!”(《孤独者》)他总认定“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伤逝》)不过他所以要活，不是为着前途，是要“求生”(《伤逝》)。求生就是他的渴求，然而意义是没有的，意义就是一个单纯的活着。可是活着究竟是痛苦，一面看到前途是黯淡无光，一面又觉得现实不能使自己满足，找不着出路，又不愿堕落，这结果只有狂喊几声，彷徨歧路了。他自己解剖这种心理也很精细：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野草》)

在这一节叙述里，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我们是在在的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横在他面前的虽有很光明的出路，他要有所不乐意，他不愿去，既不甘于现实，在理想中又没有希望，结果只有徘徊歧途，彷徨于无地了!这是鲁迅没有出路的心理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害了他!其实，具有这样习性，而葬送了他们的一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这种人若不把领袖思想英雄思想从他们的脑中赶掉，总归是没有希望的!再进一步说，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

只满口的喊着苦闷，而不去找一条出路，这是鲁迅自己戕杀的灵药，他吃了这样的灵药而不悔。……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反诘我。不错的，鲁迅似乎也有出路，记得在《伤逝》篇里就说过，然而他的出路是什么呢?——“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彷徨》二○六页)这是怎样的一条出路呢?我们想是不需要什么解释的。因为他的出路只是目前的经济的出路，没有顾及其他，是异常的浅薄，终于使他不能满意而灰暗下来；结果这浅薄的希望也就如蜿蜒的长蛇消失在黑暗里了!(二一二页)……不错的，鲁迅也曾觉醒过来，他也因着淡淡的血痕的冲激而兴奋起来，所以他在《淡淡的血痕中》就说：“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 死去了的阿Q时代（5）

(《野草》八八、八九页)然而，这种兴奋只不过是一个浅薄的同情者而已，并没有看到他怎样的屹立人间，怎样的向前抗斗；其实，就是这样的兴奋，在鲁迅的事实上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刹那间的胰子泡而已!他是不会站起来的，这样淡淡的血痕的冲激，是掩不了他的个人主义的精神的，他虽是富有反抗一切破坏一切的思想，但终于是一种滥泼的思想，没有多少益处的，他终结还是彷徨!……再进一步说，他不但没有站将起来，根本上他就没有兴奋，任青年的血是怎样的沸腾，他充其量也不过站在路旁吹一两下唿哨而已!看了《一觉》篇我们就可知道："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灵魂，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野草》九一页)这是怎样的无聊的浅薄的思想?他始终只有一两声呐喊!……总之，鲁迅的思想是只有怀疑，没有出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野草》七四页)

因为他的思想向前走不通，因为他的思想的停滞，他便不能不沉醉于过去的回忆里而写出《呐喊》与《彷徨》，他便不能不把人生变为悲惨的灰暗的阴森的了。因此，他说人生是痛苦的是病态的是不健全的，他用雪人象征整个人生的灰暗，他用《墓碣文》来说明人生的自戕，他又用《颓败线的颤动》来说明人之一生的痛苦，他觉得人生是没有丝毫的光明的。我们可以看下面的引例："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雪》，《野草》二六页)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墓碣文》，《野草》六一页)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颓败线的颤动》，《野草》六五页)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们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所以他说明人生的终结道："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彷徨》二○六页)

## 死去了的阿Q时代（6）

鲁迅这种态度是大错误的，人类即使如“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呐喊》十页)然而终究没有好的希望么?也就没有所谓人生的光明面么?人类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的，人类更不是没有出路；苦闷有来源总归是有出路，光明的大道呈现在自己的眼前；他偏偏的不走上去，只是沿着三面夹道的墙去专显碰壁的精神，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鲁迅对于人生的观察也不过是说明他是一个怀疑现实而没有革命的勇气的人生咒诅者而已，他何曾“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野草》九一页)来!……他又何曾想到彷徨的痛苦，呐喊的无聊，希望的实现，和前途的光明来!他所说的“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呐喊》一一○页)一些话，也终于是一个暂时的兴奋而已!……我们所感到的人生，不像鲁迅所见到的这般灰暗而阴惨!……

三

然而鲁迅究竟有鲁迅的好处，鲁迅究竟有鲁迅的地位，虽然《阿Q正传》不是一篇伟大的创作，确确实实的可以代表鲁迅他自己。《阿Q正传》的技巧的好坏，在这里我们不想说，但是《阿Q正传》里藏着过去了的中国的病态的国民性，这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创作中表现国民性的必要，根据过去的理论，在客观上我们对于《阿Q正传》时代的思潮，是不能否认的。鲁迅能把病态的一部分很扼要的捉住，又很扼要的表现出，这是很难能，而在其他的创作中难以找到的。我们读完《阿Q正传》，至少可以得到两种最深刻的印象，同时从这两种深刻的印象上可以找到过去的中国人的特长是什么东西。所渭两种印象，第一是我们认识了中国人在过去时代的从听天由命的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对人生不加思索莫名其妙的生莫名其妙的死的可怜可

恨的人物；第二就是我们认识了中国人的阴险刻毒势利凭借阶级仗势欺人以及其他类似以上种种的冷酷的性格。这两种绝对相反的性格，确实是中国人的病态性格的最重要的部分，被鲁迅在一个短篇里露骨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客观的说，这一篇创作是可以代表中国人的死去了的病态的国民性的，是鲁迅创作中最可纪念的一篇。

## 死去了的阿Q时代（7）

这一篇的好处不但是代表了病态的国民性，同时还解剖了在辛亥革命初期的农村里一部分人物的思想，我们扩大点说，阿Q的思想也代表了那时都市里一部分民众的思想。我们要分析这时期的农村农民的思想，那是最容易捉到阿Q的生命的。那时候农民当然是才从帝王子民的梦境里醒悟过来；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帝王统治之下，尤其是乡村里的人很少有读书的，即使有读书的也不过是被训练成怎样做一个安分的百姓而已，因此像阿Q这样糊涂的人物当然是多而又多，《阿Q正传》于是就应运而生了!……那时乡村的豪绅阶级横行乡里出入公门欺凌弱者，农民没有觉悟不敢反抗只有隐忍也自是当然的趋势；一旦革命军突然起来，推翻一切的统治阶级，无知的一向饱受豪绅阶级欺凌的农民你叫他怎能不愤愤然而起复仇的念头呢?我们便看阿Q的对于革命党的同情，和他的“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呐喊》一六一页)的念头，也就可以想见农民当时的泄愤的心理了。因泄愤的原因及对革命党是打倒自家的仇人的一种欢喜，阿Q要实行革命，也是当时很普通的现象。于是，《阿Q正传》便应运而成了悲剧的大团圆了。……豪绅知识阶级究竟比一般粗鲁的人的知识高明的多，乘机跑到革命的队伍里去一跃而为投机的革命党，夤缘而继续他的旧势力的命运，也是必然而可能的事。这样，以革命为真革命为真替人民报仇的在初期曾向压迫者泄愤的农民们便不得不成为豪绅贪污式的伪革命党人的牺牲品了，于是乎阿Q死，而《阿Q正传》也就完成了他的时代的记载!

《阿Q正传》虽有这么多的好处，在表现与意义两方面虽值得我们称赞，然而究竟不能说是代表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坛的时代的力作；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所以根据文艺思潮的变迁的形式去看，阿Q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在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

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说到这里，我们是很明白的可以看到现在的农民不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了!

## 死去了的阿Q时代（8）

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放在眼前，我们能不能说阿Q的时代是万古常新呢?我们愿意很坚决的说，《阿Q正传》着实有它的好处，有它本身的地位，然而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我们如果没有忘却时代，我们早就应该把阿Q埋葬起来!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我们是永不需要阿Q时代了!……

不但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我们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规律去看，它当然有不少的相当的好处，有不少的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然而也已死去了，也已死去了!现在的时代不是阴险刻毒的文艺表现者所能抓住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是纤巧俏皮的作家的笔所能表现出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是没有政治思想的作家所能表现出的时代!旧的皮囊不能盛新的酒浆，老了的妇人永不能恢复她青春的美丽，《阿Q正传》的技巧随着阿Q一同死亡了，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着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阿Q正传》的技巧是力不能及了!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我们不必再专事骸骨的迷恋，我们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我们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一九二八年二月于上海附记

《死去了的阿Q时代》总算写定了，不过有几句声明应该补记在这里：就是这一篇评论完全根据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野草》三书而作，一切的论断也依据这三本书而定，所以算不得一篇完善的鲁迅论。我觉得鲁迅的真价的评定，他的论文杂感与翻译比他的创作更重要。他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初期是很有力量，很有地位的，同时他的创作对于新文坛的推进，也有很大的帮忙，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可是本篇单纯的论他的创作，就没有办法涉及其他了，所以关

于他反抗封建势力……一类的杂感里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只有让读者在《坟》、《热风》、《华盖(正续)集》一类的书里去寻求了。(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

*鲁迅对钱杏诸文章的看法请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以及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的信。

注：

①钱杏(1900～1977)，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

## 死去了的鲁迅（1）

钱杏

现在进一步说。阿Q时代固然死亡了，其实，就是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当然的，他所以然不能表现时代的原因，是他根本上没有认识时代，和世界政治思想简直没有接近；这样，他当然是不会有时代表现的题材，只好从自己身上，回忆起过去的事实了。

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他对于革命和革命文艺，态度是异常的不庄严，这很可证明并没有怎样的了解。记得在《小杂感》篇里，有这样的一篇革命理论：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语丝》四卷一期)

我们实在找不出鲁迅的政治思想，这一篇差不多是他仅有的革命论。文学在过去的形式上，似乎与政治不发生关系，所以文艺作家与政治思想常常的隔绝，这一点完全是忽略文学时代性的结果。文艺思潮跟随着政治经济以及一切的社会关系而变动，闭了眼不看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形的作家，焉有能表现之理?所以鲁迅结果只能写出这样单弱的政治见解来了。不但如此，他根本上就忽略了文学的成因，我们知道某一种环境产生的结果，可以完成某一种环境里的文学，某一种文学因实际环境的启示而产生实际环境，在后来又被这样的文学加以推动，互为关系，这是一种当然的事实，所以鲁迅又大发感慨，讥讽革命文艺运动产生时期的不当：

“文学家。于是什么革命文学，民众文学，同情文学，飞腾文学都出来了，伟大光明的名称的期刊也出来了，来指导青年的：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紧——第三先驱。”(《语丝》四卷七期)

他对于文学的阶级论完全抱一种模糊的否认的态度，对革命是谈不上什么认识，革命文学在他看来，仿佛是一种幼稚病，在《“醉眼”中的朦胧》里他就叫道：“……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拼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语丝》四卷十一号)这所谓不止一年的刊物，当然指的是正在转换方向的《创造月刊》。从这语意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实在是富于保守性的，不然，为什么一年以上的刊物就不能转变方向，必须维持以前的态度呢?这可以说，鲁迅是主张文艺守节论的。无聊的思想，刻毒的谩骂，此外，我们在鲁迅的著作里，究竟还能找到些什么?似乎还有一点，那就是鲁迅作文时固然忘却政治，看其他作家的文章时，却并没有忘却，甚至努力的有意的硬把他们推到政治上去，想借着他自己所谓指挥刀，来泄泄他的愤。所以他在《“醉眼”中的朦胧》里说道:

## 死去了的鲁迅（2）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词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语丝》四卷十一期)

这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的手术，大概是不需要什么解释的吧?在这种种的实际情形之下，我们不仅认定阿Q时代的死去，鲁迅是不是一个时代的表现者，是不是他自己也已死去，也是迎刃而解的问题。他的思想与技巧，是早已同样的完了，完结了。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想道：鲁迅的小说虽不曾表现时代思想，杂感等确实很能表现。及至找来一读，这个迷梦是更进一步的根本上被摧毁了!没有政治思想!没有政治思想!有的不过是残败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军阀，官僚的片断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的。

也许有人要怀疑，说鲁迅的被人崇拜，由来已久，为什么在他们的笔下竟一钱不值呢?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明，鲁迅确实有他的好处的，在五四运动的初期，他实在是尽了不少的力量的，新文艺的推进他也是很重要的人，不过他的贡献只是小说的技巧，而不是作品的思想，重要的是他的翻译而不是创作，可是创作也有相当的力量，因为那个时候，鲁迅委实是鲁殿灵光。就形式上看，从他的技巧方面去概略的观察，他实在是中国小说创制的初期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实在是

初期的一个大作家。不过，放到现在来说，啊，这就看他有没有死灰复燃的希望了!……

鲁迅能在中国成名，这是很容易料到的事，因为他的创作实在太合中国读者的胃口了。他的作品太会利用国民性的弱点了。至于翻译成几国文字的宣传，三千弟子的传教，大学教授的地位……都是不无关系的。我们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的供状，从大家尊崇鲁迅直到如今的一点上可以看到。尤其是第一点，一篇小说，被译成几国文字，便似乎成为了不得的东西了，其实未必尽然，也许只是拿去证明拖辫子的中国人的更无聊的，也是仿佛与南方人上天津馆，只是换一换口味，并没有别的。

总之，我们对于鲁迅的怀疑，完全是事实分析的结果。十年来，鲁迅在中国实在具有无上的尊严，从不曾看见有谁怀疑过他来，这一篇文或许要引起许多的讨论和研究，然而这是应该的，只希望是据理的批驳。附带说一句，他的《呐喊》、《彷徨》两集收的小说很多就是随笔，读者是应该分别研究的；《孤独者》一篇反是我们最欢喜读的一篇小说。

鲁迅先生，现在是醒来的时候了，朦胧的醉眼也到了睁开的时候了，要就死亡，要就新生，横在你面前的是这两条路。你自己在《呐喊》的序言里说过："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九页）你就不为自己设想，也得为崇拜你的青年们设想。你纵不能引着他们勇猛的向前，至少你也不能阻止他们的去路。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老人家究竟没有多少年代了，再不能有什么徘徊，还是为着青年，为着自己的新生再振作一次罢。保守不是英荣，是一件可耻的，可耻的事件呵!……鲁迅先生，你就不为自己设想，我们也希望你为后进青年们留一条生路！

(钱杏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

## 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1）

冯乃超

左联创办刊物《语丝》鲁迅在《语丝》第十一期，依然卖弄他的老生腔调，唱起《“醉眼”中的朦胧》，下面我去究明他究竟朦胧到那一个田地。

一、看吧，胁迫于幻影的病人的精神错乱!

他说：“……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之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这里留着一点朦胧。”

我们晓得这位老先生是孤高耿介，不去“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也不去“恭维现在的主子”，也不“害怕铁锤和镰刀”的。所以这位老先生才能超越时代的舞台，悠然自适地投人世以辛辣的嘲弄。世有史迁的健笔，谁不乐为之作一篇高士传赞?

然而，事实是可能的么?

在二十世纪的南京路头当中，鲁迅先生营其鲁滨孙的漂流生活。虽有天方夜谭的史希竿拉才得的辩舌，也不能完补这荒谬的无稽。那么，鲁迅先生的孤高耿介也不过外表的淡装，终竟摆不脱社会的关系。事实上，他是“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的病人。不然，他不会切齿地骂人“害怕”，骂人“恭维”的!哦，鲁迅，何苦来由，胁迫于自己做出来的观念，终至缩入绍兴酒瓮中，“依旧讲趣味”去呢?

听说——上古，太古，有取木乃衣的人，变了木乃衣。

鲁迅、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与英国作家萧伯纳等人合影二、醉眼中的朦胧；毕竟是朦胧的醉眼!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不过“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

锣鼓喧嚣的一出朦胧的腔调，却说“其实朦胧不关怎样紧要”。这不是泰山鸣动，死鼠一只么?原来老生的苦心在埋怨人家“连人道主义的抗争也没有”。哦，原来如此，不过“这里也就留下着一点朦胧”。

可怜，鲁迅的伟大的醉眼连“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这一出人道主义者的把戏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抗争，也不能理解，却说“剥去和抗争，也不过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

在这里才有看现象而不把握本质，看树木而不见森林的观念论者的理论之错乱，无怪他终竟不能理解我们的使命在何方，徒以“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一句话，来抹杀一切革命理论的工作。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革命的行动，便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理解这理论与实践底辩证法的统一，怎能免得乱吠“咬文嚼字”，“直接行动”呢?我们发见了醉眼之上，他又带错了度数太浅的眼镜，所以弄得映在网膜上的影像斑驳地朦胧。

然而“直接行动”，“直接行动”，在人道主义者们，总可以学那坏了机器的木傀儡“毫无顾忌地”舞弄着他们的锈钝的青龙刀，不过，我们被称作朦胧的就“朦胧”也不要紧。

## 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2）

他的眼睛是这样的靠不住，所以，他卒之不能理解在意德沃罗基(Ideologie)的分野，廓清荼毒的旧思想的存在，破坏麻醉的反动思想的支配，建设革命理论的工作，也不失为一种革命的行为，又是合理的活动。

如此，介绍过拜金艺术的他，虽有误解“文化批判已经拖着U．Sinclair……”的聪明，却不能理解我们所以介绍的真意所在，何况更进一步来理解我们所谓武器的艺术!怪不得这边也是朦胧，那边也是朦胧。

然而，醉眼中的朦胧，毕竟是朦胧的醉眼!

三、看吧，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

我们在这里晒出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真容来，不算蛇足吧。

我们晓得鲁迅从来是很（！）富于菩萨心肠的。他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鲁迅的第一人称，所属格——乃超注)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哦，多么崇高的决心呢!后来“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观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但是饿死多少又如何?——乃超)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黑点是我点的——乃超)

这个大悟的转机，没有三千年面壁的工夫，怎有这样的透彻!

不过在当时，我们这位武勇的骑士“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他只得孤清清地一个人在“毫无边际的荒原”中，干他的武士修行的勾当去。

我们对于这位苦于“如大毒蛇”的“寂寞”的“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之“灵魂”，——虽然已经太迟了——合该表示十二分的敬礼。

闲话休题，回到彻底的(?)人道主义上去。

“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这句话与“人类不为面包而生存，为精神而生存”一并读来，多少可以发见一线真理的微光吧。——乃超注)

然而，看吧，中国的救世主济渡了多少善男信女呢?你看，横倚柔软的沙发上的马丹用她的纤纤玉手爱抚着《呐喊》这本圣经，就可以明白个中消息了。

“改变他们(?)的精神”。现在他究竟改变了谁的精神，愚弱的国民的么，讲趣味的有闲阶级的么?上帝哟，微笑吧!

开端要“救治像我(鲁迅的)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其次要“改变他门的精神”，终局他“依旧讲趣味”。

看吧，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就是这个样子!

一九二八年三月廿五日

(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四号)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1）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

李初梨①

中国革命的顶重要的特点，除了它内在的特殊性而外，是在它抬头于国际资本主义急激地没落的今日；它的目的，不特是社会的一部分的改良，而是全社会构成的变革。

所以，中国的革命，应当而且必然地，由政治经济的斗争，扩大到意识的斗争。现实地，这种斗争已经开始了。

这种斗争的开始，在长夜漫漫，昏迷在有产者梦寝中的中国文坛里面，的确是一个霹雳的“突变”。

这一个“突变”，遂使得许多人仓惶混乱，狼狈战栗，虚构曲解，嘲骂中伤。

因此上，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一、鲁迅的社会认识的盲目

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因为它内包的要素底复杂，所以它反映到意识方面来的，只是一个混合型的革命文学。

然而经过国内布尔乔亚汜及小有产者知识阶级相继叛变底两个阶段以后，即中国普罗列塔利亚特的Hegemonie确在了的今日，革命文学当然被奥伏赫变(不是鲁迅的“除掉”)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上的方向转换。

然而这一个方向转换，决不能实行于前年或去年上期，这必然地应该实现于去年的年底或今年的转正。

因为在去年的八九月间，革命才入了它第三的阶段，在十冬月间，普罗列塔利亚特才把它的政治的方向转换完结。

这正是我们的Don鲁迅在他那《“醉眼”中的朦胧》开口第—句所说的“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转正一过”，“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的“期刊便纷纷而出了”的缘故。

然而因为我们的Don鲁迅，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的缘故，所以这种现象，在他看起来，却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突变”!

可是，这一个“突变”的晴天霹雳，倒“非同小可”，却把我们“远识的”，“小心的”，“怕事的”鲁迅的脑筋，震动得“朦胧”起来。

所以他一篇《“醉眼”中的朦胧》，结局是一片神经错乱者的“呐喊”。

你看他狂吠着“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2）

他这种”突变”的说明，据我看来，恐怕不只是“无聊”，还怕有些“无知”。

正因为他这“无聊”而且”无知”的缘故，所以他说：“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

这是一点不迟的!Don鲁迅!

他又说：

“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锐利化，……”

这又岂独是社会认识的盲目，明明是在故意的歪曲事实。

二、一篇“朦胧”论，结局是一篇的“朦胧”

因为鲁迅对社会认识的盲目，所以就发生了他那堂堂的一篇“朦胧”论。

他说：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也还是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有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他这‘朦胧’，简直像夏天苍蝇所带来的病菌一样，到处‘留着’——梨）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

你这一篇“朦胧”论，是说人家立场的“朦胧”呢，还是理论的“朦胧”？或者是见着别人的造语的多样性，你就硬给他“留着一点朦胧”？

立场与理念的“朦胧”这是不能容许的，然而用语的伸缩，是革命家应有的策略。

假若只能见着人家一个有伸缩性的用语，就“朦胧”地“呐喊”着“朦胧”起来，这只有对于革命运动是白痴的人，才能如此。

譬如你在你那《“醉眼”中的朦胧》的末后，张皇四顾地“呐喊”着：

“‘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我们的Don鲁迅，能够说得出这样一句漂亮的话，我们只有为他拍手喝彩，他不会说他是“朦胧”。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3）

然而若是照着他的笔法（这或许是“岂明老人”所谓“师爷派”的笔法），这就未免有些“朦胧”，而且这“朦胧的发祥地”，正是“梦中又害怕些什么什么，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要“豫致‘革命的敬礼’”。

不过鲁迅又说：“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

一篇“朦胧”论，结局是一篇的“朦胧”。

三、同风车格斗的DonQuixote——何谓武器的艺术马克思在那黑格尔(Hegel)《法律哲学批判》里说：

“不把普罗列塔利亚奥伏赫变，哲学绝不能实现，没有哲学的实现，普罗列塔利亚自身也不能奥伏赫变。”

这儿所谓“哲学的实现”，是指能够实现的哲学——即辩证法的唯物论。

所以，普罗列塔利亚要解放他自身，非把他的哲学实现不可。

然而普罗列塔利亚要实现他的哲学，尤须首先把他自己从一切有产者意识的支配中解放。

不过，这普罗列塔利亚从一切有产者意识的解放过程，即同时是普罗列塔利亚解放过程中的激烈的意识争斗。而意识争斗的过程，正是普罗列塔利亚哲学的实现过程，——换言之，即普罗列塔利亚的现实的解放过程——之一部分。

这就是意识争斗的重要性及其实践性。

而且在有产者意识事物化的现在，一切有产者的观念形态，事实上已成了社会发展的障阻物，如果我们要企图全社会构成的变革，这些障阻物，是须得粉碎的。

然而因为鲁迅不能认识这种意识争斗的重要性及其实践性的缘故，所以他说：

“‘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

可是呀，“这回可不能只是”直接行动“便算完事了”。

所以，要粉碎这些障阻物的有产者观念形态，当然要是一个能够粉碎它的武器才可以。即以文艺方面而论，无产者文艺，不得仅是一个观照的东西，应该是一种有破坏力的物力。因此我主张“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所谓“艺术的武器”，当然是指前一种观照的东西，即以你这新伟大醉眼中的“朦胧”而论，这虽然不能说是“艺术”，也可以说是你骂人的“武器”。但是因为你的骂法，是基于你自己头脑的昏乱，或事实的虚构曲解，毫无现实的意义，所以，这只得是一场“王婆骂街”的乱骂，不得成为“武器的艺术”。

但总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生拉活扯地，我们的Don鲁迅，硬把“武器的艺术”与“武器的批判”，作为一样的东西。

这或许是从前师爷们过考试做八股的搭题，把“子曰学”拉到“孟子见”，这样地拉惯了的缘故。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4）

又或许是“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我们的Don鲁迅，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某刊物上有了一句“××是一种艺术”的话，而且这句话又“不知怎样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DonQuixote的“记忆中枢”，从此一架风车，就变成了一个巨人（giant)，“武器的艺术”也就变成Don鲁迅的醉眼朦胧中的敌人了。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同风车格斗的DonQuixote的狂态罢。

我们的DonQuixote鲁迅说：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不错——梨）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这是你醉眼朦胧中的风车呀！——梨）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了。”

他举起锈烂了的青龙刀，照着风车就是一下，好不利害!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正是扬鞭大叫，来将报名。可惜风车不会答话。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游说。（正是——梨）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这问题（这问题结局是头脑混乱的问题。——梨）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可疑的只是一架风车，是不是一个巨人?——梨)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你看他喘气吁吁，大汗淋漓地，这边一钉，那边一打，这是多么勇敢哟!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这只有不认识意识争斗的重要性及实践性的盲人，才说得出这样的瞎语。——梨)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

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勇敢勇敢!——梨)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这是谁放的屁?——梨)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是‘坐在黑房里，续钞《小说旧闻钞》’的人，才是这样。——梨)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

这真是乌天黑地，飞沙走石的一场大混战。不过你身旁的山差(DonQuixote的仆人——梨)应该向你说：

Don鲁迅呀!这不是一个巨人，是一架风车!

四、我们这勇敢的骑士原来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5）

在上面“雄纠纠，对大家显”了一场“英雄”的我们的勇敢的骑士，在这儿他却又长吁短叹，珠泪两行地呜咽起来：

“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

你看他时而“觉得危险”，时而“才有些放心”，时而又“可虑”。他还有什么“因为恐怖”跑过去了。又“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

怪可怜的，他恐怖得成这个样子！假若这恐怖病再深沉起来，一朝一日，他身上有了什么好歹，这真是千不是万不是，是成仿吾李初梨的不是了。你成仿吾李初梨哟，“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改悔”，你们以后切不可提及“有闲”或“阶级”两个字了。

不过我应该在此地声明，而且请鲁迅放心，我丝毫没有要清查鲁迅的阶级的意思。我向甘人君问鲁迅的阶级，只是为指摘他（甘人）论理的不一贯——他论理过程中的Cunning；至于鲁迅的阶级如何，当然有他的作品替他声明，无须我来盘问。甘人君的原文如下：

“无奈文艺须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一有使命，便是假的，以第一第二阶级的人，写第四阶级的文学，与住在疮痍满目的中国社会里，制作唯美派的诗歌，描写浪漫的生活一样的虚伪。鲁迅从来不说他要革命，也不要写无产阶级的文学，也不对人家写，然而他曾诚实地发表

过我们人民的苦痛，为他们呼冤，他的是泪里面有着血的文学，所以是我们时代的作者。”

他在前面说得有条有理，“以第一第二阶级的人，写第四阶级的文学”，是“虚伪”的；这在他，对于文学与作者，似乎已有了明白的阶级的区别。然而他一提到鲁迅的大名，“阶级”这两个字，就烟消云散，“逃之夭夭”了；结局只笼统地以一个“时代”了之。这是他论理上的Cunning。在甘人君，鲁迅的“文学”当然不是“虚伪”的“文学”，然而依甘人君的说法，不“虚伪”的“文学”只有是某一阶级的人所写的自己阶级的“文学”，那么，鲁迅的阶级就成为问题。所以“我要问甘人君，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我们的时代’，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我的本意，只不过为提醒甘人君的论理的健忘，并不是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

关于这一点，《战线》第一期上有一段弱水君的文章，他说：

“他(李初梨)向甘人君问鲁迅的阶级，大是辞费。鲁迅到底是怎样，我们只要从他近来作品中去批评，我们只能先研究作品的价值用以详断作者的地位，我们不能先定了作者的地位再来评判‘作品的价值’。”

这完全是弱水君的误解。

##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6）

好，话已说明，从此鲁迅可以“放心”无需“恐怖”，也不必“可虑”“仍然要问阶级”了。

可是我们诊断鲁迅害了这恐怖病的原因，(鲁迅自己就是一个医生，本来自己可以诊断自己的病源，不过现在头脑有些“朦胧”不中用了）倒不仅是李初梨问了一句阶级。据我们看来，一方面是他在“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一方面又要想“照旧讲趣味”，“续钞《小说旧闻钞》”。正是：

“一个胸儿，两心居住。”

这是多么深刻的浮士德的烦闷哟!

“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

五、鲁迅在阶级对立间所演的脚色

鲁迅说：“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的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

这样崇高而又可怜的心愿，的确可以博得天下许多善男信女的一掬同情之泪，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看过了他社会的根据及其实践的要求。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这阶级对立间，取了一个中立(?)的态度，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但他所“喜欢”的，无论是谁，是动也不许动的。

这种人谓之曰小有产者，这种要求，谓之曰小有产者的要求。

但是在阶级对立间，会有一个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中立”么?我们再看鲁迅的下落，就可以明了。因为：他有如上的要求，所以必然地主张：

“‘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这艺术的武器(应作武器的艺术——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

他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拒抗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意识争斗，他方面，消极地，固执着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维持，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

而且他把成仿吾的“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家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句话，巧妙地造成一个煽动的句子说：

“成仿吾……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

这与反动音流说着普罗列塔利亚的前卫，牺牲“大众”利用“大众”来作他们争权夺利的“材料”，如出一辙!

所以，鲁迅，

对于布鲁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

对于普罗列塔利亚特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

四月十日

(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四号)

注：

①李初梨，四川江津人，文艺评论家，后期创造社成员。

## “除掉”鲁迅的“除掉”!（1）

彭康①

左联创办刊物《语丝》大凡在一个“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尤其是在“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的时代，为物质的生产关系所规定的两个阶级对立着斗争起来，是当然的事，自然“除掉”不了；可是心理“原有两个灵魂”，“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小资产阶级及Intelligentia，在这时候，便不免有点麻烦，感着迷惑。

有勇气的，能够真正地认识社会的，便能决定他们进行的方向，决然地参加“十分锐利化”了的阶级的种种方面的斗争；卑怯的，懦弱的，便“漂浮”，“彷徨”，然而又没有“敢于明言”的勇气，于是只好装作“醉眼”，在他底醉眼中，一切便都“朦胧”起来。

这“朦胧”有两方面，一是对于理论的没理解，一是对于事实的盲目。这没理解与盲目更使得他们“拚命的挣扎”，乱冲乱撞，对于人家的批判，不能做正正堂堂的理论斗争，只在那里“咬文嚼字”，胡闹乱骂，“将内容压杀”，而把自己底无知“朦胧”下去。

我们的文艺家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便是这种“朦胧”的“咬文嚼字”的典型。

他所带的关于别的方面的“朦胧”的面幕，会有别的人把它“除掉”，我们且看他对于“Aufheben”的意义是怎样地理解着罢。

他说“奥伏赫变”是“‘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自然，这是我们的音译，因为我们在中国文字里找不出可以包括Aufheben底复杂的全部意义的语句。“抑扬”，“弃扬”，“止扬”，我们觉得不妥；麦克昂君译的“蜕变”，也以为不能表示全部的积极的意义，于是采用音译的办法，写为“奥伏赫变”。这本是平平常常的事，并没有什么“不解”。

不过鲁迅到底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很知道在种种压迫之下剥夺了生存权的第四（？）阶级当然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不但“奥伏赫变”这四个字，就是顶平常的字恐怕也难得“照描”，于是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对于我们的音译也就“不解”起来。他接着说：“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在这里，我们应该替第四阶级感谢他底“人道主义式的”老婆心!

可是这儿有个问题，既然感谢他底老婆心，则应“除掉”“奥伏赫变”，采用他所译的“除掉”了?不!Aufheben决不只是“除掉”，Aufheben就是“奥伏赫变”。感谢自感谢，他的“除掉”却须得“除掉”!

## “除掉”鲁迅的“除掉”!（2）

Aufheben这个字，在普通的字典里，本有举高、贮藏、废止等等的意思，但在一个地方却只用一个意思。这是平常德国文字里所通用的。

可是黑格尔(Hegel)开始用在哲学里的时候，它底意义便复杂起来了。黑格尔的哲学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他把世界看为变动的，会生成的(Werden)。而世界的运动又取辩证法的方式，即所谓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肯定的过程，这种过程，黑格尔用Aufheben这个字来表示，因为Aufheben原有否定、保存、提高的意义。所以这里的Aufheben包含了这三种全部的意思，不只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这种意思，我们在本志创刊号《新辞源》第四项下已有简单而明了的说明。在那里明明白白地写着：

“……它本是黑格尔哲学的特有的用语，用以表示辩证法的进程的。就是一个思考必然地包含与它相矛盾的思考，对于这二个相反的矛盾的思考，丢弃了矛盾的不合理的部分，表扬它的合理的部分，形成一个较高级的综合的思考，这个丢弃，蓄积及表扬的过程，就叫做奥伏赫变。……”

看了这个，当然能够了解我们何以不意译而取音译的办法的缘故。

可是在鲁迅的“醉眼”中，这些黑字只“朦胧”地“跑过去了”，或者是因为不合大文艺家的“趣味”，不屑看，也就没有看，于是偏偏便“不解”了。

“不解”也就罢了，然而又好像很解的似的，自信地将奥伏赫变解为“除掉”，那知这“除掉”二字正包含着他底一切的“朦胧”，连自家的“没理解”也“朦胧”不了。朦胧不了，就须得“除掉”，可是因为“除掉”，小资产阶级根性便不能奥伏赫变。

要将它奥伏赫变，在意识上还是要理解“奥伏赫变”。

“奥伏伙赫变”之不能译为“除掉”，只要对于黑格尔哲学有理解的人就应该知道。若是战取了唯物的辩证法及获得了阶级意识的更能明白它底意义及重要性。

唯物的辩证法是将黑格尔底唯心的辩证法倒过来的。世界事物取辩证法的过程运动，黑格尔以为是绝对精神底显现，绝对精神底变化过的是辩证法的，这是所谓唯心的辩证法。

但是在唯物的辩证法，存在底法则同时也是思维底法则，思维要受存在底规定。所以我们在《新辞源》“奥伏赫变”项下接着又说：

“不过在辩证法的唯物论上，所谓思考，当然不是绝对精神的发现。这是事物自身的必然的发展，由此发展，反映到人的头脑，才形成种种的思考。所以思考发生与它自己相矛盾的思考时，就是物质自身的发展的发现，有了这个物质自身的矛盾发现，才发展两者的斗争而反映于人的思考上，使人们有不得不奥伏赫变二者间的矛盾而形成一个较高级的综合思考了。”

## “除掉”鲁迅的“除掉”!（3）

这是说，思维底发展不能离开存在底发展而独立，而存在底发展又取辩证法的方式。即一切存在有发生的理由，同时必然地，内在地包含了矛盾使得它消灭，而与它相反的形态出现。

这种根本原理及方法运用到社会及历史的研究，才能真正地了解社会是怎样地构成与怎样地变革。这种理论便是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底基础是物质的生产力，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在这个生产关系上，产出了种种的制度及意德沃罗基。

生产力发达到与生产关系矛盾，社会底下部构造便起动摇，这种动摇反映到人底意识里，意德沃罗基也起动摇，于是对于社会的全部的批判，必然地发生出来。这种批判一方面奥伏赫变旧的意德沃罗基，一方面同时确立新兴阶级的革命理论。这种工作做到了，即是旧社会起了部分的崩坏。意德沃罗基上的工作之实践的意义就在这里。

不过这儿有不能忽略的两点：

一切事物会运动，运动要有矛盾，这矛盾是它内在地包含着的，所以一切变动是矛盾的必然的发展，这是社会变革的必然性。

可是这种必然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一定要为革命的阶级所意识而加以变革的行为，社会才会现实地变革。只有一定的物质的条件存在发展，而没有实践的行为，变革是不可能的。这儿需要一种意识的努力。

这必然性与意识的努力，是社会变革的现实的过程，也是奥伏赫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旧社会因为包含了矛盾，必然地会崩坏，在这崩坏了的旧社会的废墟与要素上，筑起新的社会形态。而这些废墟与要素中，一部分还没有完全被克服的遗物残留在新社会，一部分在旧社会里只不过是萌芽的，现在则得着充分的发展而具现。

这种过程在意德沃罗基的战野上也是一样。因为意德沃罗基是现实的社会底反映。

以上本是极简单的叙述，而我们的文艺家鲁迅竟没有理解，以“除掉”二字将“奥伏赫变”底重要的意义“除掉”了。

但是“除掉”了以后，还留着一个对于理论的无知没有“除掉”。无产阶级是最后的阶级，而鲁迅却叫为第“四”阶级!或者“他知道很清楚”，“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那时候，一定有第“五”阶级会出来把第“四”阶级“除掉”。你看他是多么一个“有远识的人”!

## “除掉”鲁迅的“除掉”!（4）

阶级的对立基于生产手段的所有即生产关系。可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之最后的敌对的形态。所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最后的阶级的对立。因而无产阶级负有废除阶级及构成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历史的使命。历史的使命是必然的，历史的进展会导致最后的胜利。

无产阶级要完成它底使命，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从社会底上部构造与下部构造双方进攻。在意识上，需要关于社会的全部的批判。意德沃罗基的战野因之重要而且必须锐利而巩固。旧社会的意德沃罗基的崩坏，即是旧社会的部分的崩坏。因为批判原是一种武器。

文艺也是意德沃罗基的一部门，要尽它应尽的义务，它应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因而应是武器的艺术。

构成意德沃罗基的战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现在的中国，客观的条件已成熟，一般革命的民众也在急迫地要求。在这样的客观的情状之下，这种运动必然地会产生，革命的知识阶级也必然地会努力。

然而在鲁迅的“醉眼”中，这种运动的出现骇为“突变”，人家的努力骂为“拼命的挣扎”。要对于这种“拼命的挣扎”，他自家也就拼命的挣扎。可是他的拼命的挣扎，我们毫不觉得是“突变”，因为这是他想“朦胧”他底无知与盲目的必然的结果。只要看他说“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以“中国以外”四字将中国“除掉”，便知道。

但是他在除外了的中国怎样做呢？他自己已明言过，“照旧讲趣味”！可是一讲趣味，当然“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了，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儿有个必然的经过。

他知道现在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当然“害怕”，而他“朦胧”地又看得有“铁锤和镰刀”的影子，也有点“害怕”，于是左难右难起

来。所以他虽然接连“三个冷静”地“呐喊”过几声，然而这种“呐喊”只不过是“咬文嚼字”，毫无实践的意义，更非“直接行动”。不讨好，而且白费气力，所以坐在“华盖”之下，也感着“热风”，发起热来。于是愈加“朦胧”，便不得不“彷徨”。“彷徨”，便“批判自己”，批判的结果，决意将人道主义式的抗争“除掉”，还是不如讲“趣味”好。

## “除掉”鲁迅的“除掉”!（5）

讲“趣味”，便不至于与“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冲突，还可向他们“表示和气”，而且用趣味的幌子将已经十分锐利化了的阶级的对立在中国朦胧下去，那“现在的主子”更会“笑迷迷”。真是安全不过！所以还是“照旧讲趣味！”“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了。

讲趣味，要有个去向，也要有个讲法。好在他也明言过，我们不必过虑。就是“坐在黑房里”，续钞他的《小说旧闻钞》。

可是这儿“有点不小问题”：

为什么不跟着他的弟弟坐在十字街头的象牙塔里呢?

这或者是工程师的设计不完全，自己倒塌了，也许是听到了黄包车夫骂他阻碍交通，亲自拆毁了。总之，在现在交通频繁的十字街头，是不许有象牙之塔了，于是钞《小说旧闻钞》也只好“坐在黑房里”。

但在黑房里，已不仅是“朦胧”的“醉眼”了，“朦胧”变了黑暗，“醉眼”成为瞎眼。如果坐着不动，或者将生命“除掉”，那也就此了事。然鲁迅要钞他的《小说旧闻钞》，便非走动不可，瞎眼子在黑房里走动，“碰壁”是当然的事；碰着壁所发出的声音，他或许以为这又是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了，然而在我们，这还“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

瞎眼坐在黑房里要发出悲哀来，是悲惨的事，然而这是必然的结果，恐怕“除掉”不了，而且是他自家不情愿“将自己从没落救出”，我们自然无可如何，更只好是满不在乎了。

然而他的“除掉”却须得“除掉”!

(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四号)

注：

①彭康(1901—1968)，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文学评论家。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1）

钱杏

自从在《太阳》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以后，曾经写过一篇《死去了的鲁迅》，收在我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里，那篇是对鲁迅《“醉眼”中的朦胧》的答辩。这是第三篇，是对于《语丝》十六至十八三期里鲁迅的通信与杂感的考察，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他是怎样的在显现着原形。实在的，我们对鲁迅是真个要绝望了，他不仅朦胧，而且糊涂。

一、鲁迅的个性的一考察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鲁迅最近所发表的杂感等等，来把他的个性先考察一回。我们还是从《“醉眼”中的朦胧》说起。在那篇文章的末段，有这样的几句话：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欢喜。”

这虽是很简短的几句话，但他的个性已全部的暴露了。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或许有人以为我们的话是不对的，觉得鲁迅的这一种不屈不挠坚持到底铁一般的坚硬的态度的表白，正足以证明他的反抗精神与革命心理。果真有这样的观察者，那么也可以看出这样的读者也还没有认清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一种革命，和所谓真正的革命党人应该有那些特质。“因为我欢喜”，所以我要反抗：这不是革命党人的态度，这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者的丑态。“因为我欢喜”，所以我要写—篇《在钟楼上》咒诅国民政府，这只是他自己说的“高兴”和“玩玩”而已。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他的反抗，只是为他个人的反抗。虽然有时也为着别人说几句话，我们若果细细的考察起来，究竟是抛不

开“我”的成分的。他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是倔强。这可以看引文，他只要有饭吃，他是不怕什么的，还可以谈谈几国的文学，续钞《小说旧闻钞》，“因为我欢喜”。他的心目中，何曾有群众，除去了“趣味”与“幽默”而外，他又何曾看到什么是文艺的使命？一个个人主义的享乐者。革命的态度是这样的么？革命党人的个性能这样的倔强么?我们觉得从事实际工作鲁迅

的革命党人和革命文学作家的特性是没有分别的。鲁迅只是任性，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虽然他并不反对劳动阶级的革命。根据目前的政治状况看将起来，他不是革命的。这样的“毒笔的文人”(《语丝》十七页五)，“也糊涂到而今”(借用《语丝》十六冬芬的话)，真是“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语丝》十八页三八)。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2）

讲到出路，鲁迅是又要笑的。“哈哈，出路，中状元么?”(《语丝》十七页五)原来在鲁迅的眼光里，人们是不必要什么出路的，要出路的人，不过是想升官发财中状元而已。出路的诠解，在鲁迅认为是如此或不必要。人类是不必要出路，只要不满意于现实就是革命，因此除去停滞不动的而外，只要会“呐喊”“彷徨”的人，都是先驱：至少鲁迅是这样相信。不然，他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在那里呢?我们所见到的鲁迅，只有“呐喊”式的革命。只有“彷徨”式的革命。

在《语丝》十七期上，鲁迅的通信里依然表示着这样的态度。他似乎不是不清楚，也不是不明白，他只是忘不了他自己的阶级背景与阶级特性。所谓“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也颇有些高兴(五二页)的话，真是他的自画像，使我们得以揣测到他的一身的骨骼。可是，鲁迅虽然颇有些“高兴”，“好笑”，终于免不了跳到半天云里去，他是“又好气!”这真是一幅写生。接着他便有这一段话：

“随便弄一点糊口之计，不过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没落’，有能改革之处，还是随时可以顺手改革的，无论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这也并非因为你的警告，实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即使偶然涉及什么，那是文学上的疏忽，若论‘动机’或‘良心’，却也许并不这样的。”

不但可以看出鲁迅的性格，也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的在玩味人生。比他是陶渊明吧，不像；李太白，也不像；或者这是郑板桥的人生也未可知。总之，他的志趣并不大，只是“随便”与“顺手”，“歇歇”与“玩玩”，于是他怎能不钞《小说旧闻钞》呢?便是这样，他还能郑重声明一句：“并非因为你的警告，实在是原有此意的了。”这是表明他没有错误的，即使以你的话为然，也是“原有此意”，而况他在形式上不能承认你的话为然呢?他是不曾“疏忽”的，逼着他明知故昧，不得不继续错误的，就是这所表现的——他的倔强的要面子不愿公开认错的小资

产阶级的性格。读这一段，使我们悠然神往，若学着鲁迅的调子，那就是：“呜呼!郑板桥氏之家书。”

鲁迅在同一期上又答复张“孟闻先生”说：“我们这‘不革命’的语丝，在北京是站脚不住了，但在上海，我想，大约总还可以印几本，将来稿登载出来吧。”(四○一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是怎样的注意外象，而不考察本身。照他所说，今日之鲁迅，实在是可怜的紧，然而，究竟该谁个负责任?“没落”本是落伍者的惟一出路。不考察自己的错误而加以改正，只根据“唯我史观”，说“反我者就是反革命”，这样的人不“没落”又何待?果真是谁个欺骗了他，逼得他公开的来撒娇么?这样误别人是没有关系的，鲁迅是应该对鲁迅自己负责任。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3）

鲁迅的个性大致如上所说。他是忘不了阶级背景及其特性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者。他倔强，知错而不认错。他的人生也是“唯我史观”，自己永没有错误，“反我者就是反革命”，应该归纳到“一大串”(《语丝》十七）上去。这是惟一病根，鲁迅若不彻底悔悟，转换新的方向，他结果仍旧只有死亡。希望鲁迅以后再不必亮着自己的漂亮的嗓子，大叫几声：“因为我欢喜”，这个“我欢喜”是终于要不得的。

二、所谓革命的鲁迅

很有许多人替鲁迅抱冤枉，说鲁迅是革命的，所以我们有再研究鲁迅的革命精神的必要。要考察鲁迅的革命精神，应该先看看他创作的动机。他自己说明他创作的动机道：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出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语丝》十七期）

鲁迅创作的动机是如此的。现在是卖文糊口了，当初却是应朋友们的要求。因为自己心里不平，不免露出愤言激语。鲁迅自己的供状。请问为“鲁迅先生”的抱屈者，鲁迅创作的革命的精神的价值究竟值得几何?

我们想，“冬芬先生”必愤然而起：“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呢？”（《语丝》十八）照这样说来，鲁迅当然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无意的成为这个时代的呼声”，应该“被称颂为改革社会的先驱”（三七）。因为“藉文艺以革命这梦呓，也终究是一种梦呓”（四十）。“艺术有独立

的无限的价值”（三八）。可惜鲁迅连一步都办不到，他只是忠于糊口，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牢骚。至于冬芬的洋洋大文，和鲁迅兄的一唱一和，当然是古茂渊懿，稽于远古之列。讨厌的，就是冬芬虽然怕象牙塔里之嫌，自己还是没有出来，唱着远古的宏论，他所用的尺不是鲁迅所列举的（四一），是一个近古的尺度。他的尺上明明的写道：文艺是不能有意的帮助革命的。

“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标准，既没有看到他的深处，又抛弃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尺度，便无的放矢攻刺一个忠于艺术的人，真的糊涂呢，还是别有用意。”(冬芬的话)这话我们觉得正可以移赠冬芬。冬芬先生，天亮了，走出象牙之塔吧，别要忘记你自己咒诅古文观止的时代，请看清“现代”，再说一句我们是否攻击一个忠于艺术的鲁迅，看看到底谁个是“糊涂”，或者“老糊涂”，或者是“别有用意”!“冬芬先生”，你为什么“而我也糊涂到而今”?作家与批评家的学识相差是不能太远的，我们所见到的冬芬，在时代的浪潮里，是连鲁迅也不如。他的“似是而非”，“粤若稽古”的议论，是没有再讨论的必要的。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4）

乃兄乃弟的一唱一和，正所以要挽回如江河日下的颓风，我们现在引出互相参证，来一论鲁迅的革命。

如冬芬所说，鲁迅只是一个忠于艺术的人。我们所见到的，也是他自己所供的，是那样的无意义。然而他自己——冬芬却没有看到——又觉得有一点是革命的，所以他又说到：

“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以前并未将我笔尖的血，洒到他们的身上去。”

这大约就是鲁迅心中的一点不平。鲁迅的革命精神。鲁迅的文艺思想。鲁迅的忠于艺术。鲁迅的唯什么史观。但不是民生史观。鲁迅所见到的社会组织。“在文艺批评上比眼力”(鲁迅的话)，鲁迅不把他笔尖的血洒向青年，洒向下等人，这就是他的革命。

呜呼!现代社会并不如鲁老先生所说的这样的单纯。所谓革命，也并不如鲁老先生所说的这样的幼稚。他始终没有认清什么是“革命”，而况是“革命精神”!

鲁迅还是不以为然的。我们再从侧面看一回。看看鲁迅眼中的现代革命文学的运动。我们可以找到鲁迅对于革命的意义，革命文学的意义的认识，到了若何程度：

“一、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吧。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语丝》十七期四四页)

二、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所发生的，有一大串。虽然还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呢，还是‘革伞尚未成功’的文学家。”(同上，五二页)

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冷讥热嘲，是举不胜举。纵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对革命的认识为何如。据鲁迅所说，无产阶级文学今

年是不应该发生的，而无产阶级文学应该起源于黄包车夫之手。他不知道革命的现势已经走到那样的程度。他也不曾知道无产阶级的文学的完成要经过几个阶段。他只知道今年革命文学的口号普遍的提将出来了，他也不一一考察这些口号的起源及其现实背景。冬芬含血喷人，说“革命文学家所要的只是长江下流”（参看《语丝》十六），是断章取义。对于鲁迅这样忘却文艺运动的时代背景的论断，请也用“衡量艺术价值的尺度”来量一量吧?

鲁迅在《路》（《语丝》十七）里特特的引出《野草》里的这一节：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这里又画出了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他始终不能做地火，只有希冀着。只有希冀地火来到时，好让他大笑，歌唱。这是革命的旁观者的态度。也就是鲁迅不会找到出路的根源。于是，鲁迅只有描写黑暗面。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5）

三、屁滚尿流与黑暗描写——革命文学作家反对暴露社会黑暗面么从最近三期的《语丝》上，鲁迅是很肯定的说，革命文学作家反对暴露社会的黑暗。无论是不是他的故技，他确实是在含血喷人。所以他若确有其事的说道：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语丝》十八)

鲁迅在这里捏造事实，欺骗读者，完全采用绍兴师爷的故技，我们不能不说他的态度是卑劣。提倡革命文学的刊物确实不少，谁个说过，或者表现出“特别畏惧黑暗”，要“掩藏黑暗”，只要描写“一点吉祥之兆”，“不敢正视社会现象”?谁个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呢?我们无法证实。说话应该负责任，鲁迅应该检举出来，不然，那就真是更进一步的“毒笔”了。

不过就《语丝》十七鲁迅通信里所说。上一段的话不为无因。他自己觉得是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人家反对他，当然就是反对暴露社会黑暗面，正等于“反对我就是反对革命”的论调一样。所以他表现他自己的伟大说：

“别的革命文学家，因为我描写黑暗，便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没有出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

并非言。只要留心鲁迅的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是怎样在矜持他的黑暗的暴露。不错，我们并不否认鲁迅是一个黑暗的暴露者，但暴露黑暗并不就是革命文学。而且鲁迅所暴露的社会的黑暗，究竟是那一种黑暗？读过《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人大约知道，也未必是革命

的。我们反对鲁迅，并不是反对他描写黑暗，这是自诩太高，神经太傲。我们始终不反对社会黑暗的暴露。

这里略论黑暗的暴露。我们态度是很显明的，我们认定健全的革命文艺是要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的。我们要暴露社会的黑暗，同时还要创造社会的未来的光明。文学作家不应该专走消极的路。如冬芬所说："却不知道他底厌弃人生，真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语丝》十六)。文学不但要认识生活，还要创造生活。文学是有他的社会的使命的。但是鲁迅笔下的光明在哪里呢?没有光明，只有"呐喊"，"彷徨"。"鲁迅先生"，光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创造的，文学也有它的创造光明的责任。所以我们并不反对暴露社会的黑暗面。在许多的革命文学的刊物上，暴露社会黑暗的创作却也不少。

## “朦胧”以后——三论鲁迅（6）

但是，我们所谓暴露黑暗，并不是盲目的暴露。不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暴露。不是以个人“趣味主义”的暴露。暴露与不暴露，完全的是出发于集体。或许冬芬又要讥诮所谓功利主义，我们暴露黑暗，同时还得注意所暴露的社会黑暗的某一种现象，给于革命的利益为何如?总之，不是盲目的暴露，“鲁迅先生”是忠于艺术的人，暴露的不是如此。我们主张暴露社会的黑暗，但不是糊涂的，忘却时代的，忘却集体的，只凭个人的直觉的暴露。“鲁迅先生”，这一回的“屁滚尿流”，你是“滚”错了，“流”错了，我们何曾不敢正视社会现象?

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看到社会的黑暗，也应该看到社会的光明。鲁迅的出路只有坟墓，鲁迅的眼光仅及于黑暗。而这黑暗，又只如他所说的“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语丝》十八)而已。他是没有看到拳匪之乱所含的暴动的意义，清末党狱里所烘托的革命精神，民二事件与个人主义死亡的实证，去今两年屠杀的统治阶级的恐怖背景。可惜鲁迅只会看到“人头”，看到“示众”，看到“一条辫子”，看不到这些以外的许许多多的重要的现象。他所表现的黑暗，只是贵家子弟，闲暇无事，在街上慢踱所看到的一些具着趣味，而大多没有意义的片段。我们所见到的黑暗，不像鲁迅所见到的这样的狭窄。鲁迅说：“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语丝》十八)，鲁迅这革命者在背着什么呢?——二十年来的趣味的人头。

革命文学作家的黑暗描写，是和鲁迅所说的不同的，同时他又要创造光明，自己不得不站在时代前面。这话已屡屡说了，但是鲁迅似乎有些昏乱。他说：

“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

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语丝》十六)

##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1）

石厚生①

我们这次的前进，在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当然的事，但是在素来与我们背道而驰的人，这一定不免要说是“突变”——这是不难理解的。所以，我们一方面预期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必定起来参加，同时他方面我们也静候着那些守旧的，蒙昧的及开倒车的分子的无耻的明枪暗箭的齐下。

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象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阿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堂鲁迅!

也罢，听他唱来，听这英勇的骑士唱来!但是，他才唱出些什么!

他唱了一句“醉眼中的朦胧”；他的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然而它的各段的内容，“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在那儿呢?“由我看来”，却在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的特殊性上。

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趺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做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听说堂鲁迅近来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他注意到时下的报纸杂志，是因为要知道什么人怎样礼赞而什么人怎样失礼；而且一次触了他的眼膜，“竟像一板斧劈着了”他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再也不会忘记，而且一有时机，那便真的睚眦必报了。

从前听人说过有一种菩萨，他的事情绝少，他只每日坐在殿上享受人间的香火而注意它们的数量。我们的堂鲁迅大概有点近乎此。

所以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位骑士，同时还是一尊小菩萨。这儿有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的特殊性，《“醉眼”中的朦胧》的朦

胧之发祥地就在这里。

为什么这种特殊性必然地在“醉眼”中引起朦胧来呢？是因为他坐在宝殿之上每天所要注意的只有自己的毁誉，在一定的时期内，这些是大概一定了的。大多数的人要在他面前顶礼；只有少数的人（大抵是稍微明白的青年们）撮转头不睬他，或竟说出几句不好听的话，这时候我们的小神必定把冷酷的面孔更加变得冷酷起来，说一声：“年青人这般傲慢！”而像一板斧劈着了“记忆中枢似的”，从此这种青年的可恶的小影永远留在堂鲁迅的脑中，而堂鲁迅的面孔越发一天天的冷酷下去。不幸的是堂鲁迅究竟还赶不上孔二先生，他究竟没有办法处治这种可恶的青年，也没有方法可以防范。

但是这些毁誉，在一定的时期，总和与百分比大概是一定了的。于是每天只注意这些的我们的小神就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使他构成“时间”这个观念。于是对于我们的小神，时间好像破旧的钟表永远停了摆动似的。于是空间尽管变化，北自北京，南至岭表，终于也跑来“坐在半租界里”，然而时间还是静水般停止着，洪宪以来，不知有曹三，无论国民革命与什么革命了。

##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2）

这就是堂鲁迅的朦胧的发祥地。因为他的头脑无法可以构成时间这形式，所以他不能观察事物在它们的动的状态上，在它们发展的必然性上；“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在那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

假使能够长久这般，那是多么美满的一回事！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堂鲁迅！我们已经知道这梦游的人道主义者，因环境的关系，一天天的冷酷下去了。现在，因为对他的毁誉之总和与百分比之急剧的变化，他更不得不悲叹自己为环境所作用了。于是，他不得已开始把自己清算起来。他有时候“颇也觉得危险了”，但是有时候却又“有些放心”，结果还是“照旧讲趣味”。所以，结果还是“留着一点朦胧”，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出时代落伍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自暴自弃。这里面当然有阶级的关系存在，不过我们的DonQuixote，因为他的特殊性的缘故，不能认识时代，也就终于不能悔悟，“终于不免朦胧”——这不要多劳思索才能理解。

我们现在试把他所唱的《“醉眼”中的朦胧》检讨一下。

在第一段里，我们的堂鲁迅对于期刊“纷纷而出”的“突变”叙述他的惊异，并且提出了一种观念论者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现象。就在这一段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不可救药的朦胧来。他的说明：“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这是绝好的观念论者的理由。但是，理由虽然“要而言之”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这“突变”和“伟大或尊严的名目”又如何说明呢?

第二段里说：“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并说及“这朦胧的发祥地”“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因为和他们“有瓜葛的”，“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但是“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

傻子是究竟不多的”。“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在那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这种说话，在他自己一定以为搔着了他人的痒处，但是，我们的堂吉诃德呀，你又在欺骗自己了!并且，依你自己的说法，你自己的朦胧到底又是属于那一类的?

“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在第三段里，我们的人道主义者很得意地说着。我们知道，人道主义者不论在什么阶级支配下都很得意的，因为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总是支配阶级的走狗。所以，我们的堂吉诃德呀，你的得意不过露出了你的马脚!并且，在革命运动的现阶段，社会的内在的矛盾已经尖锐化了的时候，一切的抗争不得不由阶级意识出发，人道主义者的假哭佯啼直是拙劣的丑角，可以招人冷笑罢了。

在这第四段里，我们的堂鲁迅感慨难禁似的说：”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帜。”我写到这里，也不禁要说：可惜略迟了一点，堂鲁迅年前抄小说，去年在广东，今年才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们已经知道堂鲁迅是无法构成时间这观念的，他以为现在仍是那美好的中世纪；在他的意思，他是可以当十字军大劫掠时在广东的，去年才“在”过一时，真是“可惜略迟了一点”。这在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不必多管；他说我们投机，这在他看来大约也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也不必多管；不过他在下一段“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我以为这问题应改为：倘若……，你能不去吗？我以为问题要是这样才有研究的可能性。

##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3）

以后有堂鲁迅自叙他自己清算的经过的几段，结果他“自己是照旧讲趣味”。还有关于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考据，这一点我不敢轻信我们的堂鲁迅，因为讲趣味是这“老生”的专门，讲到考据，恐怕终要让吾家博士适之坐坐上席。这当然是我的猜想，不过我终不敢轻信。

末尾几段详述他对于所谓“武器的艺术”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以为无讨论的必要，因为堂鲁迅全然缺少理解。他不曾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谓武器的艺术，就如他不曾理解“奥伏赫变”与“否定的否定”。他冷嘲《文化批判》介绍Sinclair而《创造月刊》继续介绍Vigny。这儿实在有绝大的矛盾；不过Vigny的介绍是去年以来的续稿，而《文化批判》介绍Sinclair也绝对不能是把他“拖住”的，这可以说是十分明显。我们的文学界正在方向转换的过程中，对症的理论的指导与优秀的旧技巧的介绍都是必要的，不过同时我们要维持批判的态度，也要提醒读者大众取批判的态度，就是，一方面介绍它们，同时他方面还得克服它们——在这一点，我们不免有可以非难之处，虽然将来是要，而且也不难补救的。但是堂鲁迅以为“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这却又是他把现在永久化，而把社会固定化了的结果。

最后，我们的堂鲁迅预言了“不久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并且对于“中国的最近的将来”给了一个暗示，虽然是很朦胧的。我以为我们应该相信这是堂鲁迅趋向革命的披露，我们应该“预致革命的敬礼”。

由以上的检讨，我们可以明白堂鲁迅的朦胧的程度。这里当然有阶级（他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自己说过的了）的关系，也有时代的关系。不过“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你看他是怎样明白！这儿却又“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了。

但是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以外的中国人，人道主义式的欺瞒也多是无意识的行动。人道主义者自己恐怕也不知道他自己的行动有什么意义——我很愿意这样想，并且希望我们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中国之社会的国际的特殊情势，能够对于眼前的现象加以正确的分析而停止“卑污的说教”。

对于我们的堂鲁迅，我希望他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于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他的悔改，同DonQuixote一样，是可能的。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回到这《“醉眼”中的朦胧》，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很起劲，但是，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请参阅《三闲集•文坛的掌故》。

注：

①石厚生，成仿吾笔名。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杜荃①

一、发端

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提倡趣味文学的《语丝》更和我没缘。最近友人寄了一册四卷十九期的《语丝》给我，我读了鲁迅的一篇随感录，就是《我的态度气量（器量？）和年纪》。

二、未读以前的说话

在未读这篇随感录以前我的鲁迅观是：

大约他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他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怀疑，而他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又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更说进一层，他或者不至于反革命。

这种观察我想现时代的青年一定有许多和我抱着同感的。

就是鲁迅自己怕也在把这种所谓超越感来自己满足的罢？——“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的。”

然而不幸得很——

三、既读以后的说话

我读了他那篇随感录以后我得了三个判断：

鲁迅第一，鲁迅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以前（Prae=Kapitalistisch)，更简切的说，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

第二，他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Bürgerliche•Ideologie)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所以，

第三，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

以下我们请把他的话来引证罢。

四、第一判断的引证

鲁迅说：

“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

这是最关紧要的一个眼目。

鲁迅先生这个所以张脉偾兴要起来“直道而行”，就是因为创造社用了他的“籍贯，家族，年纪，来奚落”了他呀！

创造社怎样奚落了他呢?

A.关于籍贯的

“他们因为我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醉眼陶然’……”

B.关于家族的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2）

“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指成仿吾）于《呐喊》出版时，既加以讥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这传统直到五年之后，再见于冯乃超的论文，说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吗？”

C.关于年纪的

“因为我们年纪比他们大了，便说‘老生’……。”

还有

D.关于身体的之预测

“幸而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受过创伤，倘使身上有了残疾，那就又添了一件话柄，现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

你看，这是多么天大的一回事。这便动了我们鲁迅先生的“直道”，要抖擞精神起来“战”，“战”，“战”了。

无奈一个人自以为我是这样的，别人不必便以为你是那样。

在我们看来鲁迅先生所罗列的一篇伤心话，可怜只像一位歇斯底里女人的悲诉，无怪乎弱水先生要说他“态度太不兴，气（器？）量太窄了。”

其实这不仅是态度和器量的问题——

五、问题的展开

问题是：

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

到这资本主义的时代，这种种观念是已经打破了的，科学的研究家还晓得把遗传，地域，时代的几个要件作为研究一个人的对象，这

虽然还是一种观照的唯物论，但比偶像崇拜狂的封建思想是大有进步的。

然而鲁迅连这种观念形态都还不曾把握，而他还固执着偶像崇拜狂的时代。

凡为遗传，地域，时代相同的人大抵是不出一个窠臼。不幸得很，令我也要联想到他的兄弟来了。

六、一个插话

在五六年前一位无政府主义的盲诗人爱罗新柯到中国的时候，鲁迅兄弟是很替他捧场的。

这位盲诗人有一次去看北大学生演剧，他还看（？）出了那舞台上的种种缺点。

这是很有趣味的一段逸事。这诗人假使不是真盲，那就是他(或者翻译者)所用的字汇太疏忽了。

结果果然有一位北大学生提出抗议，在《晨报副刊》做了一篇《爱罗新柯的盲视》(题目是否这样我记不确实了)。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3）

这便恼怒了我们那位周作人大师。他大发雷霆，责骂那位学生，说不该拿别人身上的残疾来作奚落的资料。……

你看这是多么“相同的气类”呢?

“这传统直到五(六)年之后，再见于”鲁迅先生的随感!

七、第二判断的引证

鲁迅连自然科学的唯物论都还不曾彻底的克服，这在上面是已经论断了的。我现在再引几处来证明：

A．“莫非一有‘弟弟’，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吗?”

天文和地理是“反对”的，这是鲁迅先生的自然科学观，这已经滑稽到不可思议；保皇和革命是“反对”的，这更表明了鲁迅的时代。

鲁迅的头脑还在满清末年，在那时候保皇和革命是视为“反对”的。其实这只是皮相的观察。

满清末年的改革是中国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推移。表现在政治生活上的过程是要求立宪(资产阶级的德模克拉西)，是产业救国(产业的社会化——富国强兵)。

当时的保皇党人，——一般是以梁任公为代表，他根本上是一个德模克拉西的论客，和当时的所谓革命领袖一样。他们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在主张君主立宪，一个在主张民主立宪，然而同一是立宪论者，同一是富国强兵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在当时是革命的阶级)的代言人。

这就和英日的君主立宪和美法的民主立宪同一是帝国主义者一样，想来到了现在总不会再有那样的“思想的权威者”，会以英日和美法的制度是“反对”的罢?

B．“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根本反对资产阶级，并不是“往往”，至于个人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则未之前闻——或许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的笔误罢?

资产阶级的意识根本就是个人主义。鲁迅先生，可惜你还不曾知道。

八、第三判断的引证

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了解的人，当然更说不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鲁迅在此也正好做一个证明。

请看他说的话。

A．“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

这是等于在说：石器时代的是应该想起的，石器时代用石器杀人，电气时代用电流杀人，同一是武器，以石器是等于电流，新还是等于旧。

也是等于在说：吃牛的老虎是应该想起的，老虎吃牛，牛格老虎，同一是用器斗争，所以牛角是等于虎爪，老虎还是等于牛。

“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弃人道主义等——”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4）

前一个时代为肯定自己的肯定而反对，后一个时代为否定自己的否定而反对，这种唯物的辩证法，超资产阶级的鲁迅先生那里会梦想得到!

不过他算学习了一个很简单的几何公理就是：

∵A=BB=C∴A=C

这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一个极简单的例子，这里面是没有包含“历史”或者发展的意义的。

所以在鲁迅先生看来，就是

旧=新

个人主义=社会主义

保守者=改革者

棒喝主义=共产主义

他自己的立场呢?是资产阶级?是为艺术的艺术家?是人道主义者?

否，否，否，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他说：

“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像他的东拉西扯。”

所以个人主义者保守者棒喝主义者是“不足虑的”，“可怕”的是社会主义者改革者共产主义者的青年。

这些青年一时还不会死，然而又“可怕”，这怎么办呢?这是好叫他比“老头子”早死了!

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

这是这位“老头子”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林琴南先生”果真“就早已死去了”吗?还有我们鲁迅先生“想起”呢!

“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cistist(写错了呀!应作Fascist)本相了。”

B.“我和西滢长虹战，他(指弱水先生)虽然看见正直，却一声不响，今和创造社战，便只看见尖酸，忽然显战士身？——(疑落“手”字)而出现了。”

##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5）

“这位隐姓埋名的弱水，”虽然经过鲁迅先生“影射”了一番，但我们还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在现在“Facistist”当权的时候，谁个反对派能够用出自己的真姓本名呢?这位弱水先生大约就是反对派的一个。那么你和西滢长虹战，他为什么要为你响一声呢。

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那一个猩猩?

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弱小民族可以从旁批判他们范围内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忙那一个帝国主义者?

但是猩猩要同人战，帝国主义者要同弱小民族战，那就不同，那没有曲直可用待言，只有结紧联合战线。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值得你来“影射”值得你来“指明”?

阶级的分化已经很尖锐了，弱水先生当然“是创造社那一面的”。

“也还是因为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们(指西滢长虹)同系，同社，同派，同流……。”

倒亏你知道了啦，但有什么裨益呢?你以为那是片面之辞，就可以掩盖你的对于时代的盲目，落后，反动了吗?

你看，他那四同而加一串虚点的表示法，他是在那里面感觉着多么浓厚的滑稽味，讽刺味，轻蔑味哟!在我们超资本阶级的鲁迅先生，那是只好讲同宗，同寅，同乡，同僚，同窗，同帮，同泽，同袍……啦!

九、结尾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

(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鲁迅对该文的意见请参看《鲁迅全集》第十二卷《致杨霁云》。

注：

①杜荃，系郭沫若的笔名。

##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1）

梁实秋①

西滢先生说：“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这话不错。不过“令人看不懂”这毛病就不算小了。我私人的意思总以为译书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得懂，译出来而令人看不懂，那不是白费读者的时力么?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什么叫死译?西滢先生说：“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死译”这个名词大概是周作人先生的创造了。

死译的例子多得很，我现在单举出鲁迅先生的翻译来作个例子，因为我们人人知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但是他的译却离“死译”不远了，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字，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今年六月十五大江书铺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今年十月水沫书店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这两部书都是鲁迅先生的近译，我现在随便捡几句极端难懂的句子写在下面，让大家知道文笔矫健如鲁迅先生者却不能免于“死译”：

“这意义，不仅在说，凡观念形态，是从现实社会受了那惟一可能的材料，而这现实社会的实际形态，则支配着即被组织在它里面的思想，或观念者的直观而已，在这观念者不能离去一定的社会底兴味这一层意义上，观念形态也便是现实社会的所产。”(《艺术论》第七页)

“问题是关于思想的组织化之际，则直接和观念形态，以及产生观念形态生活上的事实，或把持着这些观念形态的社会底集团相连系的事，是颇为容易的。和这相反，问题倘触到成着艺术的最为特色底物质的那感情的组织化，那就极其困难了。”(《艺术论》第十二页)

##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2）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牛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彻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文艺与批评》第一九八页)

够了。上面几句话虽然是从译文中间抽出来的，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但是专就文字而论，有谁能看得懂这样希奇古怪的句法呢?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真感觉文字的艰深。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出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

鲁迅先生自己不是不知道他的译笔是“蹩扭”的。他在《文艺与批判》和《译者后记》里说：“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折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鲁迅先生说“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是使他的译文“艰涩”的两个缘故之一，照这样说，中国文若不改良，翻译的书总不能免去五十分的“晦涩”了。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有些种句法是中文里没有的，翻译之难即难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文有“本来的缺点”便使“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

(1929年9月10日《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注：

①梁实秋(1903—1987)，浙江杭县人，新月社成员、作家、学者。二十年代，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推行者。

## 答鲁迅先生?（1）

实秋①

我在本刊第六、七合刊号上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篇是《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这两篇文章的本身，都是各自独立，毫无关联的。前一篇的主旨，是说明文学并无阶级的区别，既不曾诬蔑“无产阶级文学”，也不曾拥护“有产阶级文学”，因为我的结论是根本不承认文学里有阶级性。后一篇的大意，是指出鲁迅先生的几种翻译作品之令人难懂，并且举了几处译文难懂的实例，文章发表之后，自己预料恐怕要闯祸，第一恐怕触犯了无产阶级文学家(又称新兴文学家)的“联合战线”。鲁迅先生是否在这个“战线”里面，我不知道。第二恐怕触犯了鲁迅先生的权威，因为“硬译”云云由自己口里讲便很像是客气的话，由别人来议论便很容易觉得不舒服了。结果呢，祸是闯了，并且是两罪俱发，而首先宣布这两桩祸的人，都是鲁迅先生。《萌芽》月刊的“三月纪念号”里的一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便是鲁迅先生表现他的权威的所在。

凡是欢喜批评别人的人，总欢喜看别人对于他的批评，至少我个人是这样。鲁迅先生的文章，无论内容怎么样，趣味总是有的，文笔总是可取的，这是他的长处，也正是他的短处。是长处，因为有趣，好玩；是短处，因为态度不严正，内容不充实，我读了他这篇文章之后，我就不知道他的主旨所在，只觉得他是枝枝节节的咬文嚼字的说俏皮话。如其他是要为他的“硬译”辩护，就不妨把他的译文的妙处一二三四的讲出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合影来给我们见识见识，(为方便起见，我举出的那几段不通的译文就很可以做个榜样，请鲁迅先生解释解释看)；如其他是要为“无产阶级文学”辩护，就不妨一二三四的讲给我们听，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名词可以成立。但是鲁迅先生不这样做，是不能还是不愿，我们不晓

得。他只是说几句嘲弄的话了事。我现在把他的大文里的“废话”检举几段在下面，使大家知道鲁迅先生的散文艺术之精华的部分：

(一)鲁迅先生要驳我的文章，却先表示不屑看《新月》月刊的架子，例如他开首便说：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三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

这一段文字初看似乎平淡，细看则鲁迅先生的文笔着实可喜。你看，“年青朋友”等等这一句话便表示鲁迅先生似乎夙来不大常看《新月》，不过偶尔在朋友“手里”碰到《新月》，并且这两个朋友还是“年青”的，年青人不知深浅有钱乱花，于是“手里”竟有《新月》。鲁迅先生碰到《新月》之后，并不留神，不过懒洋洋地“顺手一翻”，“翻”过之后，便写了那篇反驳的文章。鲁迅先生的态度多么闲暇自在!

## 答鲁迅先生?（2）

(二)鲁迅先生要驳我的文章，却先要坐实我的背后有一个团体。“硬译”的名词本是鲁迅先生自己发明的，可是我一提出来说，这位夙来写文章给人以不舒服的先生自己便觉得不舒服了。梁实秋也有翻译的作品呀，鲁迅先生何不应用“以牙还牙”的办法也来找几段“死译”，“误译”，“硬译”的例子来“示众”?但是鲁迅先生不这样干，他因为我的文章里有几处用着“我们”。于是他有文章作了，他说：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以不舒服，甚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壁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这一来，“新月社的人们”全扯进来了，要辩白罢，人太多，一个一个的辩白那太费事，只得不辩，于是鲁迅先生大胜利!其实鲁迅先生这篇文章虽然好像是“单独执笔”，虽然未用“我们”，而“编辑后记”里却说：

“梁实秋……思想虽荒谬虽奇特，在现在却有很大的社会意义。所以我们由鲁迅先生的手加以详细的反驳了。”

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引用鲁迅先生使人“不舒服”的一句名言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止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这回，不舒服的该是鲁迅先生。

(三)鲁迅先生要驳我的文章，却先要指责我的文章之加圈圈。说来可笑，文章加圈点不过是令读者注意的一种标记罢了，譬如英文作品往往有些字是用大写字母排的，或用意大利的字母排的，无非是惹人注意的一种方法，并没有什么犯罪的地方。而鲁迅先生一则曰：“细

心的在字旁加上圆圈”，再则曰：“加上套圈”，三则曰：“字旁也有圈圈”，四则曰：“大可以加上夹圈”。好像我加了圆圈，便要罪加一等似的!其实鲁迅先生自己呢，他硬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百四十八页上“评价”，“规范”，“内容”等字旁也是加圆点的!我加的是圈，鲁迅先生加的是点，如是而已。

以上我略举几个例，证明鲁迅先生的文章里面废话甚多，然而据我看，他的文章的精华也正在那几处地方。洋洋二十五页的高文，页页是好玩的，但是鲁迅先生的真意所在，我看不出来。

谁的文章长不一定就是谁的理由充分。这一期《新月》没有二十五页的篇幅给我写使人不舒服的文章。我现在只简单的重复申明我的论旨，并且附带着提出质问鲁迅先生的几点：

## 答鲁迅先生?（3）

(一)鲁迅先生的翻译，据他自己说是“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我便举出了三段实例来证明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请鲁迅先生明白宣布，我举的例对不对?如其我举的不对，请他自己举出几个那“真多”的“难解之处”，也让别人瞻仰瞻仰翻译之难。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这样的，鲁迅先生近来的译品简直是晦涩，简直是难解之处也真多，我随时可以举出例证来。

(二)鲁迅先生的翻译之所以“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的缘故，据我想，不外乎鲁迅先生自己的糊涂与懒惰，即他自己所谓的“能力不够”是也。而鲁迅先生只承认这是两个缘故之一，还有一个缘故是“中国文本来的缺点”。究竟什么是“中国文本来的缺点”呢?请教请教。

(三)鲁迅先生是不是以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如其是的，鲁迅先生自己究竟是站在哪一边，还是蝙蝠式的两边都站?鲁迅先生以为“新月社的人们”是在那一边?理由安在?我觉得鲁迅先生向来做反面文章，东批评，西嘲笑，而他从来不明明白白的公布他自己的积极的主张和态度。人家说他是有闲阶级、小资产阶级、落伍者，于是硬译一本卢那卡尔斯基，你们看看，我在“作战”呢，我也在“联合战线”里面呢!人家说他是“转变方向”，于是立刻嘲笑“成仿吾元帅……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于是立刻拒绝《拓荒者》《现代小说》的“谥法”，你们看看，我才不投降呢!但是这样的左右支撑，究能延长几久呢?我的主张是干脆的，我不承认文学有阶级性，阔人穷人写的作品我都看的。这回承鲁迅先生介绍《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溃灭》、《水门汀》，我立刻就去读，还许要批评。但是愿意知道鲁迅先生正面的积极的文学主张的人，大概是很多的，不知道鲁迅先生愿意做这样的事不?

最后，还有一件事。《新月》月刊上近来发表些篇争自由的文章，这是我们几个人各自的良心主张，能否博得读者同情，我们原不预为计较的。鲁迅先生的喜欢嘲笑人的态度，这一生大概是不能改掉的了，当然我也不希望他改掉，鲁迅先生而不嘲笑人，这个世界上该要如何的冷静呢!所以鲁迅先生屡次讥笑《新月》争自由的文章，我们都不觉得奇怪。在鲁迅先生这是当然有此一着的。令人惊讶的是，一九三○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七时，“著作界名人鲁迅、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及商界、新闻界、律师界、教育界同人五十余人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讨论四小时之久，议决事项甚多”云云。鲁迅先生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这在将来的历史上一定是一件大事，不加圈也要加点的，现将宣言全部录在下面：

## 答鲁迅先生?（4）

“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我预料将来来到鲁迅先生等发起的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旗帜之下的人，一定是很多的，我应该预祝这个大同盟成功!但是“新月社的人们”，发表几篇争自由的文章颇引起一些人的评论，以为我们是不够彻底，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欧美式的自由的勾当，比不得马克思、列宁等等的遗教来得爽快。有人讥诮我们要求的不过是思想自由，有人讥诮我们只是在纸上写文章而并不真革命。这些讥诮，我们都受了。讲我自己罢，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价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我们争自由，只是在纸上争自由。好了，现在另有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了，“议决事项甚多”，甚多者，即不只发宣言一桩事之谓也。他们“奋斗”起来恐怕必定可观，鲁迅先生恐怕不会专在纸上写文章来革命。虽然宣言里开宗明义要争的还是思想自由，所谓“伟大的时代”恐怕也许是真要来罢?

(1929年11月10日上海《新月》第二卷第九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 “无产阶级文学”

我说过：“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货色。”我的意思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列宁阶级斗争等等的名词，我们已听过了不少，请拿出一点点“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给我们看看。否则专登广告，不贩真货，令人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那岂不太滑稽了么?

我这个要求遇到了两个答复，一个是“由鲁迅先生的手”答复的，一个是《拓荒者》。

鲁迅先生说：“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办法他是认为“不错”的了，不过我举了两首郭沫若先生的译诗来做标样，鲁迅先生便又认为“是不对的”了。对不对，错不错，这问题当然应该由鲁迅先生来钦定。他钦定了三部作品，即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等三部，是“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连“比”都不可以)其实文章做到这里就够了，但是鲁迅先生底下还有。他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要求好的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不错’上面还加了一个‘极’的!)。这样的无理要求，却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前后对照来看，鲁迅先生本来认为是“不错的”“最切实的办法”，现在又忽然变做了“无理要求”了。一个人的脾气是这样的容易变换!我并不要求冻饿好久的人能像富翁那么胖，但是天下尽有一般人，口里尽管嚷：“我是胖子呀!”那么我就请他于嚷嚷之余露出他身上的肥肉来给我们看看，这不能算是“无理要求”，这不能算是“恶意”吧?鲁迅先生举卢那卡尔斯基的作品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时，那态度真有点像“战士”的勇敢，底下躲躲闪闪的态度便是其软如绵，太快的缩了。

《拓荒者》的态度不同。他们说：“梁实秋说‘我不要广告，我们要看货色’。好个老市侩!然而我们并没有意思做生意。”这态度真鲜明极了，生意是不做的，广告是要做的，说句“老市侩”的话，这就是买

空卖空之谓也。可是生意虽然不做，在第一期的《拓荒者》他们也搜索出来七八篇“作品”，并且还加了批评。内中有一段是批评某君的一篇《阿三》的，评语是这样，“《阿三》作为小品算是成功的。很巧妙地说明阿三怎样明白了布尔什维克是什么。……”原来“成功的”“无产阶级文学”是这样的。

左联创办刊物《拓荒者》《现代小说》三卷三期里有一篇“创作小说”题目就是《梁实秋》。据我看，小说里的情节本来无须完全根据事实，尽可虚构，只要近乎人情就算了。不过这篇小说的标题既是真姓真名，而内容也仿佛作出好像是真事一般，我似乎不可不解释一下了。这篇小说若当做小说看，好坏我不愿意批评。若当做实事看，我便要宣告这篇小说完全是造谣污蔑，没有一个字是真的。若说那位作家故意毁人名誉，那也未必，他自己便未必是个爱惜名誉的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小说呢?有道理的。《申报》大概是资产阶级的报纸，无产文学家照例是不该信任的，但是《申报》登载了一段关于我的完全无稽的新闻，这位无产文学家马上抓了来作为可靠的资料，加以润饰陪衬，俨然成为“创作小说”矣!这篇小说的主旨呢?是在说明我是一个“小布尔乔亚汜”，触犯了“布尔乔亚汜”，于是“摇尾乞怜”，没有“普罗列塔利亚”那样的光荣。可惜事实完全是捏造的，否则这篇东西大有一读的价值。(写这篇小说的作家已于一九三○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七时随同鲁迅先生发起了“自由运动大同盟”，今后普罗列塔利亚的争自由的运动当如何进行，于触犯“布尔乔亚汜的虎须”之后，是否真的“摇尾乞怜”，只好等着看。也许人家始终就不触犯“布尔乔亚汜”，顶多触犯“小布尔乔亚汜”罢了。)这篇小说，据《拓荒者》的批评家看，是“对于改良主义者的嘲笑的声浪”，嘲笑固然有趣，可以嘲笑的资料要稍微费点神去找，不可以见神见鬼的嘲笑自己脑海里的幻像罢!

(1929年11月10日上海《新月》第二卷第九期)

## “资本家的走狗”

实秋

写完前一段短文，看见了《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一页起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阶级社会的艺术》，也是回答我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那篇文章的。《拓荒者》的态度比较鲜明，一看就晓得一套新名词又运用出来了，——马克思，列宁，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等等。但是文章写得笨，远不如鲁迅先生的文章的有趣。

这篇文章使我感得兴趣的只有一点，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给了我一个称号——“资本家的走狗”。这个名称虽然不雅，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学家的口里这已经算是很客气的称号了。我不生气，因为我明了他们的情形，他们不这样的给我称号，他们将要如何的交待他们的工作呢?

“资本家的走狗”。那意思很明显，他们已经知道我不是资本家了，不过是走狗而已。我既不是资本家，我可算是哪一个阶级的呢?不是资产阶级，便是无产阶级了。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查字典是不行的，韦伯斯特大字典是偏向资产阶级的字典，靠不住。最靠得住的恐怕还是我们的那部《拓荒者》。第六七二页上有一个定义，我暂时还不知道那里发售无产阶级大字典，所以暂以这个定义为准。

“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是什么呢?它是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不倚赖任何种类的资本利润之社会阶级。”

这个定义是比韦伯斯特大字典上的定义体面多了，中听多了!我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了，因为我自己便是非出卖劳动便无法维持生计。我可不晓得“劳动”是否包括教书的事业，我的职业是教书，劳心，同时也劳力，每天要跑十里路，每天站立在讲台上三四小时，每天要把嘴唇讲干，每天要写字使得手酸，——这大概也

算是劳动的一种了罢?我不是不想要资产，但是事实上的确没有资产，一无房，二无地，那么，照理说我当然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了，我自己是这样自居的。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学家又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呢?假如因为我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家便说我是资本家走狗，那么，资本家又何尝不可以同样的理由说我是无产阶级的走狗呢?也许无产阶级不再需要走狗了，那么，只好算是资本家的走狗了。

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以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

(1929年11月10日上海《新月》第二卷第九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 鲁迅与牛（1）

梁实秋

我在《新月》第二卷第九期写了一篇短文《答鲁迅先生》，我的大意不外两点：

(一)我觉得鲁迅先生近来的翻译“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所以真不愧为“硬译”，我已经举过三个例，随时还可多举几个例。

(二)鲁迅先生善写有“趣味”的“嘲笑”人的“杂感”，但是我不曾知道他的积极的对于文艺与思想的态度是什么，主张是什么，所以我愿他说几句正面的话。

这文章发表以后，就有朋友写信劝我不必再在这种没有价值的争论上枉费精神。而我认为，只要不闹到意气用事，辩难的文字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打笔墨官司是容易事，实在就是较文雅的吵嘴，那里配谈到什么“讽刺文学”。在文学上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也许见到谁写了几段下贱的刻薄话，便大惊小怪的嚷：“这是讽刺文学呀!”这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我现在回答鲁迅先生几句话，万万不敢亵渎“讽刺文学”的招牌。

鲁迅先生对于我上面说的两点正文，截至现在为止，并没有回答。而许多许多枝节问题又生出来了。这正是鲁迅先生的故态，他就没有耐性能使他彻底的在某范围之内讨论一个问题，你指摘他这一点，他向你露露牙齿笑两声，然后他再蹦蹦跳跳的东一爪西一嘴的乱扑，他也并不想咬下你一块肉，只想撕破你的衣服，招你恶心。这种的Dorillawarfare并不使人怕，只使人厌烦。这样辩论下去，永远不会有什么结论的，因为鲁迅先生要争的似乎不是什么是非，他要的是“使人不舒服”而已。与其逼鲁迅先生说正经话，还不如索性给他一个放刁的机会，让他充分的表现他的特长罢。

鲁迅先生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别人的话靠不住，让他自己来供：鲁迅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什么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①

## 鲁迅与牛（2）

这真是鲁迅先生的活写真，仔细看过这段描写的自白，也许有人以为我以前太多事，人家已经说得这么明白清楚，何必还用什么对于文艺思想的积极的意见?鲁迅先生一生做人处世的道理都在这一匹疲牛的譬喻里很巧妙的叙述了。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这譬喻来得切确。不过人应该比牛稍微灵些，牛吃李家的草的时候早忘了张家，吃赵家的草的时候又忘了李家，畜生如此，也自难怪；而人的记忆力应该稍强些罢，在吃草喘气的时候，也该自己想想，你自己已经吃了几家的草，当过了几回“乏”“牛”!

鲁迅先生做牛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不能用得太苦，第二个条件是不要专指为某家的牛，第三个条件是不卖肉。第一个条件能办到，用牛耕田转磨的主子可以体恤到这一点，多给几捆草，少写几千字，算不得什么，不过在牛一方面，这一点也是应该言明在先的罢了。第二个条件稍难，你流着汗给张家耕田，旁人自然就说你是张家的牛，你吃李家草，旁人自然就说你是李家的畜生，除非人家认识你，或是有人在你毛上打过一个烙印，印着“我是一匹丧家的乏牛，谁给草吃我就给谁做工，救救罢，可怜的乏牛!”第三个条件又容易了——说到这里想起一桩事。

一九三○年四月八日上午十时，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全上海的革命团体在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号召之下，准备对于南京的四三惨案有所表示”。自由运动大同盟即是鲁迅先生领衔发起的。“有所表示”者，即“三四百个”人要冲进北京大戏院开会未果，被巡捕打死一个，而“留下一滩鲜血”是也。这事发生之后，颇有人为鲁迅先生担心，因为不晓得流了“一滩鲜血”的究竟是哪一位。尤其是，在某处听说“凡是左翼联盟的作家都要参加工农革命的实际行动”，一滩鲜血，喜欢“讽刺文

学”的人，当然没人能不认为这是很大的牺牲；而在“普罗”一方面看，这又是很光荣的一件事了，幸亏事实不久大明，死的不是“参加工农革命的实际行动”的“左翼作家”，是一位“勇敢的工人”。(《萌芽》月刊第五号第三一o页称这位死者为“赎罪的羔羊”!)鲁迅先生的“不卖肉主义”是老早言明在先的。

鲁迅先生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我并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我在第九期《新月》与鲁迅先生无关的一篇文字里写了“ZZ党”的字样，我用ZZ代替另外两个字，这并不是我的“巧妙”，鲁迅先生发表文章的那几种杂志不是常常有XX党的字样么?大家似乎都避讳这两个字。例如《文艺讲座》第二九七页上还有“康命尼斯特”这样的一个名词，这岂不来得更巧妙。然而鲁迅先生以为我故意影射他是ZZ党，所以“职业比刽子手还更下贱”了。其实鲁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有草可吃的地方本来不过就是那几家，张家，李家，赵家，要吃草还怕人看见，太“乏”了!《萌芽》月刊第五号第一二六页有这样的一段:

“鲁迅先生……将旧礼教否定了……将国家主义骂了，也将无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劳什子都骂过了，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党没有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过，分明的还在从旁支持着它。”

这“一种主义”大概不是三民主义罢?这“一种政党”大概不是国民党罢?

(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第二卷第十一期)

注:

①见鲁迅作《〈阿Q正传〉的原因》。

## 鲁迅卖狗皮膏药

甲辰生①

我们中国公学年来因为学生日众，吴淞原有的校舍不能容纳的缘故，所以去年秋季开学，便把社会科学院和商学院都搬到上海来，今年开学了没有好久，社会科学院里便有几位巨头的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会，据他们口头宣传，会员也有六七十人了，昨天下午是他们第一次聘请名人演讲。事前看着这班巨头发狂似的热烈宣传，又震于大名鼎鼎的大文豪?(照布告的语气称)鲁迅先生的台衔，所以不由的也告了假去听他的演讲。本定下午一时开始讲的，但是我们候到三时模样，才见大文豪等一班人姗姗而来；我想他们迟到的原因，决不会也像什么红花歌舞社，绿花歌舞社般的故意摆架子，一定因为中途被人拉去演讲所致吧?鲁迅先生在春雷似的掌声中登了讲台，“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哼了不满三十分钟的雅调。”(袭大文豪的讲词)后来继续上台的还有几位，于是更一蟹不如一蟹了，告了半天假，脑筋里所感到的是充满着烦恼，失望，沮丧，……

现在把昨天大文豪的演讲，在这里作一个片断的介绍，他的讲题是《美的认识》，开始他就用旁起法讲他的大文章：“现在有一般，除掉少数真正认识文学的人以外，差不多异口同声讲我的著作不是上等文章，而是下等文章，这种批评，实在是谬谈；所以会发生这种论调的原因，由于他们不能捐除传统思想的结果。例如讲到世人对于美的认识，可以分为无产阶级的美，中小资产阶级的美，大资产阶级的美三种。他们的认识，完全是分道扬镳的。在中产阶级的尤其是资产阶级，他们目光中所认为的‘风雅士’，‘佳公子’是一般吟风弄月，骨瘦如柴，扶杖而行的文弱书生。所讲的话，最好句句用典压韵，令听的人愈不懂愈妙；说话的声调，是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讲着。至于姑娘们的美，最好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般的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看见刮风哭，看见下雨也哭。但是无产阶级，工人，农夫们，对

于求偶所认为的美，就完全不同了。(这句鲁迅先生说得未免太主观吧!）像我们绍兴农人嫁女前，首须看一看新女婿；而选择的最主要条件，便是肥大的两条腿，因为如此才能养活他的女儿。(甲按：但是两腿局部的发达，不一定就是壮健的汉子)文学当然也跳不出这个公例，所谓下等文章，无产阶级的美，将来无论如何，终会占有优越的位置的。”

鲁大文豪这篇讲词，他的讲题，最好改为两句社会上最流行的俗谚，“文章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美”，比较切题多了。彻骨的讲一声，大文豪昨天演讲的主要目的，无非像火车上的卖轧格灵药水，生发油，香肥皂的零售商，和打拳的卖狗皮膏药一样，作一番口头宣传，想多销去几本下等文学《呐喊》般的书罢了。(因鲁先生讲词中，对于《呐喊》那本书，曾再三介绍；封面所以用红色的原因，更详尽的解释)我终觉得鲁先生对于美的观察，太武断了。例如他说：“非同阶级的人的审美感念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同一阶级的人群，因为学识嗜好，个性，种种的歧异，于是他们对于美的认识的结果，也何尝会一致呢!所以我们只可以讲，宇宙间一切的美，人类天性上的审别是没有差异的。不过因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享受不同，于是人群的欲望程度，也随之高下而已。可是各阶级人类对于美的根本元素的认识，仍不因外感的关系，而发生冲突的，例如娇艳香甜的玫瑰，活泼有趣的姑娘，显露在我们的眼帘前，要是他脑筋中或肉体上不发生特别残缺，那么，一切人们的心田里，还是同样的要种下爱苗的。

后来还有大文豪的几位随员演讲，一个个都喊得面红颈赤，声嘶力竭，像猫儿叫春般极叫着；察其内容差不多都是些口号式的话，打倒什么，拥护什么，加入□□大同盟，为节省宝贵的篇幅起见，恕不和他们介绍了!

(1930年4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

注：

①甲辰生，作者不详。

## 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

男儿①

鲁迅是中国现在文坛之健将，不但在国内享有盛名，而其作品竟译成五国文字而传播于海外。

创造社诸人，因为卢布及虚荣之关系，为共产党所收买。把文艺的心灵，要将中国文艺界，统一在共产党政治主张之下，而且要独霸文坛，于是此文坛老将鲁迅首当其冲，创造社之成仿吾，太阳社之钱杏等(也是创造社之旧伙计在党的命令之下。)半公半私的对鲁迅下总攻击，说鲁迅反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是封建残梦之迷恋者，(大意如此)在“创造”“太阳”等刊物非理性的把鲁迅骂到狗血喷头，但鲁迅亦不示弱，在语丝冷嘲热讽的，把此辈自命无产阶级文学家气到七窍生烟，但以一无政治集团为背景之文学家，与有政治集团之所谓文学家争斗，必须不免于受打击的，隶属共产党籍之青年，在党团指挥，摇旗呐喊，到处诅咒鲁迅如何不革命，如何反动，作品又如何不好，在有识者目中，固为鲁迅抱不平，对所谓普罗文学发生反感，然鲁迅因此不能不有怯于中了。

过去共产党之文艺运动，虽然自己高呼胜利，但是都是同归失败。此种事实，我们在现在所谓普罗文学家的互讦中可以见到，鲁迅过去差误之追评，(见于《萌芽》第四期，鲁迅的演讲杂文)郭沫若的过去失败之纠正(见于北新书局出版之《文艺术》第一期，郭沫若所作《无产阶级文学大众化》一文，此文可说是宣传大纲，而不是论文)所以，共产党过去之文艺政策，如潘汉年蒋光慈之流，在个人享乐固然成功，但在党的政策可算失败，于是由自身之觉悟，以应付环境，共产党之文艺政策又是一变，对鲁迅等不取攻击态度，而取拉拢拥护态度前倨后恭，鲁迅在此未免有情之情形中，何能遣此呢?于是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演讲，昔为

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所以有学识之青年，言下不胜为之叹惜者。

鲁迅、萧伯纳、蔡元培，鲁迅常以中国之高尔基自况。高氏在世界文坛拥有极好的地位，共产党打之不倒，乃欢迎之返国。备极崇奉，希望为其工具，鲁迅现以得共产党小子之拥戴以为高尔基之不若了，那里知道他们以彼做政治斗争之工具呢?批评女子的人，多说女子虚荣太重，试问所谓文学家又何能免俗呢?鲁迅既如上说了，即如郭沫若而论，他以为在中国文坛有地位，要取得国际文坛的地位，中国政党有国际组织者，只有共产党，共产党之背景第三国际赫然国际机关，于是在共产党几声拥护，一次拉拢之后竟加入共产党，现且为第三国际东方宣传部长，在自身，于共产国际式有地位，在文艺，不知世界文坛的地位何似，实在作品要在世界有地位，是在文艺之作品之本身，一念之差，把文艺的精神，贡献于政治魔鬼吞噬，虚荣之误人有如此者，我因说鲁迅而说及当中，不禁为之感慨系之。

我记得，所谓普罗文学家，曾骂鲁迅不懂社会科学，据我的朋友王君告诉我，鲁迅因此大研究其社会科学。现在鲁迅屈服了在共产党麾下之时，不能不说："挂着革命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已在转向社会转向社会科学了，不能不说是好现象。"但社会科学虽与文学有关，但社会科学不是文学，是和文学有关之政治不是文学是一样的，过去之普罗文学遂以政治宣传为经以恋爱为纬之普罗作件，令人"好像要吐呕"。如最近郭沫若所作《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大谈其社会科学，把四川铁路收归国有之风潮，人民立光绪牌位争斗之反抗行动是阶级斗争。不是也"好像要吐呕"吗?过去的以文学做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固然失败了，现在又以文学做共产党眼中之社会科学讲义，也许是幼稚命运而已。真出我意料之外，文学家之头脑，竟如幼稚的CY这样容易转移。

鲁迅先生在共产党诅骂到怕之后，一拉拢就屈服了，光华书局所出版之《萌芽》，名为鲁迅主编，实则是共党操纵而且更同流合污的

署名于巴尔底山(por，itan)之共产党代的刊物，其自甘为傀儡有如此者，现据熟于文艺界消息表的朋友说，张资平也不堪其骂，近已输诚投降了。据说，他俩为了要维持文坛上和社会上的地位，不能不和他们要好，共同一致，于是共产文艺政策宣告成功，而文艺前途不知黯淡无光于何时了，啊!为什么不淫不移不屈之士，这么难见于今世?我在鲁迅先生没有醒觉时，深深为之惋惜，不能不痛心地写了一篇鲁迅被共产党屈服。

(1930年5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二心集•序言》

注：

①男儿，作者不详。

## 鲁迅大开汤饼会(节录)

文坛小卒①

……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汤饼会便开成了。……这日鲁迅大师的汤饼会到会的来宾，都是海上闻人，鸿儒硕士，大小文学家呢。那位郁达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学负有责任的，听到这个喜讯，亦从安庆府连夜坐船东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产下了一个虎儿，这日带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会，会场空气倍加热闹。酒饮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来致祝词，大家都对鲁迅大师恭喜一杯，鲁迅大师谦逊着致词，说是小囝将来是龙是犬还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样的庆祝啦。座中杨骚大爷和白薇女士同声叫道，一定是一个龙儿呀!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伤感，他前年不幸夭殇的儿子，名字就叫龙儿呢!

(1930年上海《白话小报》第一期)

注：

①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南腔北调集•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 答鲁迅（1）

向培良①

自十五年四月我离开北京，就再没有和鲁迅见面了。狂飙周刊初和语丝论战时，鲁迅还给我来过信，我呢，也隐忍无言。直到周作人诬狂飙为国家主义，鲁迅写《〈阿Q正传〉的成因》，诬我们为争夺莽原的地盘；我才开口说过一两次话，也很含蓄。希望鲁迅能够好起来，而不要逞性子钻到牛角尖里去。十五年前，前后殆及三年，我和鲁迅的关系颇深，故不忍多所争执，而愿以青年的同情充分给与老人。

此后，我们是走到两条路子上了，乃不复通消息。听说鲁迅的境遇也好一点，不再孤独，正合了我所说“广东有红的花”那预言，这是我也颇为之欣喜的，以为他们的“寡妇主义”的风度是过去了。不料他忽然提到了我，足见怀旧之情，而思想界权威者的面目，依然如故。此老健在，到也是文坛上的一件韵事。

蒙鲁迅先生(应该回敬一声先生)称我为狼，呼我为狗，陷之曰“豢养”，斥之曰“叛变”，在我是受宠不惊，但不知这位思想界的权威会于左顾孺人，右弄稚子之际口诛笔伐时如何感想，我今缅怀旧情，颇切怀念，想到这位故智复萌的老人，到也为之感慨。

鲁迅鲁迅之恨我是当然的。他本意满拟把我“豢养”成他一员大将。莽原之编，乌合丛书之出，无非为提拔而设。而时移世异，我乃不受“豢养”，竟不能安居他的门下，“叛变”了他，这真是鲁迅所痛心疾首的事。然而远在十四年初，我早已和他谈过济公和尚坐轿子的事。则“学生”之所以维护“先生”者，实无微不至。无奈鲁迅却没有济公和尚踏破轿底板的勇气，终于要躺在地下，作青年人的绊脚石，那又有什么办法?

而鲁迅这一次之所以骂我，则表面上因为我主张人类的艺术。若因为主张不同而相批评，批评之余以至于谩骂，也事势之所必然。这

时候也不必论什么先生学生了。(我于十二年下期在世界语专受鲁迅小说史课，)然而鲁迅的意思却不是这样的。乃深具言外而意内之致。

我在十八年春写《人类——艺术——文学》，已确定个人艺术之观念。此后编青春月刊(其时奔流尚在，萌芽初起)，引伸之为《人类的艺术》一文。而冯乃超氏则有评文，大意谓人类的艺术是好的，但必经过阶级的艺术。普罗文学初盛，我僻居湘南，也无所闻见。后此来沪上，艺术戏社诸君曾屡次约我人社，我终以不能赞同普罗艺术，没有加入。当时鲁迅对我的《人类的艺术》曾无一言，无非他们对我还存后望，所以不愿在文字上决裂而已。于今青春月刊再起，行动比前更坚实，态度比前更稳定，鲁迅这时候才觉到有及早摧残之必要，便奋然一骂。(他前此叙一八艺社展览会的文字上也同样骂过，因未提名，故我不理会)不过鲁迅若以为先把我骂倒，青春月刊就会消灭，那才是不睁开眼睛看时代的白日梦呢。

## 答鲁迅（2）

人类的艺术，鲁迅并未看过。只摭拾浮词，肆意谩骂。而置理论于不顾。若人家一发表意见，而不肯依草附草，就要劳鲁迅斥之为“狗”，则青年只好永远躲在道士的袖子里了。据说鲁迅也曾作过战士，后来却坐在暖轿里做太师。如今呢，更从普罗文学到了浅薄的英雄主义，而大发挥其独裁思想来包办时代，于是乎力排异己，要把青年都收到他的袋袋里去，但终亦心劳日拙而已。

不过鲁迅虽然骂，也不过空空然白纸写黑字，并无效力，既然已不能用对付狂飙周刊的旧法，又不能够叫青年文艺警卫团警卫一下子。则鲁迅在骂个痛快之后，也会自己感到无聊罢。前此他愤然说要停办莽原，我劝他不要学魏连殳的孤独。如今呢，谁知他反而学阿Q式的反抗了。此老每于愤怒之余，便自己向下堕落，而今每况愈下，青年们真应该可怜他一下子。

那么，我们且停止这些争辩罢。鲁迅先生(再叫一声先生)，请搬出你的阶级艺术之理论与实际来。我呢，也本着我的信念干下去，做个像样的“学生”，我们且预备一次更大的碰头罢。若必不惮烦而要和我斗斗口舌，则这个“学生”性格你原是知道的，当然也可以奉陪下去。

此地晴则苦热，雨则苦湿，我处在被雨漫塌了的房子里，正陷湿热之间，得如坐蒸笼里。(这种生活，应不如鲁迅所“豢养”的“狗”。呜乎，小资产阶级!)而我也天天有应做的事，本没工夫和鲁迅斗闲气。然而也抽点时间回骂一下者，则以鲁迅摆出权威者俨乎其然的样子，自应毫不客气回他一棍子。这使鲁迅也知道人间世还有不舒服的事，而在他那悠悠然的脸孔上划出难受的皱纹来。

去罢，你老时代的尾巴!

(1931年8月南京《活跃周报》第十三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注：

①向培良(1905～1961)，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

## 作家素描

美子①

鲁迅是一个有趣的人，但是，他只能以人家以“趣味的材料”，他自己倒并不怎样感到有趣，例如，他说出许多令人捧腹的话，可是当大家张开了嘴哈哈大笑时，他却又板着冰冷的面孔，瞪着眼睛向群众发呆。鲁迅做的文章，同样的是给于观众以一种“幽默的趣味”，可是他自己读了，恐怕好似喝苦酒吧?一般青年对于鲁迅的印象是极好的，只是有一点缺陷，便是鲁迅的思想终于不能和创造社的一般人融洽起来(当然，同样地对于创造社也抱这种缺憾)。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讲演时，常喜把手放在长衫的后大襟里，在台上像动物园里的老熊一样的踱来踱去。

鲁迅很瘦的，一张充满着风尘的脸，近来更其衰瘦了，额上有许多深刻的纹痕，嘴上仍旧留着浓黑的八字小胡。有人说他像俄国人，有人说他像官僚，总之，凡看见过他的人，总不相信这样瘦的人，也曾进过水师学堂和学过医学的。

闻得他老人家近日正在编一本书，是他从前与夫人互通的情书集，将汇集发表，不知道确不确。

我们祝福着这“中国的高尔基”永生!

(1933年1月《出版消息》第四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南腔北调集•题记》。

注:

①美子，作者不详。

## “最通的”文艺

王平陵①

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弯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下，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

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胡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的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回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功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立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1933年2月20日《武汉日报》副刊《文艺周刊》)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伪自由书•不通两种》。

注：

①王平陵(1898～1964)，江苏溧阳人，亲国民党的右派文人。

## 对鲁迅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1）

首甲等

一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不要忘记了在左的辞句遮掩之下的盲动主义；同样在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斗争中，却也不要忘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这是无产阶级在不断的酷烈奋斗中，为推动与领导斗争的进展，为革命的胜利而必须采取的方略；——两条战线的斗争。

现在，中国革命的运动，随着政治经济一般危机之深入，而走上激化的阶段。因而在普洛文化运动中当然且必然地体显着同样的景致。为着整个革命的胜利，争取广大群众就是当前迫切的课题。

过去，普洛文化运动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放弃了对群众的领导。迅速和坚决地改正这个错误，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过去的错误是把群众关闭在革命的门外，而非对那般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斗争太残酷太不客气，恰恰相反，对于这种人的斗争，我们时常犯了姑息与幻想。所以，目前的问题，是向革命的群众开门，绝对不是向上层分子尤不是向革命的贩卖手开门或调和。而是相反的必须加深对贩卖手的斗争，加深对不正确倾向的批判，才能领导群众朝向革命的康衢大道跑。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彻底肃清。

鲁迅要是因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而松懈对贩卖手的斗争，对不正确倾向作调和，这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五分轩轾，我们也必须肃清他。因为这是陷入了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

纵容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活跃，不断的批评他谬误，领导他走上正确的道路，结果，任你主观上怎样要希望小资产阶级来同情革命以至参加革命，实事会给你整个背道而驰的逆去。因为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他要成为一个革命的战斗员，只有在无产阶级坚强的领导

之下，不断的克服他模棱两可的动摇性，然后他才能稳固地站在革命方面来。

二

不幸的，在文化运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鲁迅先生这一封短信中(《文学月报》五、六期合刊鲁迅先生致编者的信)，没有一字一句提及这一重要问题，却“大可以不必”的覆勘地批评芸生的诗。我们姑不论“笑骂”与“辱骂”有什么分别，我们倒要问以绅士态度文质彬彬的写文章是不是就可以领导小资产阶级作家来同情普洛文化运动?是不是不能写出斯文道地的文章，就是“上海流氓的行为”就是“阿Q的战法”?我们以为这样向鲁迅先生提出问题，会使鲁迅先生的牙齿笑得脱落罢。理论争斗，那有这么简单的一回事，而且芸生所“辱骂”的，是“佩服”斯太林，“同情”托洛次基，“非常尊敬”克鲁泡特金，“即对于陈独秀邓演达也都觉得可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胡秋原，这有什么不可以?!

## 对鲁迅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2）

三

芸生的诗在我们看，他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诗中有“切西瓜”之类的句子，虽然并不比胡秋原的“人头畜鸣”“人类以下的存在”等更为无聊，然而正是鲁迅先生说的“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的缘故，我们也觉得这一类句子，不免过火一点。可是鲁迅先生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中国报纸看不出实话，“放火杀人”自然是诬陷。革命的工农确实没有吓人的鬼脸，这是对某一阶级同情者说的，对别一阶级即使你再斯文些，在他看来，无论如何都是吓人的鬼脸，向来早就把自己吓人的鬼脸来对付革命的工农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怕自己的脸孔被别一阶级的人看成吓人的鬼脸，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

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自然不是可怖的东西，但也决不是不流滴血，不费一分，所能成功的，在阶级尖锐底对立当中，在无产阶级进行他的肉搏当中，“见血”是不能避免的。正是为了人类的幸福，非把人类幸福的刽子手毁灭不可。空喊和平，这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误已经给列宁痛加纠谬了。因此，鲁迅先生的所云，我们觉得有着这方面的错误。

五

我们诗人不是风花雪月的歌咏者，而是阶级的战士。我们的诗人有的武器是健全的阶级意识，他在文坛上，就要用这种武器如同用枪刀一样来扫除文坛妖孽，以尖锐的词锋揭破穿着漂亮外衣的奸细；这种任务和战场上的战士的冲锋肉搏没有分别。鲁迅先生说“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的话，显然是把普洛文化运动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的诗人与斗争的实践分离。这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

鲁迅先生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这是对的，并且我们深深地感到以前我们进行的还不够，要多多地把论争发展和深入。然而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而且也无“笑骂”与“辱骂”的分别。只要问骂的适当否，并不是“丢那妈”就是辱骂，“叭儿狗”就是笑辱，纶巾羽扇的风度，“幽默”一类的射他耳，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才会善用的。(伊里奇在他许多理论著作上，尚且骂考茨基为“叛徒”)

说来伤心，鲁迅先生说的“诬陷，造谣，恐吓，辱骂”截至今天，身受的怕不是胡秋原一类的人，而是一身最好的先进战士，这想来鲁迅先生是熟知而不会忘掉的啊!

因此，仅提出我们的意见和鲁迅先生讨论如上：

首甲、方萌、郭沫若、丘东平，署名二月一日

(1933年2月上海《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1935年4月28日致萧军信。

## 鲁迅的狂吠

邵冠华①

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你看他战了许多将——成仿吾、梁实秋……等等；虽则他每战不一定是胜仗，然而他至少是有“战术”的。

在他每次笔战的时候，他一定埋伏了许多小将，——他手下的喽罗——等到对方有了答复，他手下的小卒便狂叫起来帮骂起来。他们的谩骂是不顾理论的，他们似乎在多次的谩骂里已感到一种满足，如他们的“老将”一样。

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

当鲁迅先生有兴趣谩骂人家的时候，他最喜欢派人家算是××主义——虽则人家绝对不是××主义——而加以重大的攻击，甚至把艺术家的“宣传品”当做“艺术品”，派人××主义之后，再加以攻击，于是鲁迅先生自以为是胜利了。我似乎看到一个露出黄牙的笑的影子。

但是，鲁迅先生的谩骂是有什么意识呢?读者们仅能感到一些滑稽罢!

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

(1933年9月上海《新时代》第五卷第三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南腔北调集•漫与》。

注：

①邵冠华，江苏宜兴人，“民族主义文学”支持者。

## 推荐者的立场

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

施蛰存①

万秋先生：

鲁迅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至于我呢，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此外，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大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不过，如果那征求是与“遗少的一肢一节”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妨寄给我。

看见昨天的贵报，知道你预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我不知能不能请求你取消这个计划。我常常想，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而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

去的瘦裁判，读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瘦裁判总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One，Two，Three……站不起来，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Mr．Xwinthechampion”。你试想想看，这岂不是太滑稽吗?现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演这滑稽戏了。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见今天《自由谈》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舌头是扁的，说话是圆的”，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吗?

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1933年10月19日上海《太晚报》)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准风月谈•扑空》。

注：

①施蛰存(1905一)，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浙江杭州人。

## 致黎烈文先生书

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

施蛰存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

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

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

施蛰存上(十九日)

(1933年10月20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准风月谈•答“兼示”》。

## 聪明之道

人①

鲁迅在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畴昔之夜，拜访世故老人于其庐：庐为三层之楼，面街而立，虽电车玲玲轧轧，汽车呜呜哑哑，市嚣扰人而不觉，俨然有如隐士，居处晏如，悟道深也。老人曰，“汝来何事?”对曰，“敢问聪明之道。”谈话有主题，遂成问答。

“难矣哉，聪明之道也!孔门贤人如颜回，选一隅以三隅反，孔子称其聪明过人，于今之世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尚非聪明之人，汝问聪明之道，其有意难余老聩者耶?”

“不是不是，你老人家误会了我的问意了!我并非要请教关于思辨之术。我是生性拙直愚笨，处世无方，常常碰壁，敢问关于处世的聪明之道。”

“噫嘻，汝诚拙直愚笨也，又问处世之道!夫今之世，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阶级不同，思想各异，父子兄弟夫妇姊妹因思想之各异，一家之内各有主张各有成见，虽属骨肉至亲，乖离冲突，背道而驰；古之所谓英雄豪杰，各事其君而为仇敌，今之所谓志士革命家，各为阶级反目无情，甚至只因立场之不同，骨肉至亲格杀无赦，投机取巧或能胜利于一时，终难立足于世界，聪明之道实则已穷，且惟既愚且鲁之徒方能享福无边也矣。……”

“老先生虽然说的头头是道，理由充足，可是，真的聪明之道就没有了吗?”

“然则仅有投机取巧之道也矣。试为汝言之：夫投机取巧之道要在乎滑头，而滑头已成为专门之学问，西欧学理分门别类有所谓科学哲学者，滑头之学问实可称为滑头学。滑头学如依大学教授之编讲义，大可分成若干章，每章分成若干节，每节分成若干项，引古据今，中西合璧，其理论之深奥有甚于哲学，其引证之广大举凡中外历史，物理化学，艺术文学，经商贸易之道，诱惑欺骗之术，概属必列，包罗

万象。自大学预科以至大学四年级此一讲义仅能讲其千分之一，大学毕业各科及格，此滑头学则无论何种聪明绝顶之学生皆不能及格，且大学教授本人恐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难学也可想而知之矣。余处世数十年，头顶已秃，须发已白，阅历不为不广，教训不为不多，然而余着手编辑滑头学讲义，仅能编其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一项也。此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一项其纲目为‘顺水行舟’，即人云亦云，亦即人之喜者喜之，人之恶者恶之是也。举一例言之，如人之恶者为孝子，所谓封建宗法社会之礼教遗孽之一，则汝虽曾经为父侍汤服药问医求卜出诸天性以事亲人，然论世之出诸天性以事亲人者则引‘孝子’之名以责难之，惟求青年之鼓掌称快，勿管本心见解及自己行动之如何也。被责难者处于时势潮流之下，百辞莫辩，辩则反动更为证实，从此青年鸣鼓而攻，体无完肤，汝之胜利不但已操左券，且为青年奉为至圣大贤。小品之集有此一篇，风行海内洛阳纸贵，于是名利双收，富贵无边矣。其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二项为‘投井下石’，余本亦知一二，然偶一忆及投井下石之人，殊觉头痛，实无心编之也。然而滑头学虽属聪明之道，实乃左道旁门，汝实不足学也。”

“老先生所言想亦很有道理，现在社会上将这种学问作敲门砖混饭吃的人实在不少，他们也实在到处逢源，名利双收，可是我是一个拙直愚笨的人，恐怕就要学也学不了吧?”

“呜呼，汝求聪明之道，而不学之，虽属可取，然碰壁也宜矣!”

是夕问道于世故老人，归来依然故我，呜呼噫嘻!

(1933年11月24日《申报》增刊《谈言》)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准风月谈•后记》。

注：

①人，即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太阳社成员。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脱党。

## 给鲁迅的公开信

杨人

鲁迅先生：

读了李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笔名)的《读伪自由书》一文，近末一段说：

“读着鲁迅：《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这末一句照原文十个字抄，一字无错，确是妙文!)不禁令人起了两个感想：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先生的“旁边”那里来的“早变心了魏延”?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

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记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时候(大概总在十年前)，我拜读之后，景仰不置，曾为文介绍颂扬，揭登于张东荪先生编的《学灯》，在当时我的敬爱先生甚于敬爱创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语丝》上先生为文讥诮我们，虽然两方论战绝无感情，可是论战是一回事，私心敬爱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绪与

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到了拜读大著《两地书》以后为文介绍，笔下也十分恭敬并没半点谩骂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头却有所误会似地顺笔对我放了两三枝冷箭儿，特别地说是有人攻击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没有觉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没有攻击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认为是老了吧。伯纳萧的年纪比先生还大，伯纳萧的鬓毛比先生还白如丝吧，伯纳萧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这样就以为老了呢?我是从来没感觉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觉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读了李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讶，原来先生真的老了。李先生因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态的时候有过的情绪，我虽然也时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亲，但并没有如人家攻击我那样地想做一个“孝子”，不过是天性所在有时未免兴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联想到我的父亲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讶。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来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第二个感想使我……因为那是李先生的事，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这信是先生觉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话，就请寄到这里《文化列车》的编者将它发表，否则希望先生为文给我一个严正的批判也可以。发表的地方我想随处都欢迎的。

专此并竭诚地恭敬地问了一声安好并祝康健。

杨人谨启一九三三，一二月，三

末了附带声明一句，我作这信是出诸至诚，并非因为鬼儿子骂我和先生打笔墨官司变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人又及。

(1933年12月上海《文化列车》第三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南腔北调集•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 骂人与自供

王平陵

学问之事，很不容易说，一般通材硕儒每不屑与后生小子道长论短，有所述作，无不讥为“浅薄无聊”；同样，较有修养的年轻人，看着那般通材硕儒们言必称苏俄，文必宗普鲁，亦颇觉得如嚼青梅，齿颊间酸不可耐。

世界上无论什么纷争，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类思想的冲突，因为多半是近于意气，断没有终止的时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毁谤人家故意找寻人家的错误当作是一种职业；而以直接否认一切就算是间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于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只许他们自己知道，别人是不准过问的。其实，有时候这些人意在对人而发的阴险的暗示，倒并不适切；而正是他们自己的一篇不自觉的供状。

《圣经》里好像有这样一段传说：一群街头人捉着一个偷汉的淫妇，大家要用石块打死她。耶稣说：“你们反省着!只有没有犯过罪的人，才配打死这个淫妇。”群众都羞愧地走开了。今之文坛，可不是这样?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如同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骂人的代表官方说话；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么“方”说话!

本来，不想说话的人，是无话可说；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鲁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了。

像这样的情形，文坛有的是，何止是鲁迅先生。

(1933年12月30日上海《大美晚报》副刊《火树》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准风月谈•后记》。

## 鲁迅与托派

少离①

在中国文坛上，无人不知有鲁迅翁，鲁迅翁之能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本刊早有过比较详细的露布。兹就他的生活近况来说一说，特别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想定为读者所欢迎吧?

人都以为今天的鲁迅，是个共产党。是个赤匪第一流的应声虫，这些话，都是对的。然而，我们更深一层的追究下去，鲁迅在共产党内，是属于那一派呢?这一问题是很有趣的。我们曾经访问过许多作家，也曾经晤见过许多灰色以至半赤色的朋友们，经过了好几个月，直至今天。我敢负责的报告读者，鲁迅翁的政治关系，确是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一员。

用不到惊奇，只要稍稍知道，或领略过鲁迅翁的凌人放傲，目无旁人的“幽默”之气的，都可以下个预言，他必然会走这一条托派——即左派反对派——的路。这条路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所谓，“左了还要左，赤了还要赤”。同时，正和托派的仁兄，所说的一样，他们是毫不走样的列宁真种。而他们那理想之玄妙辉煌是个无上的乌托邦，在那穷极无聊，烟雾醉人，独个儿伏在亭子间里，幻之又幻，想而复想的时候。那确是最高妙的境界。然而，这般普罗的文人，他们自己幻想着，还要表示他们的英雄主义，以自欺而去欺骗一般意志薄弱者，愚蠢无知的工人。

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已如上述。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这谁都已经知道了的，托派自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捕后，虽只有残灰，而因不为人所注意之故，年来已由残灰复活了。鲁迅翁由反左联而投降左联，为的是“争第一把交椅”，还言之，就是被领袖欲所驱使。鲁迅在共产党文总内，曾负过一个时期相当重要的责任。但共产党内的斗争，尝使这位老翁“生气”。鲁迅翁遭受了布尔什维克铁面无情的滋味，而且他在

干部派下，决难有开展的希望。所以他在几度离合之后，便与干部解缘(?)了。一边解缘，一边自然就有人在拉啦。要在残灰中做个领袖，是比较容易的，鲁迅翁便改唱托派的论调了。

(1934年4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二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注：

①少离，作者不详。

## 内山完造底秘密

天一①

“在殖民地的宗主国商人，没有一个不像强盗一样凶恶，贪鄙，残忍，奸诈”(罗曼•罗兰)。中国虽然还不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在中国的日本商人，早已以宗主国自居了。因此，在中国的日本商人，也不免如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凶恶，贪鄙，残忍，奸诈了，而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尤其是凶恶，贪鄙，残忍，奸诈之尤者!

内山完造，他是日本的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署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来，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是因为他的狂嫖滥赌(他很喜欢赌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化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秘密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这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四川路与北四川路开设漂亮的支店了。

内山完造的手段是很巧妙的，他以“左”倾的态度来交结中国共产党及左倾人物，一方面，可以从这些左倾人物中取得重要的情报；另一方面，借“左倾”的掩护，来进行他的间谍工作。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的一只最好的猎犬。那时候，日本外务省曾召他回去垂询一切，但又恐怕来去太露骨了，所以他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由上海领事馆加以“捣乱”的罪名，把他“押送”回国，而实际上是“护送”回国。他在日本的任务完毕以后，又回到

上海来了。现在，据说他的内山书店要到南京去设分店去了，这不是他的业务的发展，而是他的间谍机关的扩大。

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且介亭杂文•运命》。

注：

①天一，作者不详。

## 鲁迅愿作汉奸

思①

鲁迅之作文字也，非一定欲变作共产党口吻，徒以左倾既成时髦，赤色作品更能卖钱耳，初固不虞政府之对彼不客气到底，根本毁灭其作品也，鲁迅至此始感大窘，成为进退失据，且版税稿费全部打消，连一家八口生活都成问题，穷思竭想，居然想得一法。盖彼之诋毁政府，本靠之向共产党易钱，不过共产党自身且在捕捉之列，不能予彼保障，如转而作汉奸，则日本之搜罗破坏中国现政府者，其迫切固不亚于共产党，，且金钱报酬更高，况乎还有保障。因此鲁迅即搜集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以视申报自由谈之十洋一千，更相去几倍矣。现此书已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中国官厅格于治外法权，果然无如之何，闻鲁迅此技一售，大喜过望，已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将此期以此等作品供给出版，乐于作汉奸矣。

(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且介亭杂文•运命》。

注:

①思，作者不详。

## 给鲁迅的信（1）

徐懋庸①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惟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

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 给鲁迅的信（2）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太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

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转引自《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对此文的反驳见《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注:

①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左联”作家，著有《打杂集》等。

## 还答鲁迅先生（1）

徐懋庸

因为贫和病，回到偏僻的乡间困居了多时，每日只看一份和出版的日子已隔四五天的《申报》，别的读物，则一点也找不到。因此，看到八月十六日登在《申报》上的《作家》的广告，已是二十日。至于看到一个朋友寄来的，那登着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这一万言长文的《作家》的时候，则又隔了五六天了。

看完了鲁迅先生的“万言长文”，心里很踌躇了一会，本来觉得也可以默尔而息。但又觉得这一回鲁迅先生实在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倘不辩明几句，倒显得我是“唾面自干”了。所以终于决定要还答几句。

我是八月一日下午离开上海的，这日的前夜，收拾行李既毕，坐着想想上海文艺界的种种现状，很有点感慨；同时也想到了鲁迅先生。本来我是早想写封信给他谈谈统一战线问题的，早些日子总是因为忙于他事，写不成，于是这夜就匆匆的写好。次日早晨寄出——这就是鲁迅先生公布在《作家》上而作了答复的。

这信，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而且是只对鲁迅先生个人负责的一封私信，并不如鲁迅先生所武断那样，是我准备请他发表的“作品”，更不是鲁迅、什么“有计划的”“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鲁迅先生这回完全是“诬枉”。未得发信人的同意，而公布其私信，藉以引起多人的恶感而相威胁，这种“恶劣”的“拳经”的出手，在鲁迅先生，好像还是第一回。

我的寄私信给鲁迅先生，并不是无端的事。一则，我和先生是曾经有过互通私信的因缘的；二则，这回的一点主要的意见，是我要和先生讨论而未便公开为文讨论的，所以只得在私信中对他说。

但到了现在，鲁迅先生既已断定我为一个“卑劣的青年”，那么对于我的私信，自然也没有直接回复的情谊。这一层，我倒并不以为是

意外的事情。我记得鲁迅先生在《白莽遗诗序》里说到，白莽这青年倘不早死，鲁迅先生会不会终于跟他闹翻呢，这连先生自己也说不定。这话分明地说明着鲁迅先生的性格。我在文艺界抗×统一战线问题发生以前，虽也曾蒙先生相当的青眼相看，但我既然活到现在，还没有像白莽那样的死掉，那么为了对于一个问题的意见稍有不合，就会被先生公开判为卑劣，施以打击，乃是必至的事情。这真是“倘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呵。我是只差在半年前不死掉，所以终于在鲁迅先生这块试金石之前显出卑劣来了。不过，我对于先生，虽然向来十分敬爱，却并没有一味要博取他的好感的意思，所以，在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不愿意与先生苟同，要进言的时候，我就直率地进言，因为进言逆耳而碰壁，那我就摸摸头皮，忍一忍痛，不介意的。

## 还答鲁迅先生（2）

这回使我非常惊异的是，第一，鲁迅先生竟有那样的魄力，把许多不应公开发表的言语公开发表出来。因替胡风辩护而把左联里面的人事尽情暴露，同时也证实了我和左联的关系，这种魄力，是惟鲁迅先生所独有的。但与“告密”自然不同。我就是因为没有这种魄力，所以问题涉及了左联之类时，就只敢写私信讨论。即如关于胡风的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的“诈”，我虽然知道许多确凿的事实，但因这些事实也不合使尽人皆知，所以也不在公开的文章中说起。鲁迅先生不知道这些事实，或者知道而情形不同，就以为“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胡风的拥护统一战线的“业绩”了。但是，鲁迅先生假如对于这些事实，也有“姑妄听之”的意愿，我仍可在私信中奉告的，至于公开地在杂志上乱说，却要请原谅，我始终没有这种魄力。

其次，使我惊异的，是鲁迅先生的这回的“糊涂得可观”。“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极通常的情理。是我写的私信，无论“恶劣”到怎样，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但是鲁迅先生却要株连，诬及我以外的“他们”。这“他们”是那些人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信该叫什么人来共同负责。即在别的事情上，我也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罢了。自己署名的事情，是自己个人负责的。偶与什么团体发生关系，也只是因为赞同其原则，而作为一个简单的工作者。譬如“文艺家协会”罢，虽然我是一个会员，后来也被选为理事，却尽力甚少。发起人并不是我邀集的，章程并不是我起草的，成立以前我既然没有决定一件事，自从当了理事之后，又因两次离沪，只参与过首次理事会，至今丝毫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样的迹近怠工，我正自觉歉然，不料鲁迅先生竟会无端指我握着什么“领导权”，在“包办”着什么。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关于这一层，先生可以去问问茅盾先生。

我所惊异的第三点，是鲁迅先生这回“罗织人罪，戏弄威权”的“横暴”之甚。我这回的罪名，本来至多不过是“教训鲁迅罪”，及“攻击鲁

迅的朋友巴金，胡风，黄源罪”罢了。但是，鲁迅先生却把田汉周起应等的行为，《社会日报》的文字，一起拉扯出来，搁在我的头上。一则曰：什么“覆车之鬼”“附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再则曰：“徐懋庸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好像我和田周是一系，《社会日报》的文字全是我做的。我和田周的关系，这里也不说。至于小报，的确有两个我跟它发生过关系。一是《世界晨报》，我曾自愿地做过一个月的社评，一是《时代日报》，由于估计上的错误，我曾做过两个礼拜的《漫谈》，(都不是什么“嘁嘁嚓嚓”的文坛消息)后来一定不愿做了，就被该报天天攻击。这都是去年的事了。至于《社会日报》，除了应曹聚仁先生之命，做过一两篇所谓“星期论文”之外，我可与之绝无关系。鲁迅先生借此来打击我，真是所谓“含血喷人”!还有呢，我不过说到黄源的“谄”，鲁迅先生却诬我是攻击《译文》，我不过说跟胡风他们本来可以在同一原则上，邀集有关系方面，评定双方的倾向的曲直，而“实际解决”文艺界的纠纷，鲁迅先生却诬我是要把胡风他们“充军”“杀头”。还有呢，鲁迅先生说我是什么“奴隶总管”，“倚势”，“骄横”，“横暴恣肆”，“以鸣鞭为唯一业绩”，“抓到一面旗子，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我的那封私信的寥寥千余言，难道竟包含着这许多罪状么?还有呢，鲁迅先生又怀疑我是“敌人所派遣”——呜呼，在这样的罪状下面，倒是我该先被鲁迅先生这面“充军”“杀头”了!

## 还答鲁迅先生（3）

现在头既未杀，且再来说几件事实吧。

上面已经声明过，我写给鲁迅先生的那信，只是一封私信；因为是私信，所以拉扯了许多人，信口雌黄了一通，只是等于私人的闲谈。身非阮嗣宗，“口不否臧人物”的美德的确缺如，私下褒贬别人的事，是常有的。即如鲁迅先生在私人谈话和私信中，也常用简单的评语，议论他人一样。鲁迅先生公开他和景宋先生的《两地书》时，曾把其中的许多人名改掉，声明曰：“此无他，或者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这一条例，对于我这样的人似乎并不适用。我的私信中拉扯到胡风巴金黄源诸位，经鲁迅先生一公开，使诸位知道我在背后作这样的私议，在我是不免有点惶恐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安，因为那些本是我心中所有的话，只是本不打算公开告人的而已。不过我在这里承认：“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一语，实在说得太笼统，这是应该向别的许多并不卑劣的安那其主义者道歉的。

我和巴金胡风二位，虽也识面，也说过话，却并无私交，说不上“私人的恩怨”，所以也并非“私敌”。我和黄源则是很熟的相识，有一时候，也曾忝居他的“兄阶级”的朋友之列，关于他的“谄”状，我是有许多事实可说的，但这却是毫无公开的必要。至于我在给鲁迅先生的信中攻击到他，则因他有一件和统一战线相关的“卑劣”的事，使我时常不满。原来“文艺家协会”的发起，最初本有黄源在内的。我曾亲自听他说，他从傅东华和沈起予那里接受了一张发起人的名单，上面有二三十个人的姓名，有许多要待他去接洽，不料隔不多时，不知为了什么，手掌“文协”发起人的名单的他，忽而变成“文协”的积极的破坏者了。(后来我听说这是他和巴金商议的结果，因此我对于巴金也有点莫名其妙)此公的反复乖张，于此可见。其时他还有宣达鲁迅对于沈起予的不满，(为了周文的《山坂上》的问题，)并因此退还为《译

文》特约的沈起予的译稿的事，(见沈起予登在《每周文学》上的《麻烦账》)这才真是所谓“以鸣鞭为业绩”啊!

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现在是鲁迅先生出来承认有一个是他所提的了，而且还是经过和几个人商议过的，“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自然，像鲁迅先生所夸示的那种巨头会议，我怎么配“参加议讨”呢!不过，我倒并不觊觎这种荣耀，我一向是只要是同一阵营的人，不管谁是发起的事，拣我认为正当的就做的。若是巨头们的决议，而我有所怀疑时，我也是要质疑的。

## 还答鲁迅先生（4）

鲁迅先生决定了一个口号，叫胡风先生作文提出来。但我并不知道胡风就是“鲁府的‘奴隶总管’”，况且连鲁迅先生也承认胡风所做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那么，事后我向胡风提些质疑，总也算不得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罢。关于这问题，我只做过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光明》上，都写得心平气和，绝未“轻易诬谄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然而鲁迅先生偏要诬枉我有此事实，因而“轻易”判定我是“宗派的”“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以至有“敌人所派遣”的嫌疑。所谓“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者，岂不是先生自己的这种行为么?

再说些关于“宗派主义”的“行帮”话罢。第二次“文协”发起时，有人曾请鲁迅巴金胡风黄源……等诸多人共同做发起人，但是除了鲁迅先生有一个回信之外，余人都置之不理，后来发起人会又去函征求他们做基本会员，他们又置之不理。直到后来，他们才自成一“帮”，以“文艺工作者”的团体而出现了。试问在这样的事实上，到底谁是“宗派”的，谁是“行帮”的?

但鲁迅先生已分明说着，他之所以不加入“文艺家协会”，是因为这里面有“徐懋庸”式的青年在内的缘故。好了，现在徐懋庸已经被鲁迅先生公开地判为“恶劣”，怀疑为“敌人所派遣”，并且咬实了与左联的关系，事实上已不能再做什么事情了，我就趁此“奉”鲁迅先生的“谕”而退出“文协”罢。我希望鲁迅先生再公布手谕，谁当逐出，谁当加入，然后自己也去加入，使“文协”无一“徐懋庸式的青年”而成为健全的抗×统一战线组织罢。先生的加入与否，我看并非“却非重要的事”。

最后，我只得再说一说鲁迅先生的言行，“助长恶劣的倾向的问题”。这问题，是要看胡风他们的半年来的倾向的评价而定的。倘若他们的倾向实在是“恶劣”的，那么鲁迅先生的“助长”之迹，从这回的信

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倘是良好的呢，那么鲁迅先生当然也是“助长良好的倾向”的了。

鲁迅先生这回企图通过我的身上打击大批的青年，在他的特别出奇的“拳经”之下，我的受伤当然是很重了。我要长久的躺倒来，内省一下，自己的罪孽是否实在那样深重?并且也要仔细看看鲁迅先生所说的大批“徐懋庸式的青年们”，(我虽然不知他到底指定是谁们，但想来总不外是文艺家协会中的分子，)是否跟我一样的“卑劣”?为鲁迅先生的“威严”计，我是宁愿发现一切真是如他所说的那样的。不过如果真是那样，则足见两间之正气，一贯的真理，实为鲁迅先生独占得太多，而青年们分有得太少，这在鲁迅先生，当然是光荣的，但对于中国，恐怕也是“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罢!

八月二十六日

(1936年9月20日《今代文艺》(月刊)(上海)第一卷第三期)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1）

胡适①苏雪林②

胡适雪林女士：

谢谢你十一月十八日的长信。我十二月一日到上海，十日回家，昨晚(十一)始得捡出细读。

你自称疏懒，却有此豪兴，有此热诚，可佩之至。

关于“独评”，你的过奖，真使我愧汗。我们在此狂潮之中，略尽心力，只如鹦鹉濡翼救山之焚，良心之谴责或可稍减，而救焚之事业实在不曾做到。我们(至少可说我个人)的希望是要鼓励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话。这是一种根本治疗法，收效不能速，然而我们又不甘心做你说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也许是不会做，——奈何!奈何!

鲁迅此事当时时放在心上，当与一班朋友细细谈谈，也许能做到更积极一点。

关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左倾是一事，反对政府另是一事。我觉得政府的组织若能继续增强，政府的力量若继续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也不足虑。我在北方所见，反对政府的势力实占极小数。其有作用者，虽有生花的笔舌，亦无能转变其分毫。其多数无作用者，久之自能觉悟。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

我总觉得你和别位忧时朋友都不免过于张大左派文学的势力。例如韬奋，他有什么势力?你说他“有群众数十万”，未免被他们的广告品欺骗了。——《生活》当极盛时，不过两万份。邵洵美如此说。

“叛国”之徒，他们的大本事在于有组织。有组织则天天能起哄，哄的满城风雨，像煞有几十万群众似的。

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

你看了我的一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没有?(《论学近著》)我对付他们的态度不过如此。这个方法也有功效，因为是以逸待劳。我在一九三○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写到这一页，我心里暗笑，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果然，叶青等人为这一页文字忙了几年，我总不理他们。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2）

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Landon来打Roosevelt，有人说：“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关于鲁迅，我看了你给蔡先生的信，我过南京时，有人说起你此信已寄给他了。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深，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原文即为□——汇编编者)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私，想能蒙原谅。

我回家已几日了，匆匆写此信，中间又因张学良叛国事，心绪很乱，时写时停，定多不贯串，请你莫见笑。匆匆问好。胡适一九二

五，十二，十四〔附〕

苏雪林致胡适原信

适之先生：

自民国二十一年在珞珈得觌尊颜，并承雅教，流光容易，又过去几年了。这几年里虽然时常想念先生，但总没有片纸问候，我的疏懒自问真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只有希望先生勿加罪责。

近读报纸，知道先生即将回国，我有几个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问题，愿意提出和先生谈谈，望先生不弃，能够给我一种正确的指示。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3）

第一是关于《独立评论》——以下简称“独评”——态度的问题，谈到“独评”，我个人有一点感谢之私，不能不趁此一为表白。“九•一八”之后，外患日深，灭亡之祸，迫于眉睫，不愿当亡国奴者都感到救国责任之不容推诿。我们虽都是仅能摇摇笔杆的朋友，力量非常微弱，但救国的力量本是由一点一滴集合而成的洪流，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但问题就来了，我们怎样运用笔杆的力量呢?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努力不落空虚，甚至爱国者反而祸国呢?于是我们感觉到摇笔杆之前，应先决定思想态度。我们的思想态度又是应当跟著中国出路走的，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先将中国出路问题研究一番。前几年，左派在中国很得势，宣传品也非常之多，他们百变而不离其宗，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向左转是中国惟一出路。我有一种民族自尊心，觉得中国问题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必跟著时代潮流乱跑。但前几年政府态度不明了，抵抗的决心也不充分显露，不但一般青年感觉万分苦闷而向左转，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曾不由自主的发生动摇。幸而有先生办的“独评”这样刊物，作为我们的精神粮食，我们渐渐明白中国是有办法的，只要能统一，能现代化。于是我的思想态度才逐步稳固起来了。我今日之没有同一般青年走入歧路，可说全属“独评”之赐，我想同我一样受“独评”之赐的人还多呢。

“独评”持论稳健，态度和平，是近年刊物中所少有的。对于中国内政外交各方面也常常有宝贵的意见贡献。年来中国建设之日有成功，政治之渐上轨道，国际舆论之大有转移，谁都承认“独评”尽了很大的推动力量。不过“独评”的态度因过于和平，持论因过于稳健之故，色彩未免不甚鲜明。我们读这样刊物固能领略其中好处，青年人便有点难说。况且现在所谓反动刊物，其所有言论无不慷慨激昂，有光有热，极鼓舞读者精神之能事。青年读惯了那样文字，再来读“独评”，无怪有不能“过瘾”之感了。从前政局不稳，左派势力太大，“独

评”那时提出鲜明主张，必致为恶势力所摧毁，现在中国已统一，政府威权日渐巩固，青年对于政府也似乎生出较多的好感，“独评”这时候说话，一定比从前易入他们之耳。我想“独评”态度似如再明朗化积极地一点，效果一定更大。譬如“独评”最近两期所登君衡先生的中苏关系，张印堂先生的蒙古的位置关系在我国防上的重要，言人之所不敢言，足以打破青年迷信共产主义和崇拜苏联的大梦。我所谓明朗化积极地者即指此而言。像这类文字，我以为以后不妨多登些，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第二是关于我们怎样从左派掌握中取回新文化的问题。五卅以后，赤焰大张，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较闻名的作家无不沾染赤色思想。他们文笔既佳，名望复大，又惯与出版事业合作。上海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几个老招牌的书店以外，其余几乎都成了他们御用出版机关。他们灌输赤化从文学入手，推广至于艺术(如木刻、漫画)戏剧电话等等，造成清一色的赤色文化；甚至教科书的编制，中学生的读物，也要插进一脚。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4）

他们又抱了只问目的不讲手段的宗旨，必要时什么不光明的手段都可使出。好像他们从前高唱工人无祖国，现在也来什么“国防文学”了；从前只讲阶级斗争，讳言民族利益，现在也有什么“民族解放”、“民族战线”，连着信煞尾都要来个“民族敬礼”了。先生等在五四时代辛苦造成的新文化，被他们巧取豪夺，全盘接收了去，自由享用，不但不感谢先生，还要痛骂先生呢。先生恬淡为怀，高尚其志，本不屑同这些人争夺什么“思想领袖”、“青年导师”的头衔，不过目睹千万青年纯洁的心灵，日受叛国主义(君衡先生语)的熏染，能不痛心?现在政府虽还不合我们理想的标准，但肯作平心之论的人，都承认她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她有不到处，我们只有督责她，勉励她，万不可轻易就说反对的话。我读先生著作，知道先生对现政府的态度，正是如此。我们现在谁都希望这一盘散沙的民众和漫无纪律的国家中，能产出一种强大的中心势力，利用这势力，内以促现代化之成功，外以抵抗强敌的侵略。要是一国之中最富活力的青年与政府站在相反的地位，并常以毁灭这中心势力为企图，则中国好容易储蓄出来的一点实力，又将因互相乘除而等于零，先生一番拥护现政府的苦心岂不白费了么?中国若真非向左转则没有出路，则左派的理论，我们不能限制青年接受，左派文化的控制权，我们也不容干涉，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我们分析左派宣传共产主义的动机，爱国成分少，争夺私人权利的成分反而多，我们为什么将我们所托命的国家供给他们儿戏呢?我们如何能坐视无数可爱的青年作为他们牺牲品呢?

第三是关于如何矫正目前流行的浅薄而谬误的救国理论问题。左派造成了清一色的赤色文化之后，在这国难时期又提出许多救国方针。他们所出刊物多如雨后春笋，我也记不清许多。只知他们谈国际问题的有《世界知识》，谈内政和普通社会问题的有《生活星期特刊》，两者都为青年所热烈欢迎。前者我尚未注意，后者则我差不多

期期寓目。《生活星期特刊》主论人为邹韬奋，这是我的一个熟人，也是先生所认识的。八九年前他在上海办《生活周报》，反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见识虽不甚高明，倒也算得比较纯正的民众读物。“九•一八”前后，他因为受了上海左派的包围，思想渐渐改变，大有左倾趋向。所办“生活”以言论过于激烈，被上海市政府查封。韬奋出洋，他的朋友杜重远、金仲华等接办《大众生活》与《永生》，继续发表偏激言论，均不久夭折。韬奋回国后在香港办《生活星期周刊》。大约为了出洋一趟，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又同左派友人隔离，头脑似乎清醒多了。在这个时期里他所发表的议论已不大反对政府，并提倡“救亡联合战线”；希望政府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对付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5）

当鲁迅、茅盾等在上海闹什么“国防文学”与什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韬奋好像颇不以他们为然，屡次指摘他们“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近年他因香港航运不便，将所办刊物搬回上海出版，重新落于左派陷阱之中，思想又趋反动了。“救亡联合战线”变为“人民阵线”了。韬奋这位大爷是有点不学无术的。——换言之，即是没有头脑，他的学问不及梁任公万分之一，但任公少年时代的坏处，无一不备。正如严又陵对任公的批评“于道徒见一偏，而出言甚易，其笔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他以过去历史关系，拥有群众十数万，左倾之后，又吸引了无数青年——大中学校的学生于邹等所办刊物，几于人手一编——其一举一动，俨然成为一种势力。

韬奋等人一谈到中国和日本的问题，便高唱“抵抗”或“抗战”，大言炎炎，颇足动青年之听，至于中国实力究竟如何，政府准备究竟充分与否，却从不过问。他们的口号不外组织“人民阵线”和立刻发动“整个民族救亡运动”。但具体方案，至今尚不见提出，并且在这两个好听口号之下，似尚含有“叛国”阴谋呢。

左派从前最喜谈“农民英勇的抗争”，近来又喜谈“大众力量”。“生活”号的同志们也最欢喜借“大众”为鼓吹，他们所提倡的“人民阵线”和“整个民族救亡运动”都是在“大众”两字上翻来覆去做文章的。在他们心目中“大众”好像是一尊千灵百应救命王菩萨，我们只须将这尊菩萨抬出，敌人便望风而逃了。救国的大任，当然不是政府当局几个人所能担负，当然需要四万万人一致的努力，但军备的准备没有整齐；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没有达到现代化的目的；所有的力量不能配合在一起，让政府运用自如，虽有几十万万的“大众”也不能干出什么?我怕人多反而更乱哩。但庸俗的民众和无知的青年受他们浅薄而谬误的理论所麻醉，众口附和，雷同一响，恨不得“大众菩萨”立刻显灵，好即日和日本宣战，进兵收复失地，即知识较高的大学

生也多有作此想者，说来真未免可笑而复可怜了。我以为先生对于这类刊物不可不注意，对于他们的理论，应当随时加以矫正。先生说话是最有力量的，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望先生毅然肩起。

第四是关于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谁都知道中国花费巨大牺牲的代价，好容易造成今日统一的局面，仅存的元气，决不容再受斫伤。反动的势力多酝酿一分，则目前局面的动摇性增加一分，所以“鲁迅宗教”的宣传，政府方面似乎不能坐视。

## 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6）

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在这里，我要套吴稚晖先生的口吻大声疾呼道：“宁堕畜道而入轮回，不忍见此可悲现象!”我想先生也有同样的愤慨吧。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但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看看里面是怎样一包粪土，免得他们再受欺骗。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但几个我素所投稿的刊物的编辑人，一听我要反对鲁迅，人人摇手失色，好像鲁迅的灵魂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吃了他们似的。一连接洽三四处都遭婉谢。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我现在很想借“独评”一角之地，发表我反鲁的文字，不如先生允许否?希望能够给我一个确实的答复。如蒙允许，我便开始写作，否则，只好暂时忍下这口不平之气，让将来别人来批评他吧。阅报见此次鲁丧，蔡孑民和马相伯先生均遭鲁党利用，甚为惋惜。我曾拟就致蔡先生长信一通，以作谏诤。兹将信稿寄先生一阅，如此为可，即将发出。(下略)

敬祝

健康

苏雪林十一月十八日

(1939年3月1日《奔涛》第一期)

注：

①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安徽绩溪人。

②苏雪林（1899～），安徽省太平人，曾任职于东吴大学，后移居台湾。

##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1）

苏雪林

孑民先生道席：

昔在里昂，曾瞻□范，前于鄂渚，又侍麈谈，维躬康鬯，颐养冲和，长扶大雅之轮，永为多士之范，为欣为颂。比者鲁迅在沪逝世，鲁党推先生主持其葬仪，上海各界成立鲁迅纪念会，又推先生及宋庆龄女士为筹委，方将从事盛大宣传。先生太邱道广，爱才若渴，与鲁迅旧谊颇深，今为之料理身后诸事，亦复分可当为。顾兹事虽小，关系甚大，林窃有所见，不得不掬诚为先生陈之，幸先生之垂听焉。

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击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之勾结者之代言人。青年憎恶之对象屡变，则鲁迅笔锋所周纳之“正人君子”罪状亦鲁迅屡变。后又推广其攻讦之范围，以及胡适先生，曰“高等华人”，曰“伪学者”，曰“王权拥护者”，曰“民族利益出卖者”，曰“杀戮知识阶级之刽子手”，甚至深文曲笔，隐示其为“汉奸”，为“卖国贼”，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正人君子”及胡适先生在鲁迅“信手枭卢喝成采”神技操纵之下，体无完肤矣。青年对彼等之信仰完全失去，且随鲁迅而狺狺吠其后矣。夫女师大风潮，曲直谁在，为公所知，借曰直在鲁迅，而曲在“正人君子”，计亦非不共戴天之仇，引绳批根，至十余年而不已，果胡为者？且胡适先生从未开罪于彼，徒以与其所怨之“正人君子”接近，又以学问名望，较彼为高，

足以撩其妒恨，是以烹老鼋而祸枯桑，连胡先生一并卷入旋涡。似此褊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岂惟士林之所寡闻，亦人类之所罕睹，谓其心理非有甚深之病态焉，谅公亦难、论鲁迅书首肯。今日青年崇拜鲁迅，有类疯狂，读其书而慕其为人，受其病态心理的熏染，必将尽化为鲁迅而后已。夫青年者，国家之元气，民族之命脉，而亦先生所爱惜珍护，逾于头目心肝者也。过去之青年，受鲁迅人格之感化，堕落者已比比然矣，现在，未来，尚有无量数天真纯洁之青年，亦将成为褊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人，岂先生之所雅愿者哉？先生从事教育事业，本欲青年皆成为健全之国民，今先生四十年努力之所不足者，鲁迅一书败之而有余，天下事之可以太息痛心者，又宁有过于是哉？

##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2）

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然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观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乃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引导青年奋斗，人格矛盾如此，果何为哉？则曰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耳，为名焉耳。今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一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或谓鲁迅讽刺文笔之佳妙，不如肖伯纳，而口唱社会主义，身拥百万家财之一点，则颇相类（见一九三三，二，十七《大晚报》社评），谁谓其言之无所见耶？彼在上海安享丰厚之版税稿费，又复染指于政府支配下之某项经费。染指则亦已耳，乃又作《理水》小说，痛骂文化城之学者，以示一己之廉洁，欲盖弥彰，令人齿冷。其人格之矛盾，言之几不能使人置信，然则所谓文化大师者固一如此色厉内荏，无廉无耻之人物也！鲁迅之为人，又复好谄成癖，依傍门墙者，揣其意旨，争进谀辞，所谓“青年导师”、“思想界权威”、“革命斗士”、“民族解放战士”、“中国肖伯纳”、“中国高尔基”、“东方尼采”各种徽号，不可以屈指数；此风传播，报章杂志，语及鲁迅，必有一段滥恶不堪歌功颂德之词，读之殆欲令人胸次格格作三日恶。身死之后，颂扬尤烈，甚有尊之为“中国列宁”者。王莽篡汉，吏民上书者四十八万；魏忠贤秉政时，生祠遍天下，配飨孔庙，林昔读史，常窃耻之，不图今日乃躬逢此盛也！窃尝谓中国政界固多争妍取怜之风，文坛亦有奔竞之习，然今日青年之于鲁迅，几于鲁迅顰而顰，鲁迅笑而笑，鲁迅喷嚏而亦喷嚏，则诚过去文史所少见。然青年则何知，是皆鲁迅好谄之念所造成耳，盖鲁迅盘踞中国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

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嗾其羽党，群起而攻，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一蹶而不复振。文网之密，不啻周来之狱，诛锄之酷，逾于瓜蔓之抄，正士钳口以自保，民众敢怒而不敢言，然后鲁迅乃得巍坐文坛，成为盟主，发纵指使，为所欲为，气焰之盛，至今文人语及，犹有谈虎色变之慨，先前威棱，可以想见。盖彼以劣迹多端，惧人摘发，又虚荣心极炽，欲长据其所谓“金交椅”者，非此则不能自保，且名位愈崇，愈可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用以吸收青年之信仰崇拜，果也，名利双收，生荣死哀，“世故老人”可以含笑地下矣！

##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3）

鲁迅固以反帝战士自命者也，而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主义独无一矢之遗。且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其赠日友携兰归国诗云“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痛恶故国，输心日本之隐情，跃然纸上。反帝之人乃与我国大仇如斯亲昵，此虽鲁党亦百喙不能为之解者也。或曰鲁迅所反对者日本帝国主义耳，与私人友谊何与？然林闻内山书店，乃某国浪人所开，实一侦探机关，前者道路流传，不忍听闻（见《文艺座谈》），鲁迅即不爱惜羽毛，嫌疑之际，亦当有以自处，乃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而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嘻！

综上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其罪根，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先生乃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之行为作模范乎？以先生之明，宁忍为此，殆亦有所蔽焉尔。

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近闻鲁党议醵金为鲁迅立铜像，设鲁迅图书馆，发起各学校各界人民追悼会。又以鲁丧未得政府当局慰问，表示不满（见《大公报》）。若当局对鲁迅略表好感，则彼等宣传，可得合法之保障，国人视听，更将为之混淆，吾信更进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国葬，宣付国史馆立传，各

大学设立鲁迅讲座，各中小学采取鲁迅著作为教材，皆将随之而来。日本利用“以华治华”，左派及鲁党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设计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

##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4）

国家缔造艰难，今日基础始稍稳固，而国难如此严重，吾人亦正需要一内可促现代化之早成，外可抵抗强敌侵略之中心势力。黄台之瓜，不堪再摘，同根萁豆，宁忍相煎，而左派乃欲于此时别作企图，肇分裂之奇祸，为强敌作驱除，谓非丧心病狂，又乌可得？且今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先生身为党国元老，设共产夺取政权成功，先生安归？传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知卫其足”，此则愿先生深思者也。先生昔日营救牛兰及陈独秀，纯出保障人权之立场，态度光明正大，无人不表钦佩，然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则个中利害，大相径庭。先生耆年硕德，人伦师表，一言足为天下经，一动足为天下法，先生而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之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诗曰：“德音孔昭，民视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

左派行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此次之事，无非利用先生名望地位。为鲁迅偶像装金，且借此为其宣传之掩护。甚至九七老人马相伯先生亦被列名葬仪发起人之内。其实彼等于先生及马老先生之主张信仰，何尝赞同？不惟不肯赞同，时机一至，即毫不容情加以掊击矣。林平日虽极恶鲁迅之为人，其人既死，雅不愿更有所指斥，然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莸为薰者，乃勃然不能复忍；且观左派宣传之剧烈，知其志不在小。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出言戆直，惟祈海涵，聪明正直如先生，傥不以斯言为河汉乎？第月旦人物，仁智之见各殊，或者夫已氏之恶，不如林所见者之甚，故先生不惟不忍绝之，且不惜借以令名而保护之，则望锡以教言，开其聋塞，不胜企盼之至。引领春申，斗山在望，临风拜手，不尽依依。

肃缄敬请

大安伏祈

亮鉴

后学苏雪林谨上十一月十二日

此书乃去冬十一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人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雪林自跋

（1937年3月16日《奔涛》第一卷第二期）

## 阿Q的旧帐

周作人①

周作人《阿Q正传》阴历年关来到了，商界都要结帐，中国文学界上也有一笔帐该得清算一下子，这便是那阿Q欠下来的糊涂老帐。

《阿Q正传》最初发表是在《晨报副镌》上，每星期日登一次。那时编者孙伏园的意思，星期日的一张要特别“轻松”一点，蒲伯英每次总做文章，《阿Q正传》当时署名“巴人”，所以曾有些人疑心也是蒲君所写。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好些年青的朋友大约不记得了吧。

不久有左翼作家新兴起来了，对于阿Q开始攻击，以为这是嘲笑中国农民的，把正传作者骂得个“该死十三元”。我想这是对的。因为正传嘲笑阿Q及其子孙是确实无疑，虽然所云阿Q死了没有，其时代过去了没有，这些问题我无从代为决定，本来我也是毫不知道的。

不久听说《阿Q正传》的作家也转变了。阿Q究竟死了没有呢，新兴的批评家们还未能决断定，而作者转变了，阿Q的死生事小，所以就此搁起了。不久《阿Q正传》等都被承认为新兴正统的文学了，有广告上说《正传》是中国普罗文学的代表作，阿Q是中国普罗阶级的代表，于是阿Q既然得到哀荣，似乎文坛上的阿Q问题也就可以结束了。

然而不然。对人是没有问题了，而对事的问题仍然存在，即《阿Q正传》究竟是否嘲笑农民，阿Q究竟是否已死，这些问题仍未解决，这都是新兴批评家们的责任，任何人都应负责来清算一下。

假如《阿Q正传》本来并不是反动的，不是嘲笑农民的，那么当初那些批评家们群起攻击，何其太没有眼睛？当初既然没有眼睛，何以在作者转变后眼睛忽然亮了，知道《正传》又是好的了？假如《正传》确是反动的，攻击正是应该，何以在作者转变后就不攻击，而且还恭维？

这阿Q一案的结论不外两种，一是新兴批评家之无眼识，一是新兴批评家之不诚实。看错，无眼识也。歪曲，不诚实也。本来不反动的作品。在转变前也要说它不对，本来是反动的，在转变后就要说它也对，都是不诚实。无眼识不过瞎说，说的不可信任，不诚实则是有作用，近于欺骗了。唯物史观的文学批评本亦自成一家，在中国也不妨谈谈，但是我希望大家先把上面所说的这笔烂污帐算清了再说，不然正如商界普通的规矩，前帐未清，免开尊口。

鄙人孤陋寡闻，对于世界上这派新批评未能详知，惟日本的译著亦略见一二，觉得足供参考，其所说自有固执处，但如阿Q事件这种无诚意态度盖未曾有也。上文所说故以中国为限，

且只就事论事，与理论别无关系。

二十四年二月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苦茶随笔》）

注：

①周作人（1885～1967），字启明，笔名知堂，鲁迅胞弟，现代著名学者、散文家。

## 《蛙》的教训

周作人

今天站在书架前面想找一本书看，因为近来没有什么新书寄来，只好再找旧的来炒冷饭。眼睛偶然落在森鸥外的一本翻译集《蛙》的上面，我说偶然却也可以说不偶然，从前有友人来寄住过几天，他总要了《蛙》去读了消遣，这样使我对于那蛙特别有点记忆。那友人本来是医生，却很弄过一时文学，现在又回到医与自然科学里去了。我拿出《蛙》来翻看，第一就是鸥外的自序，其文云：

“机缘使我公此书于世。书中所收，皆译文也。吾老矣，提了翻译文艺与世人相见，恐亦以此书为终了罢。

“书名何故题作蛙呢？只为布洛凡斯的诗人密斯忒拉耳（Mistral）的那耳滂之蛙偶然蹲在卷头而已。

“但是偶然未必一定是偶然。文坛假如是忒罗亚之阵，那么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推进于纳斯妥耳（Nester）的地位了。这地位并非久恋之地。我继续着这蛙的两栖生活今已太久矣。归欤，归欤，在性急的青年的铁椎没有落到头上的时节。己未二月。”

所云机缘是指大正八年（一九一九）春间《三田文选》即《三田文学汇编》的刊行，《蛙》作为文选的别册，次年六月再印成单行本，我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种。据鸥外的兄弟润三郎著《森林太郎传》上说，在《蛙》以后刊行的书有《山房札记》、《天保物语》等二三种，都是传记文学，只有一册斯忒林堡的《卑立干》是戏剧译本，到了大正十一年随即去世，年六十一。

我读这篇短序，觉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对于文坛的愤慨。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义的文学风靡一时，凡非自然主义的几乎全被排斥，鸥外挨骂最甚，虽然夏目漱石也同样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却只记得他在骂人而少被人骂。那时我们爱谈莫泊三左拉，所以对于日本的自然主义自然也很赞成的，但是议论如“露骨的描写”等虽说得

好，创作多而不精，这大约是模仿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读，平常读的书却很矛盾地多是鸥外漱石之流。祖师田山花袋后来也转变了。写实的《田舍教师》我读了还喜欢，以后似乎又归了佛教什么派，我就简直不了然了。文坛上风气虽已变换，可是骂鸥外似乎已成了习惯，直到他死时还有“新潮社”的中村武罗夫谩骂一阵，正如坪内逍遥死后有“文艺春秋社”的菊池宽的谩骂一样。为什么呢？大约总是为了他们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缘故吧。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野蛮民族里老人的处分方法有二，一是杀了煮来吃，一是帮同妇稚留守山寨，在壮士出去战征的时候。叫他们去同青年一起跑，结果是气喘吁吁地两条老腿不听命，反迟误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吓唬乡下小孩，总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时光与地位，让他去坐在门口太阳下，搓绳打草鞋，看管小鸡鸭小儿，风雅的还可以看版画写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碍他们的工作，那就好了。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日本的自然主义信徒也可算是前车之鉴，虽然比中国成绩总要好点。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不相信灵魂的人庶几站得住了，因为没有可卖的，可以站在外边，虽然骂终是难免。鸥外是业医的，又喜欢弄文学，所以自称两栖生活，不过这也正是他的强处，假如他专靠文学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潮社”也须得去钻“博文馆”矣。章太炎先生曾经劝人不要即以学问为其职业，真真是懂得东方情事者也。

二十四年四月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苦茶随笔》）

## 老人的胡闹（1）

周作人

周作人五月十四日华联社东京电，“日本上院无所属议员三上参次于本月七日之贵族院本会议席上发表一演说，谓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民国，而我方竟以中华呼之，冒渎我国之尊严，莫此为甚，此后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对于这件事中国言论界已有严正的表示，现在可以不必赘说，我所觉得有意思的，乃是三上之说这样的话。本来所谓正名的运动由来久矣。最初的一路是要厘正自己的国名，因为日本一语有Nihon与Nippon这两样读法，主张一律定为：Nippon，但日本桥一语仍是例外。不过无论如何总还是汉字的音读，归根结蒂是外国语，所以其中又有一派便主张来训读，即读日本云Hinomoto，译言“日之本”。这派主张似未见发达，盖从天文学上说来亦不甚妥协。此外别有一派想去纠正外国的读法，反对英文里称日本的Japan，主张应改为Nippon，听说结果有货物上书MadeinNippon字样到美国税关上通不过，因为他们只承认与Japan通商，不知道Nippon也。其实外国语里讲到国土民族的名字多有错误，本是常事，如荷兰自己很谦虚称曰低地，而英国偏要叫他林地，或称其人曰德人，俄国称中国曰契丹，叫德国人云呢咩子，犹如古希腊统称异族曰吧儿吧儿，均表其言语不通也。英文中的Japan其实还即是日本二字的译音，不过日本本国的读法是在六朝以前从中国传过去的吴音，英国的则大约在十四世纪时始于马可波罗的游记，称日本曰Jipangu，原语亦是“日本国”，但时在元朝，所用者乃是北方系统的所谓汉音而已。不管他对不对，既然是外国语，别国人无从干涉，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然而日本人却不许英国说Japan，正如中国人不许日本说支那一样，(虽然英国可以说“畅那”，)有点儿缺少常识。从这里再冲出去便是别一路，要厘正人家的国名了。这已从少常识转入于失正气，由狂妄而变为疯颠，此类甚少见，如三上参次的演说则是其一例者。

三上参次是什么人呢?我当初在报上看见，实在大吃一惊，因为我对于这位老先生平常是颇有敬意的。寒斋书架上还放着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的两册《日本文学史》，明治二十三年出版，西历为一八九○，在清朝即光绪十六年。那时候世上尚无日本文学史这一种书，三上所著实在是第一部，编制议论多得要领，后来作者未能出其范围。一八九八年英国亚斯顿著《日本文学史》，大体即以此为依据，至一九○五年德国菲洛伦支著《日本古代文学史》，则又其后起者也。

## 老人的胡闹（2）

三上生于庆应元年（一八六五），在东京大学和文学科毕业后专攻国史，得文学博士学位，任大学教授二十八年，参与修史，任经筵进讲，得有勋位勋章，敕选为贵族院议员。其学业履历大抵如此，若言其功绩则仍在文学方面为多，所著论文姑不具论，即文学史二卷已足自存，其成就或不及坪内逍遥森鸥外，总亦不愧为新文学界的先觉之一，在《日本文学大辞典》上占有一栏的地位，正非偶然也。这样的一个人忽然发起那种怪论来，焉得不令人惊异。三上于今七十一岁，岂遂老悖至此，且以年纪论他正应该是明治维新的遗老，力守自由主义的残垒，为新佐幕派的少年所痛骂才对，如美浓部达吉是，何乃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此甚足使人见之摇头叹息者也。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话毕竟是不错的，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日本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云："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又俳谐大师芭蕉所作《闭关辞》中亦云：

"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虽亦甚多，惟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不可恕也。"阳曲傅青主有一条笔记云：

"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昧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以上都是对于老年的很好的格言，与孔子所说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

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此次三上演说因为侮辱中国，大家遂加留意，其实此类事世间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廿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北平

（1937年上海宇宙风社出版的《瓜豆集》）

## 论骂人文章（1）

周作人

骂人的文章可以分作两大类，正如晋惠帝所问的蛤蟆叫，一是为官的，一是为私的。为私的一类里又可以说有两个分派，甲是消极的，曰报复的骂，乙是积极的，曰进取的骂，是也。本来还有一种回骂，即抵抗的骂，不过我没有把他放进去，因为这里所谓骂人必须是主动的，若被动的便不能算。报复的骂虽说是消极，却还不是被动，盖其被欺侮是一件事，被欺侮了没有办法却另用骂的方法来求满足又是别一件事，正如阿Q被人打了一顿，姑且说打我的是王八旦，这口气也就平了。中国有一位名人说过，只看报上登出一大篇冤单，便可以知道这人一定是吃了亏，（却并不一定是他理直或是人好，）再没有力量挣扎了，这样哭骂一阵，就此沉静下去。这样的报复实在是很可怜的，要说是报复还不及流氓的捅小刀子为能实践，可是我们要知道天下不少外强中干的人，忍气呢觉得不甘心，去拼命又有点怕，结果只有这样做，仿佛像佛典上所戒的非法出精，不足为训却又未始不是也难怪的事也。进取的骂似乎比较的难懂，因为这个名词是我所新造的，虽然这件事并非新起头，而且流行得也很广远，比起报复的骂来恐怕还要多上几倍也未可知。这种骂法有人称作爬梯子，或曰借头。其办法甚是简单，只要挑选社会上稍有声名的一二人，狗血喷头的痛骂一番，骂得对不对完全不成问题，只要使人家知道某人这样的被我所骂了就好。假如某人身高五尺，我既然站在他的头顶上，那么自然应该更高，至少也总是在五尺以上了。某人不理本也无妨，若是他回说了一句话，那更证明了我骂的有力量。总之都是于自己有利的。所以这样骂法行得很普遍，因为利多害少，青年人想钻上文坛或思想界去最容易采用，只消找一个人做梯子，几步爬上他的头去，人家看去（或者自己觉得）确是站得很高了，虽然也不免有缺点，这样的做法与冒认阔人是自己的爹根本上很相像，只是软硬不同，实在也

是有点可怜的。还有一层，找人要找得好，必须找著在文坛或思想界上身材高的才行，矮子已经要不得了，万一不小心扯到一个水平线下的，他的头就是同地面一样平的，如今却想站在他的头上去出风头，不但毫无效果，而且还白费气力，这真成了偷鸡弗着折把米了。进取的骂人家虽然大抵都是很聪明的，但是这种失败也很难免，可见江湖诀之还不是万全也。

为官的骂人说起来恐怕是最有意思，也是最有意义的事吧。官骂本是古已有之，如历来的传旨申饬即是，不过零碎的例引用很麻烦，我们只举出别的一件大案，即清雍正四年钦定的那册《名教罪人》。（此书已由故宫博物院铅印出版，每册定价五角。）据上谕说，钱名世获罪名教，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是以不即正典刑，褫职递归，且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悬其门，复命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为歌诗，以刺其恶。这一册里所收自大学士以至笔帖式，凡二百八十五人，都是由科举出身者，各恭做赋得名教罪人的打油诗一首，真是洋洋大观。可以为后世这派文学的模范的。

## 论骂人文章（2）

第一名协理大学士事尚书徐元梦七律第二联云，含毫不复知羞恶，索句应全失本心，倒正好拿来当作这书的题词用。更有意思的是第十五名（名次是照着官的大小排列的）礼部左侍郎查嗣庭，他在这里也跟着吆喝胡骂，但是过了几年他自己却又成了大逆，这回乾隆似乎不喜欢再写匾征诗，所以只同普通文字狱的那样办了。《名教罪人》所以成为空前绝后的官骂总集，是研究骂人文章的学者所不可不看的。但是后来皇帝消灭，文字狱渐为世人所不满意，而讲道统争正宗的脾气乃是民之秉彝，统制思想之举在老头儿与其儿子还是同样的爱好，于是官骂事业照旧经营下去，不过如智士所云已“易主”耳。鄙人记性不佳，文献匮乏，愧未能详征博引，考其源流，但就所知说来，这个运动大约是始于成仿吾的诗坛之防御战，这名称上显然露出断然的处置之神气，不过多少提高了挨骂者的资格，仿佛是被承认作交战团体了。随后又听见“剿”的口号，剿的对面自然就还有“抚”，虽然这个名称没有显明的听说过。这样，官骂便以一种新的姿态第二次出现于舞台上了。未开幕以前当然有些筹备，这且不谈，只看突然发动，四面总攻，其攻击不择手段，却有一定公式，这就可以认定是哪个来了，虽然不能百战百胜，总之这势力是很强的。谁被指定挨这官骂的有祸了！他就得准备守，战，或是降，胜总是休想。老实说，这只有两条路，守或战。战之后即不能再守，末了还是降，与寻常之降不同者只在一是不战而降，一是战而降，即是抚耳。守即不理，即兵法上的坚壁清野，宁可让他牵扯开去，无中生有的乱骂，不可回答以致多生纠缠，此最省事，只须持久。战即是回骂。当回骂之初大约觉得很痛快的，自己喜得还有这样力气舞动大刀，而且一刀刀都劈中敌阵的要害，却不知已中了道儿，犹如遇见鬼打墙，拳打足踢，气力用尽而墙终如故，结果只剩了一口气倒在垓心，变成俘虏了事。也有硬朗一点的，始终力战不屈，骂不绝口，那么这情形就有点不同，虽然

殊途而未始不是同归。相持不下，终究有个了局，如何了法其机密不能详知，大抵看《水浒传》可以知道一点，如及时雨之率众推戴玉麒麟，归根结蒂仍是一种抚法，又是一种降法，不过是极高妙的一种罢了。话说到这里，这一段故事应该收场了，总之这类集团的官骂，古有臣工之骂，今有帮行之骂，都是很厉害的，单身独客千万注意，沾惹不得，而有志业骂者则以此为最佳，可以过骂人之瘾而得勇士之名焉。不佞对于斯道别无研究，惟道听涂说，一知半解，姑述其大略，作《论语》之材料。他日如有国立研究院的学人根据人类学与历史的知识大规模的研究中国骂学，五十年后得成专著，而以不佞此文为之引。则光荣莫过于此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北平记

（《论语》半月刊第一〇二期）